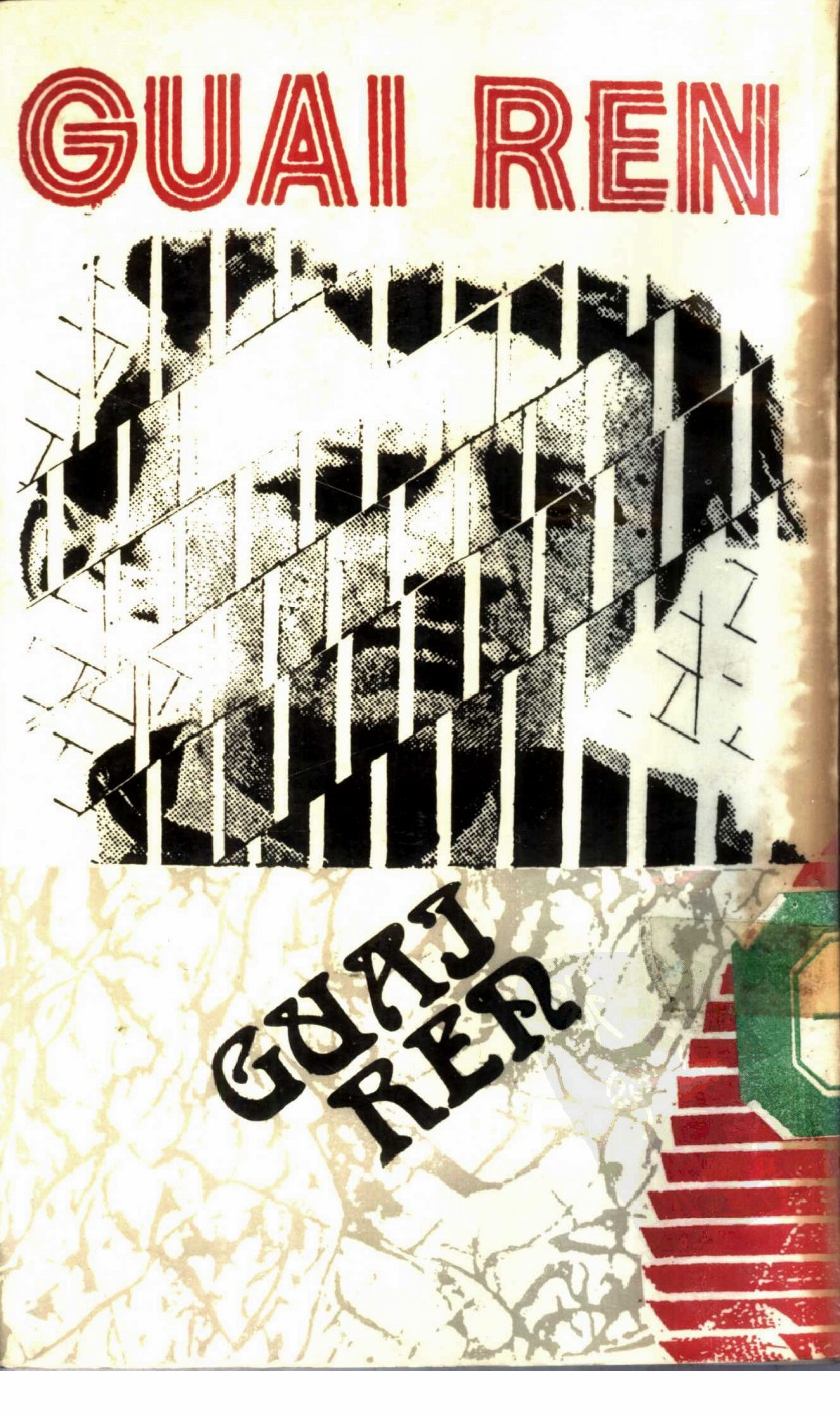

怪人
GUAI REN
东欧文学丛书
[保] 古利亚什基 著
樊石 译
GUAI
REN
重庆出版社


GUAI REN
GUAI REN

东欧文学丛书　［保］古利亚什基 著　樊石 译

GUAI REN

怪人

责任编辑　吴立平
封面设计　周宗凯　王晓珊
技术设计　费晓瑜

〔保〕安·斯·古利亚什基著　樊石译
怪　　人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9.625插页3字数151千
1989年3月第一版　1989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400
*
ISBN 7-5366-0888-8/I·177

定价：2.80元

内 容 简 介

《怪人》是保加利亚作协副主席、当代著名作家安·斯·古利亚什基发表于1984年的长篇纪实小说，在保加利亚评论界获得好评，被列为优秀之作。

具有新思想和开拓精神的工程师尤利扬离开繁华的首都来到外省一小城任职。从他到小城的第一天起，他就同当地人的市侩恶习和传统观念展开了不妥协的斗争。他的那些“古怪”的作法，使习惯于按常规办事的人无法理解，并遭到他们的非议，他也因此而被看成是个“怪人”；最后，他不得不痛苦地离职出走。

作者以纪实手法塑造的“怪人”这一形象，多侧面、多层次地透视出当今保加利亚社会所存在的种种弊端，揭示出新思想与传统观念的矛盾冲突，抨击了阻碍社会进步的市侩恶习，从而启发读者对现实生活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小说结构奇特，形式新颖，叙事生动、有趣，语言朴实、流畅，有一新耳目之感。

该书不仅为我们了解保加利亚当代文学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口，而且对我国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作 家 小 传

安德烈伊·斯托扬诺夫·古利亚什基(Андрей Стоянов Гуляшки)生于1914年5月7日。毕业于索非亚自由大学。30年代即投身革命，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7年参加保加利亚共产党。他曾与帕·维任诺夫等作家一道组织革命文学团体“赫·斯米尔宁斯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保共中央宣传部联络员和信使。解放后，他先后担任《文学阵线报》、《火焰》杂志主编和伊凡·伐佐夫人民剧院院长。1972年创办大型文艺刊物《现代人》，并担任主编。1956—1972年任作家协会书记，1972年起一直担任该协会副主席。

古利亚什基是保加利亚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面向生活现实，反映社会重大问题，揭示尖锐矛盾，富于时代气息；其风格独特，形式新颖，叙事生动，语言朴质，为开创保加利亚民族文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此，他四次获得季米特洛夫奖金，并多次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人民文化活动家等称号。

他的主要作品有：《西尔维齐亚的堂·吉诃德》(1936)、《死刑》(1940)、《农业机器站》

(1950)、《维德罗沃村》(1952)、《金羊毛》(1958)、《睡美人》(1961)、《我们生活中的七天》(1964)、《急诊室》(1978)、《坚强的女人》(1980)、《浪迹天涯》(1982)和《怪人》(1984)等，这些作品都以其独特的创作手法和风格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其中更有些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出版说明

东欧各国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其文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欧文学是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些国家尽管各有自己的民族和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也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曾受到俄国、奥国或土耳其的长期压迫，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曾为祖国的复兴进行过长期的斗争，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国家又遭到德、意法西斯的侵占，经受了战争的巨大创伤，战后又相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东欧各国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遇到过不少的困难和曲折。现在这些国家又在为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而在进行着不同程度

的改革。

文学是社会与时代的产物和反映。东欧各国文学有着光辉的历史传统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其突出特点就是东欧文学同人民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紧密联系。十九世纪文学就以其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内容和独特的艺术创新而引起世界的瞩目，出现过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作家和诗人，如波兰的密茨凯维奇和显克维奇，捷克的聂姆曹娃，匈牙利的裴多菲，罗马尼亚的爱明内斯库，保加利亚的伐佐夫、南斯拉夫的普雷舍伦等。二十世纪以来，东欧文学又以其丰富多彩的面貌出现在世界文坛上，先后有波兰的显克维奇、莱蒙特、米沃什、捷克的塞费尔特，南斯拉夫的安德里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文学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追求和创新，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战后初期，东欧各国人民在大战中的悲惨遭遇和斗争精神，都在作家的笔下得到了真实的反映，而建立新的公正的社会制度也曾是许多作家描写和讴歌的对象。五十年代前后，东欧各国(除南斯拉夫外)曾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出现过公式化、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随着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作家们的思想也获得了极大的解放。文学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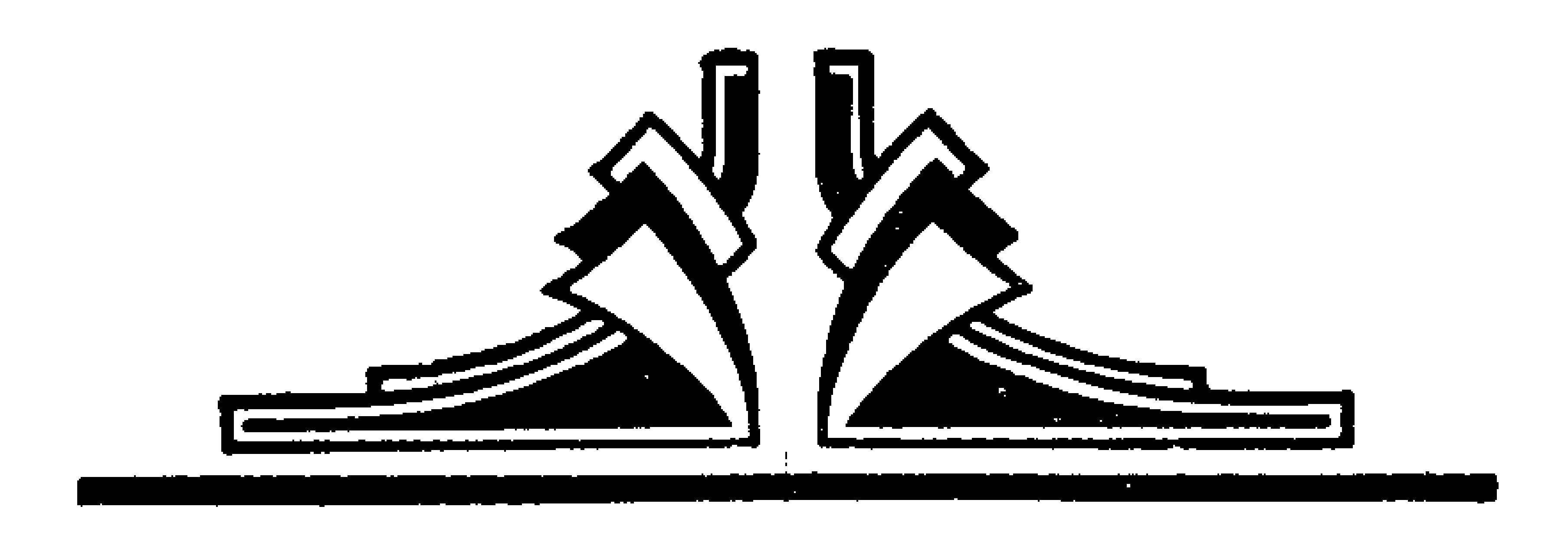
念开始了巨大的变革，文学不再是图解某些政治口号或政策的工具，而是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作家们深入探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敢于突破人为的禁区，大大扩大了创作的题材和表现手法。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各个方面，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成了作家们深索和描写的对象；既有反映政党内部斗争、工业化、农业改革等重大题材的社会画卷，也有表现个人生活经历和心理状态的作品；既有描写和赞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小说、诗歌，也有对社会上的种种阴暗面和腐败现象进行嘲讽和揭露的作品。在创作方法上，也打破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统文坛的局面，各种文学倾向，各种文学流派纷繁呈现，形成了一个百花争奇斗妍、竞相开放的景象。有的作家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竭力去反映当代生活中的种种现象，有的作家打破旧的文学模式，突破时空观念和情节框架，任人物的思想感情纵横驰骋，宣扬"反小说"、"反戏剧"的文艺纲领。有的作品以故事情节取胜，有的则以抒发情感见长；有的采用荒诞魔幻的方法，有的则以象征、隐喻或影射的手段去揭示社会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东欧各国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探索和创新，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巨大关注，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许多作家的作品被译成几十种外国文字，在欧美各国广泛流传，并以独特的艺术成就

受到好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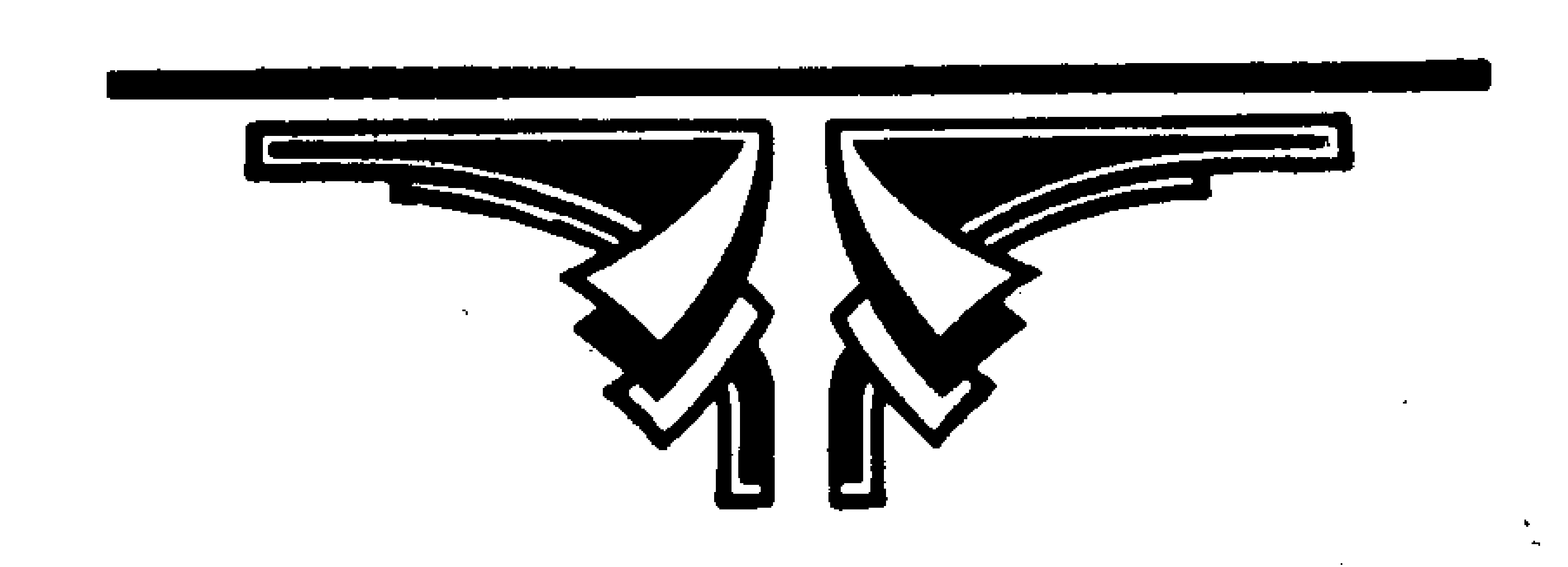
早在本世纪初，东欧文学就开始被介绍到我国来，二、三十年代，鲁迅、茅盾等无产阶级文学先驱，曾积极热情地向我国读者介绍东欧被压迫民族立意在反抗的呐喊文学，亲笔翻译东欧作家的作品，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东欧文学对促进"我们新兴阶级的文学发展必将起到很好的作用"。解放以后，我国和东欧各国走过相似的道路，目前也在进行着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我们的文学和东欧各国的文学也有过相似的发展历程，因此东欧作家的探索和创新，他们创作的经验与教训，都很值得我们借鉴。前几年，在我国召开的一次国际汉学家会议上，一些外国文学家建议我国文学界和翻译界将注意力转向东欧文学和拉美文学，不是没有道理的。

为了使我国读者了解东欧各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概况和人民的生活及思想面貌，并从中得到艺术上的享受，也为了使我国的文学界能从东欧文学中得到借鉴，增强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我们特选编了这套《东欧当代文学丛书》，将分期分批出版。本丛书着重介绍东欧各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的名篇佳作，特别是八十年代的近作，选材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兼顾各种流派和各种艺术风格。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得到文艺界和读者的欢迎与指教。

目　录



作 者 序



亲爱的中国朋友们！

你们当然会知道，世界各地都有一些人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被说成是“怪人”，或者总是表现得象“怪人”。一些人早晨去上班时，错把帽子往妻子头上戴；一些教授穿着睡衣去大学讲课；这个人早上对朋友说“晚上好”，而那个人走进散发着蛋糕和热可可香味的甜食店，要售货员给他称一公斤海鱼……

我认为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怪人”，而纯粹是一些心不在焉、心事重重的人；或者是由于空虚，他们想以“反常的人”或“怪人”闻名。他们的行为使人觉得好笑，于是人们便为他们编了许多笑话。

真正的怪人是以自己性格中那种在其他人身上极少见到的古怪脾气而与众不同，引人注目，而且他们的古怪脾气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故意表

现出来的。譬如一个有钱人每周都在自己家里举办丰盛的宴席，用稀有的美味食品招待客人，请他们喝最名贵的酒，而他自己在这些宴席上却总是吃面包和大葱，喝普通的水。或者某人的卧室装饰得富丽堂皇，可他偏在地板上铺上蒲席睡觉，不盖绸缎被子，而盖一件旧大衣。或者如果有人向某人借五块钱，而他却说："对不起，少于十块钱我不会借给你！"或者如果每年给某个小职员提级，而他仅客气地表示感谢，却总是放弃提升的机会。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怪人"。

但有时一些人仅仅是因为思想不保守，在行动中不遵守官方制定的那些已经过时的准则，而被人看成是"怪人"。对保守分子来说，一个具有新思维的人看上去总象"怪人"；在实用主义者看来，不符合利己主义利益的任何事物都是"古怪现象"；对具有小资产阶级思维的人来说，对"已制定出来的"、"为世人所公认的"东西的任何偏离，同样是"古怪行为"的表现。

在发生伟大进步变革的浪尖上，总会出现一些"怪人"，也就是最先觉察到正在到来的新事物气息的人。他们甚至在代替旧事物的新事物的形式和内容具有明确和具体的概念之前，就最先感觉出了旧事物的陈腐。他们从内心里跟正在到来的新事物融为一体，因为新事物带来进步，使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焕然一新。对这些社会进步

变革中的先驱者，具有保守思想的人就会说他们是“怪人”。对保守的人来说，对进步的每一种预感都是“古怪行为”。在具有旧的保守思维的人们的眼里，在官僚主义者和道德有问题的领导者的眼里——对这些人来说，这本小书中的主人公看上去一定是个“怪人”。这也是自然的，大多数人不容易脱离旧观念和旧习惯，甚至连我们这位主人公——新事物的先驱者，他在内心里也难以跟旧道德的某些“价值”告别。人最难改造自己！

我们社会主义世界里到处进行着伟大的积极的变革，“怪人”是这种变革最早的报信者。让我们象迎接春燕一样去迎接他们吧！

亲爱的中国朋友们！向你们致以兄弟般的、衷心的祝贺，祝你们成功！

安德烈伊·古利亚什基

1988年4月26日

介 绍 信

兹委派索非亚《算法》杂志社文学编辑普罗丹·普罗托波波夫前往H城出差，以调查物理数学博士、有色金属加工厂前厂长尤利扬·埃夫蒂莫夫的情况，同时搜集他在H城逗留期间工作方面和非公务方面的材料。

请曾与尤利扬·埃夫蒂莫夫工程师有过工务和私人关系的有色金属加工厂诸位领导、各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我们的编辑普罗丹·普罗托波波夫的工作予以协助。

主编（略）

198…年7月2日

索非亚

责任编辑注：主编签字处盖有《算法》杂志社图章，而介绍信的左上方有编号，我们没有将它标出，因为我们认为读者对此不会感兴趣。——原书注。

作 者 的 话

本书结尾处标明了日期，它向读者指出了作者完成自己的工作的时间。在此，我想提醒读者两件事：第一，在普罗丹·普罗托波波夫提交给我的材料中，有《算法》杂志社编辑部派他去H城和其他地方，以执行委托给他的任务的三封介绍信。从这些介绍信中可以看出，这位《算法》杂志社的文学编辑，在搜集对于尤利扬·埃夫蒂莫夫的生平形式上或本质上有或多或少的意义的材料时，总共花了一个半月。鉴于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件艰巨的工作，我觉得可以断定，普罗丹·普罗托波波夫本人曾深深地被逐渐揭示在他眼前的尤利扬的形象所吸引，甚至受到鼓舞。

我想让读者知道的第二件事，就是写这本书时我所起的作用。我的作用很简单，或者用现代时髦的话来说，是“单层次的”。亲爱的读者，在这整个故事中，我首先是个“整理者”，也就是说

机械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是个以时间顺序为原则，整理别人的材料的人。只在个别情况下和有必要时，我才对某些事情评说几句，至于拿起笔，以自己的名义转述确确切切的材料，填补这种或那种空白——这种情况很少。可以说，当这种材料与那种材料，或者这一事件与那一事件之间留下了不好逾越的空间时，我在它们之间架起了桥梁。或者简单地说，当我觉得语言显得过于简单和枯燥时，我就用事实来说话，因为众所周知，在事实面前神灵也会沉默，可是同样被人们公认的是，神灵的沉默并不总是能被人们解释清楚的。至今不是尚未出版过任何一部默语语法吗？这种情况促使语言学家明智地声明沉默本质上不是任何语言。不过，亲爱的读者，我很少插手这个故事，我总是诚实地力求忠于证据确凿的材料。

至于《算法》杂志社——它当时只刊载了这些有争议的材料的一小部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一种有关自动化技术和控制论的刊物，而不涉及激情和感情的迷宫。我相信关于情感和感受，没有也决不会有"算法"，即使最完善的电子计算机，在人的精神世界面前也会沉默不语，如果它能说话——也只会说出一些使人啼笑皆非，或者叫人昏昏欲睡的古里古怪的话。为什么？因为在人的内心里逻辑和反逻辑是携手并进的，而电子计算机只能进行逻辑思维，古怪行为和反逻

辑跟电子计算机格格不入。可是哪一个人在一生中不会作出古怪的举动呢？至少也会发生一次吧。有谁不会同自己健全的理智争吵，象踩葱头一样践踏不可动摇的逻辑法则呢？所以《算法》杂志由于其性质所决定，不便更多刊载我的朋友普罗丹·普罗托波波夫以巨大的热情搜集到的材料。不过，该杂志注意到了尤利扬的奇特命运，这一独创性举动，倒是应当受到热烈的赞扬；而对于普罗托波波夫，我们祝愿他在编辑阶梯上至少晋升两级，他象个嗅觉敏锐的发明家，置身于读者感兴趣的事件之中，但愿他成功。

"葡萄酒已经倒好了，该喝了！"法国人这么说。甜还是酸，低浓度还是烈性——每个人将根据自己的口味作出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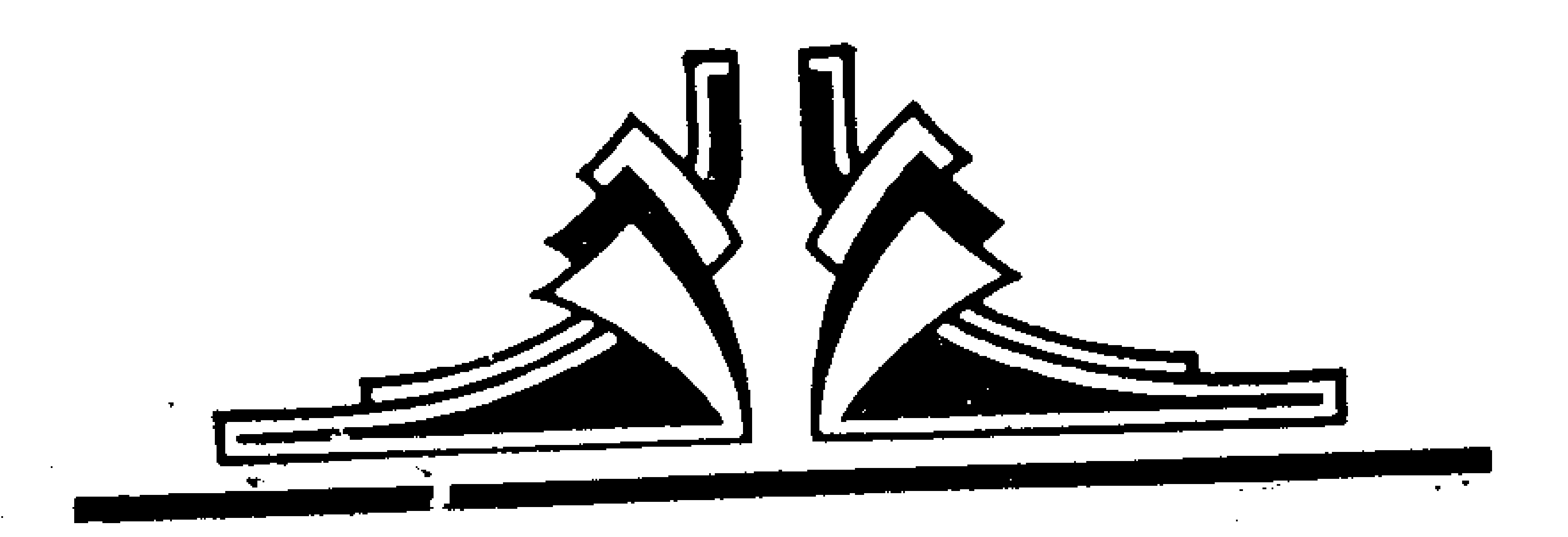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的话

作者在前言中告诉读者，他以时间顺序为原则，整理了编辑普罗丹·普罗托波波夫搜集的材料。我认为有责任给读者解释一下：作者在这里相当随便地使用了“资料”一词。按照公认的俗定约成的解释，“资料”是由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国家——社会组织出版的文本。资料也可以由私人出版，但为了使其具有法律效力，必须经由相应的机关譬如公证所、部委或社会团体批准。作者在前言中把一些个别人的讲述和不具有法权的人的证词都称为“资料”。我曾提请作者注意这一本质的区别，但他以作者们所固有的轻慢态度，拒绝作任何补充说明和更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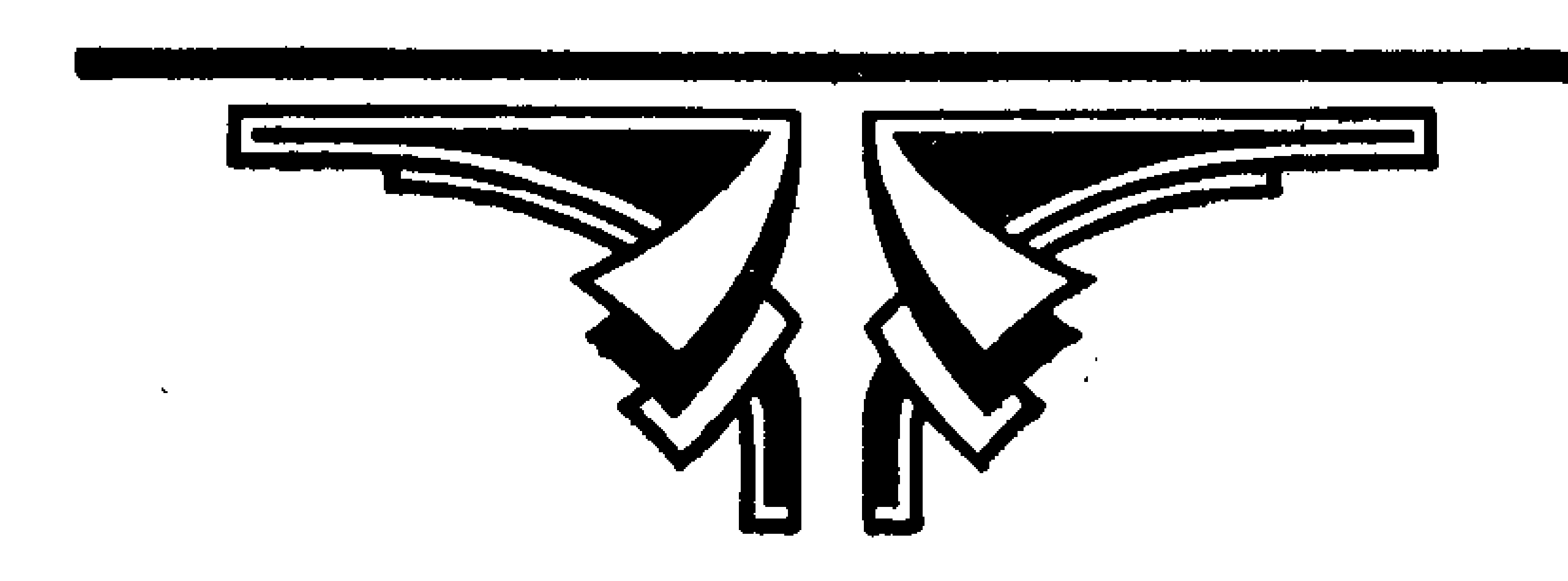
其次，在同一前言中，作者谈到曾对某些事情进行了“评价”和填补了一些“空白”。总的来说，我不反对作者有权进行评价和补充文本，但在许多情况下，我曾表示不同意这样做，并提出了批

评意见。遗憾的是，对我的不同意见和批评，尤其是对作者补充的文本的批评，他却以作者们所固有的轻视态度一笑置之。所以，如果诸位读者对本书的某些方面也持保留态度的话，请不要因此而责怪责任编辑。很遗憾，责任编辑的权力是极其有限的。

最后，我得说句公道话，作者毕竟同意了我对某些语法关系和书写方面的更正。



别人讲述尤利扬



铁路工人的讲述

我，米哈拉基·托多尔切夫·瓦拉迪诺夫，H站站长，从年龄来说，在职务上我已经到顶了。从这里往下面低处瞧，便可瞧见退休生活的小天地。是谁及如何想出了这个工作最后的年限，我不清楚，但对铁路工人来说，这是不公平的。老铁路工人象那些被运输部门宣布报废的破旧机车。是的，不错，是宣布报废了，可是在它们被收进机车库之前——一年，二年，也可能更长时间——旧机车不会停在一个地方，而是这里那里跑个不停，就象那些有些神经质、在家里呆不住的老头儿一样。它一会儿去某个货物站调车，将一些车厢由这股轨道拉到另一股轨道；一会儿又把三节车厢由雷格尼科列茨站拉到诺夫格拉德茨城砖瓦厂。旧机车仍在工作，没有撒手不干，尽管它们的关节吱吱作响，它们的肺象破风箱似的发出沙沙声。但是，遵守时刻表——这是铁路工作神

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因为它们从在湛蓝的空间吐出第一团蒸汽的那一天起，就这样习惯了。同志，每一个人都遵守本职工作的时刻表，对公共事业不怎么关心，而铁路是为所有的人服务的，所以当一辆机车最后一次从线路通过时，人们应当朝它脱帽致敬。

我在铁路部门工作了很长时间，什么没有干过呀！最初，我在调车机上当过司炉工，也当过司机，从雷格尼科列茨把三节车厢拉到诺夫格拉德茨，然后返回来。后来我又开过蒸汽机车，它以两千马力拉着一些黑乎乎的钢铁巨物迅跑，当成群的孩子们头一次见到它们时，便惊讶得跳起来。这是我最年轻力壮的时候。再往后我开过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这工作又方便又轻松，我穿着白色工作服进入驾驶室，从里面走出来时象药剂师一样干净。这种现代化机车，一个机灵的女人也可以掌握它，只要她不头晕，不打瞌睡就行。电力机车和蒸汽机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蒸汽机车操纵杆不好使，从张开的大嘴里一次就喷出百来个火舌。老实对你说，我从那种机车里走出来时，黑得象个阿拉伯人，浑身散发出煤炭和炉渣味儿，连我妻子也捂住鼻子，尽管我用洗衣服的肥皂洗了又洗，并洒了不少“奥丽甘”牌香水。

同志，我是说开蒸汽机车多么光荣，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消耗了多少体力和精力啊！所以，当

我满了五十岁时，领导决定给我安排一个比较轻松的职务，委任我当站长。我干了二十五年运输工作，比对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更了解铁路部门的事情，是伴随着信号灯、道岔和铁路时刻表而度过的，就是说对于这种后勤工作我有足够的经验。我在短训班学习了六个月，以了解自己的职责范围和调度艺术中某些最常见的细节。是的，在前沿阵地是一回事，在某个指挥所则是另外一回事，尽管提升了。前线战士的生活是在紧张中流逝的，犹如流经密林和岩石间的急流奔腾咆哮，浪花飞溅。铁路部门后方人员的生活也象一条河，只是它已流出了密林，把岩石远远地抛在后面，无声无息地灌溉着静悄悄的平原。火车司机的手紧握着操纵杆，他的注意力离不开各种压力计和速度表的指针，他的心随着轮子在钢轨连结处的跃动一起跳动。而站长的眼睛总是盯着时刻表、电传带和调度盘上一闪一闪的指示灯，他的脑袋里塞满了各种装卸货物的计划，他的心为不断增多、等待人们装货的车皮和积压更多、等待人们卸货的车皮而焦急。

同志，我对你讲这些事情，不是要你学习铁路知识，而是想让你了解第一线人员和参谋部人员的生活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一个人的习惯。就我而言，坦率地告诉你，我总是更喜欢在第一线工作，假如我不是被蒸汽牵

引弄得精疲力竭的话，那我至少还会在第一线干上十年呢。

可是，命中注定我要退休，要我高高兴兴地过安静的生活，有朝一日平平静静地闭上眼睛！而在这之前，还得当一个时期站长。咳，命运啊！一个人能逃脱自己的命运吗？假如有人说可以，那是胡扯！命运如同火车时刻表——你得根据它的指令，按照它的意志行事，即使想改变它，你也无能为力。只要那种想改变它的不理智的念头一出现——即使只有一次——事故就会把你卷进去，不在你这个区段出事，就会在道岔那里出事。我的朋友，不管出现哪种情况，你都会被牵连进去，要么人们把你的碎尸从扭曲的钢材底下拔出来，要么即使上帝保佑你大难不死，待你治好伤后，也得送交法庭受审。我认为第二种情况比死更糟。你瞧，要是违抗命运，也就是说不服从时刻表的话，会带来什么后果。只有当你变成了碎尸的时候，才能逃脱命运。我作为从前第一线的工人和现在的站长，从生活中学会了这一切。

当然啰，没有派我去中心站和一等站当站长。中心站和一等站，只交给那些受过专门高等教育的人。我在铁路学校毕业后，便马上握起了操纵杆，是实践给了我知识，而不是教授们，所以派我管理H站，而不是象戈尔纳奥里亚霍维查站那种复杂的铁路枢纽。每一个人按他的经验，同时

也按他所受的教育安排工作，这是我们铁路部门不可动摇的法规。可是，同志，十年前H站是一幅什么样子呢？那时只有两股道和一条百来米长、停留货物车皮的支线。第一股是快车道，按时刻表规定，它们只从H站呼啸而过，而不停留；第二股道停留旅客列车，它们在本站只停可怜的一分钟。

同志，对此你不要感到奇怪。当初H城是什么样，它的火车站也会是什么样。而那时H城算不上什么都市，在那可恶的沙皇时代，只不过是个小县城，有一家砖瓦厂，一家合办的酒厂，两三家无人问津的律师事务所和几家作坊——修桶的，打铁的，制作木门窗的；还有区法院，一个有四名警察的派出所和同样有四名职员的银行分行。娱乐方面倒是不错，因为H城一带是种植葡萄的福地，所以H城有一家饭店，十来家酒馆和一个业余管弦乐队，每逢星期日，它总在H城市立公园演出节目。还有什么来着？有一个停放着五六辆破旧出租汽车的停车场。哦，我差点儿忘了，还有一个烘烤李子的干燥室。

那时，H城与火车站之间蜿蜒着一条十来公里长的公路，它弯弯曲曲地穿过葡萄园、田野和果园。但只有秋天，当H城人收获一车车的葡萄，酒厂把香喷喷的葡萄酒运往州城的时候，它才显得热闹异常。酒厂有两部“多吉”牌卡车——战后

初期留下来的破烂货。当它们发出呜呜的响声和在干燥的天气沿途卷起尘土时，人们准会以为不是卡车，而是合作开办的酒厂里数十只空桶在滚动呢。

尽管通过火车站H城与外面大千世界连在一起，但直至最近它还是那种被称为“贫困地区”的城市，它是农工综合体最薄弱的地方。零散的葡萄园、果园和小农业，养活着七八千H城人；他们无法购买新轿车和为可观的小别墅积攒钱。最坏的是青年人都跑光了——有的去州城挣钱，有的去了首都，要不是这样，一切倒还不错：空气新鲜，水质甜美，风景秀丽，犹如美丽温柔的少妇。周围是一片片的杨树和果园，不时传来飞鸟的啼鸣。H城生活呈现出一派古朴的风貌，尽管周围沸腾着一种新生活，它象刚刚酿出的葡萄酒一样，尚未完全澄清，但却非常有劲。

同志，你对我的新生活方式有什么想法？首先我寂寞得惘然若失，其次我几乎变成了哑巴，因为身旁没有司炉工，不能对他大声喊叫，有时还打一阵瞌睡。我以前驾驶的那辆两千马力的机车已经化为乌有。在这个被H城人叫做“车站”的人烟稀少的小岛上，我们一共有四人：我、售票员、报务员和一个扳道员。巡道工有时也来，但他住在葡萄园一所小房子里，只有出来沿线检查自己的管区时，才一天来站里露两次面。售票员

是本地人，有一辆自行车，一关上售票窗口，他就马上急急忙忙赶往H城。我和报务员来自索非亚，两人都有家室，休假时间一到，每个人都很乐意承担起另一个人的工作。可是，那真难熬啊！有时没有一个旅客从车上下来，也没有一个H城人去其他地方。我和报务员住在站里，我们一起做饭吃，这一次他去厨房值班，下一次我做。秋天，站上的人比较多，这时临时调来一辆蒸汽机车供调车用，人员也相应地增加两名即将退休的人。扳道员负责维护站里的秩序和卫生，他妻子每年两次冲洗候车室的地板和窗子，每周为我的办公室即指挥所擦一次窗子。

同志，我之所以谈这些详细情况，是为了让你了解为什么最初几个月我仿佛变成了聋子和哑巴，为什么我觉得自己象个被生活的轨道远远地抛在一边的人。不是因为我变换了居住地点，即由首都来到了这个偏僻的外省城市。当我的生活每天都处在沿铁路线——从伊斯克尔站到黑海，从戈尔纳奥里亚霍维查到洛增格拉德——不停的运动之中时，我算什么首都人！就单位来说，我是首都人；而就工作而言，我是个常年的旅客，根据固定的铁路时刻表，随时变换地点。

可是，同志，人们不是常说时间能改变一切吗！是不是曾经有过一种海杜特草药，据民间传说所讲，它能医治一切创伤和疾病——这我不知

道，而且谁又能知道呢？将海杜特草药视为医治百病的良药的马努什[1]统领的时代，比我们的祖先还早呢！不过，我从经验中得知，时间是个伟大的和无处不在的医师，是一种医治百病的良药，对于治疗肉体和精神上的创伤有着同样的奇效。我听说对那些性情暴躁、神经衰弱的人，大夫们总是给他们开学名为镇静剂之类的药物。同志，我敢打赌，对于即将到来的退休生活，没有也不可能想出有什么特效的镇静药，时间是世界上一切镇静药物之王！你应当从我这里了解这一点，我就是个活标本。

同志，我从切身的体验中得出了这条真理，我用自己的皮肤和自己的心灵感觉到了这条真理。来到H站几个月后的一天清晨，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五月初，我听见从附近山毛榉林里传来了鹁鸟的叫声。当然啰，它以前大概也经常叫，这是一种爱叫的鸟。但我这天清晨是头一次听见。而当售票员来后，我友好地问他妻子身体如何，是否愉快，他是否揪孩子们的耳朵？他惊讶地瞪起了眼睛。后来我才知道，他只有一个婴儿。但当他明白我是出于好意时，他的眼睛里闪现出愉快的光芒。吃午饭时，我和报务员吃完每顿必吃的豆子后，我对他说："纳鲍尔，想不想玩

① 马努什——保加利亚民间传说中的英雄。

牌，高兴高兴？”报务员惊讶得目瞪口呆，但在他开口之前，我已从站长皮包里取出了乱七八糟的牌，摊开在桌上。午休后，出去接发从索非亚开来的客车时，我感觉到一阵微风掠过我的脸部，带着甜蜜的芳香，那是薄荷、成熟的接骨木和被太阳烤晒的母菊的香味。成群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唧唧叫着，鸫鸟在山毛榉林里啼鸣；天空象冲洗过的玻璃一样明净，笼罩着平原；城市的边缘展现出巴尔干山蓝色的轮廓。我望着望着，顿时感到轻松愉快，并对自己说：“你瞧，生活在后方也并不怎么坏嘛！”事实上我什么也没有说，但我的心想发出这样的感叹。因为假如必须说得坦率一些的话，火车司机并不常仰望天空，他们几乎不把它当回事，高空与他们的工作毫不相干！他们也不东张西望，以免分散注意力，他们的眼睛紧紧盯着仪表和操纵杆。行车途中，对司机来说最神圣的东西就是驾驶盘，那里有关系到车厢里的旅客的命运和他自己生命的一切。驾驶盘也有可爱的地方，但这种可爱比较特殊，并不非常可爱。当一个机枪手高兴地说：“我的机枪射击起来真可爱！”难道他讲的真非常可爱吗？

同志，时间消除了我对前线沿途每天战斗的渴望，使我看到了和平时期生活中一般的快乐。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也许我表达得不怎么好，可我是个铁路工人，只上过中等铁路学校，正如

前面已经给你提到过的，我未曾得到过教授们的指导，所以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不怎么样。

第二天，我把巡道工和扳道员叫来，他们都是懒鬼，世界上没有象他们那样懒的人，我要他们把站前荒芜的旧花园翻一遍。他们感到很奇怪，不知我为什么注意这个杂草丛生、已经干裂的花园；后来明白我的意图后，他们甚至觉得受了欺侮，难道种花与他们的业务能有什么共通之处吗？但对我这个曾经在第一线工作的人来说，这种事与我也没有共通之处呀！我以前也是司机，而不是清洁工，可是我亲自打扫自己的工作间的次数少吗？我常常用棉纱头把各种仪表的铜框擦得锃亮，而他们却为一个十五步长、十步宽的小花园而对我发牢骚。

这样，我便使这个站前小花园从死亡之中复活了。我用自己的钱购买了各种花种——牵牛花、雏菊、金盏花和蜀葵，并且还弄到了一根橡皮管，因为花园离水龙头有十五米远，谁会用桶去提水呢！

简言之，一个小花园出现了，人们对此感到很奇怪。我对这个花园谈得过多了一点，但你将会看到，我不是偶然提起它；对于你感兴趣的那个人来说，这个花园在我讲的故事中将起重要作用。你将会看到他的古怪行为首先是在这里表现出来的，而且对我本人来说，这个故事不是象通

过我们站的快车那样呼啸而过就完事了。

每天的战斗使前方战士经常保持着一种战斗素质。假如是司机，他就必须习惯于同困倦进行有效的斗争，彻夜不眠在他身上已变成了习惯。假如突然把这种人从岗位上换下来，那么很长时间内，他会象鬼一样整夜合不上眼。前线人员会迅速地习惯于困难的路程，工作中的困难使他保持精神振奋状态，他不会松弛，不会懒惰，浪费时间对他来说是件极不愉快的事，尤如患重病一样。而和平时期的生活就象香烟一样，你愈是更多地吸进香喷喷的毒物，就对它愈习惯，愈是离不开它。和平时期生活中的快乐也象香烟一样，起这种作用。开始时，扑克牌、骰子、打盹，每天只来拜访一次；而后来我开始亲自去叫这些客人，乃至它们成为我不可分离的经常的同伴。起初只有我和报务员一起玩，后来把售票员也吸引过来了，而他又把自己的内兄、已经退休的银行分行行长拉到站里来。这样，我们便凑齐了四个人，玩起来就象掷骰子一样有趣。等到接发车一结束，我们便马上围坐在桌旁。厨房里积了一大堆没有洗刷的碗盘；罐头食品代替了豆子和土豆菜肴。我愈来愈少地关心那几个懒鬼偶尔浇灌一下的小花园了，它由一个美丽的少妇变成了一个干瘪的老太婆，只是由于上帝的仁慈它才仍然活在世上。

不过，同志，为了尽可能公正，我得告诉你，花园的干裂也是有其原因的，我在和平时期新养成的习惯倒跟这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简单地说，站里的事情多了起来，工作量增加了。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H城一个接一个地开始建大瓦厂（在旧砖厂那里）和一个工业“巨物”——正象人们现在所说的，即有色金属加工厂；卫生设备厂也挖好了地基。同志，你提到的那个时期，瓦厂已经投入生产了，那个巨大的工业企业也安装好了机器。这些建设促使我们站苏醒和活跃起来，使它终于象一个真正的火车站了。从索非亚调来了一些工人和专家；增加了股道，以备调车和车皮停留使用；改进了信号装置；新建了装卸台，盖了敞棚。后来给我派来了一位助手、车库主任和三名扳道员。调度室里信号台上的指示灯开始闪烁，车站摆脱了昏昏沉沉的状态，真正行动起来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我的助手是一个好学的青年，工作非常努力。我知道他怀着希望，盯着我这个站长的位子。他是单身汉，我安排他住在站里，他有一辆БМВ牌350马力的摩托车，骑上它用不了十分钟就可以到达H城。其他人员都住在城里。

由于建造工厂，许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来到H城，于是这座小城开始出现奇迹。旧H城迅速地改观了，诞生了一座新城。盖了一家名副其

实的饭店，有两个餐厅和现代化舞厅；建筑物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开办了许多商店、啤酒馆、药店，修建了医院。据说居民将由七千人增至二三万，这肯定会成为事实，因为仅那个“巨物”就预计有七八千人工作。现正着手修整街道，平整广场，拆除了许多古老的旧屋，盖起了七八层乃至十层的新楼。总之，一座周围满是果树，洒满阴影的偏僻寂静的小镇渐渐变成了工业城，古风旧俗迅速消失了，犹如被一阵风刮走了一样，而新事物刚刚萌芽，还说不准会发生什么芽和开什么花。不过，同志，关于这些事情，别人会跟你说的，而我再重新回到车站，讲讲我们那些人吧。

空闲时，那位年轻的助手一点也不关心小花园，只是一个劲儿学习，啃着厚厚的书本，准备大学函授考试，他从未提起过小花园，也没有打听过有关情况。我觉得除了本职工作（他干得很出色）和大学的课本外，对于世界上其他的一切，他一无所知。当然，也有一个小小的例外，那就是每月总有一二次他用摩托车从城里带来某位姑娘，这样的姑娘有的是，尤其是青年男子成群、过着单身生活的地方，随时都可以找到。不过，我的助手干这种事往往在深夜，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把姑娘带来，在天亮之前又把她送回H城，好象害怕光明。我和报务员是根据摩托车的响声得知他什么时候带她来和送她走的。我在心里骂

他胆小和虚伪，并且从内心里暗暗嫉妒他，但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是因为那个姑娘，还是因为他那辆飞速奔驰的摩托车。

有一次在党支部会上，售票员问他(我们的售票员是党支部书记)："青年同志，你为什么总是深更半夜带这些女人来，难道你不为吵醒了同志们而感到内疚吗?""我是感到内疚。"那位青年同志耸耸肩说。"那你为什么还这样做?"售票员又问。"你就不能在正常时间带她们来，天亮后送她们走吗?""不行!"我的助手回答说，"早晨会被人看见的，而且我希望自己的档案清清白白。"我很想朝这个胆小的伪君子的脸上吐唾沫，但他是我的一位很好的助手，何况我本人在白天也常常掷骰子、敲牌、睡觉，所以尽管他的行为可耻，我也忍了，没有说什么。

我们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直至有一天你问到的那个人到来为止。

他是八月三日乘上午十点钟那班火车到达的。跟他一起下车的还有两位乘客，他们是戈尔纳奥里亚霍维查人，我认识他们。一辆马车在站前等着他们。你提到的那位乘客从车厢里取下了三只装得满满的箱子——两只进口皮箱，一只本地产的帆布箱。同志，我告诉你呀，他差点儿下不来，因为两个戈尔纳奥里亚霍维查人的麻袋堵在他前面，他们用胳膊肘推他，要先下车，而他

不声不响地等着，一句话也没有说。看上去他脾气温和、很懂礼貌，尽管现在很少见到这种人。我作为铁路上的人，坦白地告诉你，今天用胳膊撞人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谁不这样做，有时就可能要付下一站的车费。世界变得忙忙碌碌，失去了耐性，每个人都想最先下到站台上，就象这两位戈尔纳奥里亚霍维查人一样。

从这个人第一次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起，已经过了很长时间，而我却仿佛觉得是昨天发生的一样，一种错觉使我误认为是发生在昨天，而事实上已经过了六年。那一天，即八月三日，就象一张近照一样，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而且这六年我常常遇见他，所以还记得第一次遇见他的情景。怎么会忘记呢！他在H城呆了两年半……

可以这样说，假如有一天发生晴天霹雳，难道你不会记住这一天吗？你肯定会记住的……第二，你提到的这个人确实只在H城呆了两年半，但他做了许多古里古怪的事，他以自己的工作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以至H城人至今还在谈论他，而且不会很快把他忘记。我也会记住他的，不是吗，我是在H城这块土地上第一个遇见他的人啊！

前面提到的这个人刚从车上取下箱子，车就开了。他朝四周瞧了瞧，当他见到扳道员时，便热情地朝他点点头，用头向他示意自己的行李。

他是想说，好同志，请帮帮我的忙吧。那个扳道员本是个懒鬼，我敢肯定他会背朝着他，并且会说："同志，我是扳道员，不是你的搬运工，你找错人啦！"可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那个木头人却敏捷地跑了过去，以我从未见过的举动，拿起两只皮箱，迅速地送到了候车室。扳道员身强力壮，但脖子上的筋都暴了起来，由此我发现这位先生的行李很重。此人尽管被那两位戈尔纳奥里亚霍维查人无礼地推搡了，却仍然笑眯眯地走到候车室，仿佛箱子里装的是麻雀似的。后来，我趁那位先生没有注意时，试了试行李——至少有四十公斤重，里面塞满了各种硬皮书和各种仪器。"这个人的肌肉象钢铁一样结实，却如此谦让！"我心里说；同时我又想：在这广阔的世界上也会遇见这样的人，他们一拳可以打倒一头牛，却会给蚂蚁让路。

他掏出五列弗①钱给扳道员，以感谢他的帮助。后者大吃一惊，因为，同志，对这种事就是给一列弗也够多了！那个懒鬼很诚实，不愿接受这么多钱，谁也不会要这么多钱的，假如不是这位先生把钱硬塞到他手里的话。"你为什么跑去给他提箱子呢？"后来我问他，"那个小花园，你连一桶水也没有浇过呀！"而他耸了耸肩："我哪里

① 列弗——保加利亚货币单位，相当于人民币元。

知道，”他大声说：“胶鞋仿佛拉着我朝那个人跑过去！”“以后我也会给你买胶鞋的！”我心里想。“是皮箱把你吸引过去了吧！”不过，自己的想法究竟对不对，我没有把握。

同志，我现在想给你描述一下我亲眼看到的那个人。他顶多三十五六岁，中等身材，甚至有点偏矮，宽肩膀，而腰很细。他脸上看上去很瘦，颧骨突出，头发呈淡棕色，梳着分头，额头有点偏高，一双瓦灰色眼睛炯炯有神。他的眼睛，怎么对您说呢，仿佛是瓦灰色的，而实际上是浅灰色，令人琢磨不透。他的目光有时象天鹅绒一样柔和、平静，忧郁中带着温存；而有时，当瓦灰色变成浅灰色时——只有上帝才能看透它！——就象把你放在天平上称一样，看你有多大分量，不过，不是出于凶狠，而是出于好奇心。简言之，他的目光象我们的伯尔齐亚河的水一样，——我们这些快退休的人都还记得很清楚——表面清澈诱人，柔和的天空倒映在水中，清晰可见，云彩象一团团的棉花似的；而再往下面，呈现灰色，愈来愈暗，变成蓝绿色，谁也不知道水底有些什么。我们村一些比较勇敢的小伙子常常潜入深水里，他们说起来可神啦，有一个青年甚至发誓，说看见了人鱼公主①。我们拽住他，问他人鱼公主是个啥

① 人鱼公主——东斯拉夫人，是乌克兰人和南部俄罗斯人的神话中，长发披散生有鱼尾的裸体女人形象。

样，小伙子回答说："她的眼睛象星星，而头发象玉米穗！"这当然是随便说着玩的，但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我这些小朋友谁也没有编造出吓人的、叫人听了可怕的东西来，大家都说深水里很好玩。

同志，我想告诉你的是，此人目光深处很好看。好是好，但仿佛洒满了苦艾水。

他把几只箱子放在候车室和调度室之间，就在站区溜达起来。这个人走起路来有点令人奇怪和可笑，倒不是他站立的姿势难看，而是他身子挺得笔直，不时地朝旁边挥挥手，仿佛要把各种朝他扑来，妨碍他朝前看，影响他思考工作的烦恼统统赶走似的。也许他象个赶牛虻的人，但我再说一遍，他要是不挥手的话，走起路来倒很正常，象个心事重重的人，到站台上散散步，等待旅客列车到来。

他到装卸作业台仔细看了一遍后，又去敞棚里转了一圈。棚檐下堆码着十二只木箱，等待有色金属加工厂的卡车来运，每只箱子最少有一吨重。这个人站在调度室门口，朝报务员点了点头，客气地问：

"同志，能不能告诉我，有色金属加工厂有没有来过有关我的什么通知？"

"您是谁呀！"报务员惊讶地问，因为在此之前，谁也没有如此客气地朝他点过头。

“我是埃夫蒂莫夫。”那个人说。

“哦！”报务员说，“是尤·埃夫蒂莫夫吗？”

“是的，是尤·埃夫蒂莫夫。”

“那您早就该说呀！”报务员点了点头。“我们哪里知道您恰恰就是这个尤·埃夫蒂莫夫呢！半小时前，我们收到了厂里给您的电报。”他打开纸卷，指着带子上一个地方念了起来：“致尤·埃夫蒂莫夫。在他到达后，请转告他，吉普车严重损坏，暂停使用，请他等一下。有色金属加工厂厂长纳乌莫夫。”

同志，我发现那人的脸最先如何露出惊讶的神色，这比他朝报务员点头时，报务员所流露出的惊讶表情更厉害。然后，这种惊讶象电力减弱最后断电时灯泡的亮光那样，慢慢消失了。

“您说的是吉普车呀！”他重复了一遍。谁知道为什么他说“吉普车”一词时语气特别重。

“我什么也没有说，是电报中这么写的！”报务员说。

那人沉默了一会儿，我发现他脸上露出神秘的微笑。

“那好吧！”最后他说，“我等吉普车！”

“您就等着吧，没有别的办法！”报务员说。

他穿着咖啡色灯心绒裤，红黄相间的花格运动衫外面套着一件短皮夹克。

“您大概是厂里的师傅吧？”他们交谈时，我

插了进去，很客气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报务员的语气有点过于严肃，他总是以那种语调说话，只有打扑克时，他的声音才软得象棉花。

“是的。”那人点点头，重又神秘地微笑着。

“是哪一方面的师傅?”我问，“有各种各样的师傅呀!”

“是机械师傅，安装工。”他说。

“不错。”我说，“这是个很好的职业，假如一个人努力的话，这个职业是很赚钱的。”

当我谈到钱时，我又发现他的目光里出现了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种变化，出现了一种漩涡，表面明澈，底下阴暗，还有点苦。“大概你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吧!”我想，“喜欢钱，但不会赚!”

“对不起!”他朝我们点了点头，然后就走开了。

助手和仓库主任都来了，调车机发出一声声尖叫，行李房周围开始沸腾起来，有色金属加工厂派来了汽车。同志，“沸腾”不是最确切的词，在当时那种日子里，确切地说，工作“动”起来了，而人的血液在沸腾。还不到中午，温度计里的水银柱就已上升到了三十度。

同志，为了结束这一段故事，我得告诉你，厂里的安装工作没有进展，据说那里在闹纠纷。本来所有的机器一年前就应各就各位，可当时这个“巨物”一半厂房仍然空着，可以开着汽车在里

面跑来跑去。这种说法传到了火车站，所以当时我也想，有色金属加工厂肯定在闹纠纷。

现在，喝一小杯水润润嗓子后，我们可以继续讲下去。

我们跟“师傅”谈话后过了半个小时，我又发现他朝调度室走来了。

“他又想干什么?”报务员气呼呼地说，“连一杯茶的功夫还不到，他又来了!”

同志，我得告诉你，第一副牌愈是接近尾声，报务员就愈神经过敏。报务员的工作就是这样，容易使人神经过敏。所以当他大叫大喊，言语不干不净的时候，我也不怎么计较他。当头头的不是应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吗?有一个时候，我的耳朵都被司炉工的骂声震聋了，但我忍耐着。头头跟下属不同的是，原则上应当忍耐和理解人。

那位师傅又朝我们很有礼貌地点点头，对此我们不怎么习惯，而且也不知道他是戏弄我们呢，还是真心实意这样做。

“我有一个请求!”他说。

“您是不是没有事儿干?”报务员刺了他一句。

“我正是为工作而来的呀!”师傅温和地朝我们微笑着，“你们这里有没有修整花园的工具?譬如铁锹、小耙子?”

“您搞什么鬼名堂……”报务员说，但我及时打断了他。

“您要修整花园的工具干什么?”我平静地问。

“我想去花园干一会儿活!”他说。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接着我对他说：

“可是您懂园艺吗?假如是指我们的小花园的话，那么它属于国家所有，不是供人开心取乐的。”

“也不是用来消磨时间的!”报务员补充了一句。

“对不起!”师傅说，“我不会破坏国家的花园，只是想清除一下园中的杂草!”

我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连无聊的报务员也一个劲儿盯着电传机的纸带，仿佛一下子变成了哑巴似的。

不知道为什么恰恰这个时候，一个懒得要命的扳道员路过调度室，于是我叫住他：

“喂，米兰，给这个人一把铁锹和一把耙子吧!”

“好的!”那个鬼家伙头一次这样按规章制度的要求回答我。当他看见我背后的师傅时，便酸溜溜地作了个鬼脸，快步朝工具房走去。

而我和报务员仿佛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一样，死死盯着记事本，心想对不起，我哪有那么多时间跟你纠缠!我们偷偷地看了看手表，看玩牌的时间到了没有。

师傅脱掉了皮夹克，卷起了花衬衫袖子，勇

敢地走进了我们那个早已荒芜的小花园的荆棘丛中。

接着，一切都按时刻表进行，它是我们铁路工作最神圣的东西。吃午饭时，我们开了两个罐头，急急忙忙吃了几口，擦了擦桌子。仓库主任及时到了，银行分行前行长也汗淋淋地赶来了。在这样的大热天，他是怎样乘还是战前留下来的破车来的，这我不清楚，我有什么必要去想这件事呢！我玩着牌，扔出王牌，同时透过窗子往外瞧了瞧。

师傅已经清除到了花园的中间，一大堆荆棘和晒干了的杂草堆在一旁。鬼太阳烤得那样厉害，一时间我眼睛都花了，错把杰克当成了K。

“喂，头儿，注意一点！”报务员埋怨说，“我们要输了！”我跟他打对门。

他哀声叹气，这一天我们真的输了。仓库主任和前分行行长赢了一盒软糖。

下午四点钟，有色金属加工厂给我们来了电话：

“喂，那个埃夫蒂莫夫还在你们那里吗？”

“快结束了！”我说。

“什么？”对方惊讶地问。

“没有什么！”我说，“他在等你们那辆该死的吉普车呢！”

“哦，让他等一等吧！”对方轻松地说，“一小时后我们就到。”

那位师傅把橡皮水管拉到花园，将旱得象砖一样的土地充分地浇一遍水，正好需要一小时。

报务员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座位，但我出去看了看。我发现那人创造了一个奇迹，把一个象死人一样的花园救活了。在长满荆棘和伤人眼睛的飞藤的地方，种上了露出玫瑰色和天蓝色面容的牵牛花和蜀葵，五颜十色的指甲花伸出了脑袋，雏菊露出了笑容。不错，这些花不怎么鲜艳，看上去象害了病似的，可是，同志，从茎上可以看出它们重又活了。

下午五点钟，那个“巨物”的吉普车来了。师傅在水龙头旁边洗了洗手，仔细梳了梳留着分头的淡棕色头发，然后来到我们调度室，满脸笑容地感谢我们的热情接待，并为不能将修整花园使用过的工具擦洗干净而表示歉意。他给我留下一张名片，朝我点了点头，不停地挥着手，然后以青年人的步伐朝吉普车走去。司机已经把他的两只皮箱和一只帆布箱装上了车。

吉普车上路后，同志，我看了看他的名片，出声地念了起来：

尤利扬·埃夫蒂莫夫工程师

物理数学博士

于是，我们调度室仿佛响起了一声惊雷，一声晴天霹雳……

法律系毕业生的讲述

是的，我是人事处处长，或者按以前的叫法，是干部处主任。我毕业于法律系，从开始建厂的时候起，我就来到了有色金属加工厂。

很抱歉，编辑同志，我得首先提醒您，我的办公室里禁止吸烟。您瞧，这块牌子上写了，可是，象大多数吸烟的人一样，您没有注意到它，所以我不得不提醒您，请谅解！

请吃点花生米，喝点汽水吧，别客气！这些东西可能不合您的口味，但毕竟是有益的，而我认为对身体有无益处是衡量好不好的唯一现实尺度。

至于禁令——没有它们不行。禁令是社会智慧的产物，是社会为了自我保全而制订的。

我无法设想，假如没有禁令，生活会是什么样！肯定乱七八糟……是的，我明白您的意思，您说可以通过教育和提高纪律的自觉性来解决，

这是对的！可是自我教育和纪律呢？它们是禁令的产物。吸烟的禁令教育人尊重非吸烟者；禁止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教育人遵守纪律，不管愿意与否，您说是不是？所以"禁令"一词应当用大写字母写。

是的。而前厂长尤利扬·埃夫蒂莫夫不喜欢禁令。我不明白他是怎样用这种工作作风克服各种困难——他来时这里一片混乱——和荣获金质劳动勋章的，对此我感到很奇怪，因为他不仅不尊重禁令，而且常常犯自由主义。坦率地说，对我来讲他的成功是一种我尚未猜透、而且今后恐怕也难以猜透的秘密。

同志，叫我怎么猜呢？尤利扬·埃夫蒂莫夫是各种通则和规则中的例外现象，对此我不想加以评论。当我提到"自由主义"一词时，您以怀疑的目光看了看我。不，当然不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请别误解我的意思！在政治方面，尤利扬·埃夫蒂莫夫象一张白纸一样清白；可以说，在道德方面也是如此，因为除了吸烟外，他不玩牌，不乱搞女人，而且他吸烟也不是没有节制的……请原谅！他使用烟斗，而据我所知，吸烟斗的一般都是精明能干的要人，如教授、政治家、国务活动家。

我很难描述他的自由主义。作为一个学法律的，我总是注意人们的品行，但我无法将尤利扬·

埃夫蒂莫夫的自由主义纳入哪种条款，尤其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对这种自由主义没有确切的定义，它是无法下定义的东西，大概只能用数学来描述。您也许知道，近来用数学方程式证明了宇宙中等于零的东西并不一定等于零！您瞧，当谈到给无法下定义的东西下定义时，数学蕴含着多么大的可能性……遗憾的是我不是数学家。而尤利扬是第一流的数学家，我想唯有他才能用数学方程描述自己的自由主义，大概能在不等式方面组成一个新的方程式吧，数学正是研究这种问题的。

因为您来这里是为了收集有关此人的材料，我不会让您空手而归的——当然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会有人给您讲述他在其他方面的特点。他性格中的一个特点给我本人的印象很深，就是我说的“自由主义”。也许我把他这种特征叫做“自由主义”有点太武断了，可是普罗塔戈拉①不是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吗，我是以己度人。

我给您讲几件事，您自己作出判断吧。请再喝点汽水，是用矿泉水做的。

他事先没有通知，就突然来到H城，所以在我们领导中引起了一场混乱，难道您能想象得到

① 普罗塔戈拉（约公元前490～约前420），古希腊哲学家。

一位新厂长不事先通知就来上任了吗？连有关领导也不事先打个招呼？以至由于这一原因而引起混乱？在我看来，这种作法至少是不合乎逻辑的。一个厂长不应采取这种方式！厂长！——这意味着秩序、纪律、职位等级，对不对？而他却突然钻出来了，请原谅我这样说。普通工人不事先通知领导就来还说得过去，可是就连他们也往往会提前给某人打招呼呀，譬如有关的队长，宿舍管理员或某位司机。

您肯定会说："当然啰，厂长们不应这样做！《一千零一夜》中山鲁亚尔的诡计早已尽人皆知，没有任何必要让它在今天的实践中重演！"您甚至会感到奇怪："尤利扬·埃夫蒂莫夫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要扮演一个当代的山鲁亚尔的角色？"

编辑同志，您用不着这样感叹！当然您这样感叹是合乎逻辑的，但最好还是沉默。尤利扬·埃夫蒂莫夫的行为中有许多相互矛盾的东西，假如按照逻辑思维的法则去判断他的行为的话，那么您第一步就会碰钉子，您就试试看吧。

来有色金属加工厂之前，尤利扬在罗多彼地区领导一个工业设施的安装工作，队长是一个来自莫姆奇洛夫齐的罗多彼人，名叫尤利·埃夫蒂莫夫。不知是由于他们的名字偶然相同呢，还是因为尤利是个干活能手和优秀人材，尤利扬·埃

夫蒂莫夫很喜欢他，决定把他带到H城工地去。在部里办好各种相应的手续后，尤利扬·埃夫蒂莫夫建议他八月三日去H城，他同意了。于是，尤利扬拟了两封同一内容的电报："三日十时乘旅客列车到，尤·埃夫蒂莫夫。"尤利扬·埃夫蒂莫夫将自己的电报发给有色金属加工厂副厂长索蒂尔·什特雷夫，是通过有色金属局的通讯员发出的。他把尤利的电报发给人事处长，也就是我，并且把电报底稿交给尤利本人，让他自己去邮局发出去。至此一切都很正常，是按照事先的安排进行的，没有什么变动。由此往后是怎么回事呢？八月三日，尤利扬又让尤利从车站回去，要他在索非亚再留两天，以便从部里取设备安装补充细则。他自己前往H城，满有把握地认为索蒂尔·什特雷夫已经作好了在H站迎接他的准备。

有色金属加工厂副厂长索蒂尔·什特雷夫，从绝对意义上来说，是个仔细而又善良的人。很遗憾，他没有作迎接尤利扬·埃夫蒂莫夫的任何安排，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为什么？因为八月二日下午，他因公去了州城，直至四日凌晨才回来。他的女秘书帕夫利娜·雅娜奇科娃利用上司不在的机会，在同一时刻离开了办公室，就象大多数女秘书所做的那样。二日和三日，她没有在工厂露面。三日上午，她与男友举行结婚典礼，而同一天下午举办婚宴，怎么会露面呢？

这样，什特雷夫副厂长的邮件没有人拆开和过目，尤利扬·埃夫蒂莫夫的电报也被搁置一旁，直至四日上午。

至于尤利师傅——我及时收到了他的电报，并立即交给了厂汽车队队长，责成他们："用厂里的吉普车去迎接！"

正如您所看到的，在事物进行过程中，既遇到了意外，也碰到了相反的现象——尤利突然留在索非亚，帕夫利娜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但是这些现象并非不合乎逻辑。而从工程师、物理数学博士、刚刚走马上任的有色金属加工厂厂长尤利扬·埃夫蒂莫夫那方面来说，却存在着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首先，您想想看，他想出一个不高明的主意，把尤利·埃夫蒂莫夫从火车上拉下来，让他在索非亚等待部里的补充细则。尤利扬这一步是绝对不合逻辑的。为什么？因为尤利是个技术熟练的工人，训练有素的安装工，可尤利扬却让他做最普通的事情，把他变成一个通讯员。

尤利扬第二件心血来潮、失去理智的事，就是他以"某位"尤·埃夫蒂莫夫的身份，而不是作为"尤利扬·埃夫蒂莫夫、有色金属加工厂厂长"出现在H站。这两个概念有千差万别，"某位"是一回事，而厂长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某位"同志，谁也不会注意他，这样的人有千千万，可"厂

长同志”只有一位，人们都得朝他脱帽致敬。您想想看，本来是一个有身份的人，突然间毫无必要地隐瞒自己的身份，这与逻辑多么不相容！

第三件令人吃惊的作法是他扮演尤利师傅的角色，同意人们称他为“师傅”，不仅把自己从厂长降到了工人的位子，而且他当时所做的一切与其级别和社会地位极不相容——把自己变成了普通的园艺工人，在旱得象石板的站前花园里锄草、松土……

如果这不算是相互矛盾的现象的话，编辑同志，那就太奇怪了！

五点钟，厂里的吉普车终于修好了，根据我的命令，司机去H站接尤利·埃夫蒂莫夫。在H站，尤利·埃夫蒂莫夫，也就是尤利扬·埃夫蒂莫夫客气地问司机：“我能不能坐在前排靠近您的位子？”司机被耽搁了这么久弄烦了，气呼呼地回答说：“你想坐哪儿就坐哪儿，对我来说都一样！”尤利，也就是尤利扬·埃夫蒂莫夫厂长，温和地笑了笑，说：“谢谢，我就坐后排吧！”于是，他在后排坐下了。

就在这时，狂风骤起，乌云压顶，雷鸣电闪，下起了夏季常有的倾盆大雨。可是，不是从来祸不单行吗——途中，偏偏吉普车又出故障了。司机大声喊道：“哪有象你这样倒霉的人！我总是这

样不走运，老拉倒霉鬼。快下去推吧！”于是尤利，也就是尤利扬·埃夫蒂莫夫，只好下车，有什么办法呢。他下去就推，直至那辆破车重新发动为止。他全身湿得象只落汤鸡，却温和地对司机微笑着说：“很抱歉，由于我的缘故，让雨把您淋湿了！”那位想，这个人是想笼络我，于是憋足了劲说：“小家伙，你这种抱歉话对我有什么用？我能用它擦干……”

说着，他想进驾驶室，但尤利，也就是尤利扬·埃夫蒂莫夫一把拽住了他的手，他象陀螺一样转了几转，滑了一下，便失去平衡，摔倒在地上了。“师傅”以令人信服的灵活劲儿，登上驾驶室，从半开的门里朝那位喊道：“朋友，明天上午来找厂长道歉吧！”接着，他踩了一下起动器，等那个晕头转向的司机爬起来时，吉普车已经消失在浓浓的雨幕之中了。

这件事发生在前往H城的途中。

六点稍过，尤利扬·埃夫蒂莫夫到达了H城。天还在继续下雨。他从中心大道的新饭店门前经过，但没有在那里停车，而是继续往前开，这样到了一家小客栈，这家客栈位于H城的旧中心附近。现在这个旧中心已不复存在，连旧市场也只存在于中老年H城人的记忆之中了。推土机铲掉了一切，在旧客栈旁边，现在耸立着H城百货大楼，对面是青年电影院。编辑同志，假如您还没

有去过这个电影院的话，我建议您去参观一下，观众厅为圆形，很有意思。电影院地下室开了甜食店，隔壁是酒吧间，旁边是青年娱乐厅，可以打台球和保龄球。直至前不久，甜食店还只卖点心，禁止吸烟，禁止酗酒。遗憾的是这些好的禁令已经被遗忘了。现在那里有伏特加、威士忌、金酒，还有什么鸡尾酒，鬼知道是什么东西把他们弄糊涂了。我只知道青年人的脑袋被酒精饮料和烟草弄得糊里糊涂，他们打扮得花里花俏去跳舞，人们都说，最终不会有好结果，会导致他们放荡……离婚——不知道有多少，还有堕胎等等，而除了这一切外，再就是破坏劳动纪律。编辑同志，一旦取消禁令，就会出现这种可悲的现象！因为禁令——我们的谈话一开始，我就对您说过——是秩序和纪律的基础，没有禁令，就没有秩序和纪律，就是这么回事！

而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重新回到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有色金属加工厂前厂长尤利扬·埃夫蒂莫夫身上来吧。我们看见他路过现代化的共和国饭店，将车停在旧客栈的门前。不用说，象他这种级别的人本该住进"共和国"这样的高级饭店，工业部长来H城时，就住在那里，州里的党政领导人、工程师、财政检查员、外国人，都住在那里。这家饭店总是留有两套"超级"客房。可是尤利扬·埃夫蒂莫夫却更喜欢旧客栈。您自己

作出判断吧，难道这不是与一个人的级别和他的社会地位不相称的典型例证吗？

那时，旧客栈注定要被拆掉，但还在为生存而斗争，以给有限的顾客提供“专利品”为手段，这些东西在共和国饭店看来只会毁坏别人的好嗓子。店老板桑多大叔用穿在铁丝上烤制的小鸡来招待自己的客人。这些小鸡事先在煮开的辣椒水里烫过，上面撒满了胡椒粉和薄荷末。类似的异地风味小吃在高级饭店做梦也不会有！还有文火焖的肥肉，里面加上蔬菜和胡椒粉，以及各种烤肉串，杯子里斟满了家酿的浓葡萄酒。H城还在生产各种劣质葡萄酒，这些酒象旧客栈一样，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完蛋。过去，来这里的人大多是一些美食家，他们并非来寻找女人取乐，而主要是来满足自己在菜肴方面的各种古里古怪的要求。因此，很少有人在这里住宿。

尽管桑多大叔对各种古里古怪的现象已经习惯了，但当尤利扬要他准备两个房间，并在一间里烧上炉子时，他感到非常奇怪。“您莫不是等待女友？”他问客人。“我等一个被雨淋湿的司机来找我。”我们这位回答说。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请准备两只气锅鸡，以备万一！”“我这里没有气锅，”桑多大叔诚实地回答说，“我有烤肉的铁篦子！”“那更好！”客人友好地笑着说，“从今往后我就住在你这里！”接着，他拍了拍他的肩膀，“我马

上去换一下衣服，然后去餐厅，喝点酒开开胃。”

走到餐厅后，桑多大叔的心惊讶得快要跳出来了。他最感到高兴的是，他的客人换上了名副其实的晚服，是用深蓝色料子做的，衬衣领子绷硬，系着银灰色领带，金质别针闪闪发光。人们肯定会说——百分之百是个大人物！桑多大叔也是这么想的。于是一线秘密的希望象火花一样在他的心中燃烧起来，啊，但愿高级人士重又迈进他这旧客栈的门槛！

因为不管今天青年人怎么说，服装是人的性格的一部分！从前您见过有人穿着硬领衬衣，系着领带去餐厅进晚餐吗？要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良好的习惯已成为他的第二天性，也就是说，变成了他的性格的组成部分。同志，我非常尊重良好的习惯！良好的习惯——这就是秩序、自觉纪律；假如您同意的话，还可以说是对社会的尊重！社会信任这样的人，把指挥棒交给他们，将他们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桑多大叔以店老板天生敏锐的嗅觉，正确地评价这个人，所以在他内心里燃烧起了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那种希望之火。

但是，时间象一条河，不可能倒流。旧式客栈是生活中已经翻过去的一页，随便这个或那个怪人的何种古怪要求，都不能使它复活，不能使这一行业的人受到鼓舞。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双手赞成。我从来不喜欢古里古怪的行为。怪人

随时都会突然向你提出一些劳动法典里没有的东西，真叫人伤脑筋！

桑多大叔就这样在自己这位有代表性的客人面前摆上了六小盘各种各样的下酒菜——撒了胡椒粉、带点辣味的香薄荷，稍微炸了一下、浇上油和醋的小辣椒，橄榄油凉拌黄瓜和西红柿，酱茄子，腊肉片，他在桌上还放了一壶冰镇琥珀色白酒，然后去离柜台不远的炉灶旁，准备晚餐。

过了一会儿，那个倒霉的吉普车司机也来到餐厅，全身都湿透了，气得象个结巴一样，连话都说不清了。他走到桑多大叔跟前，问道：

“他…他妈…的师…傅在…在这里吗？”

“哪位师傅？”桑多大叔惊奇地问。

“就是那…那个开…开我的吉…吉普车来的人。”

“是吗？”店老板想了一下，“确实有一位同志开吉普车来到这里了，但不是你说的师傅呀！”接着他用头朝餐厅尽头指了指，坐在那里的尤利扬已经开始喝第二壶酒了。

司机朝桑多大叔指的地方走去。当走近尤利扬的桌前时，他呆住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不是这个人！假如真是此人的话，那么他确实一点也不象那位师傅，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厂长。

“是您开…开…走了…我的吉…吉普车吗？”

他结结巴巴地问。

“是我开了！”我们这位天使般地微笑着说。接着，他以同样甜蜜的微笑补充说：“我还要签发命令，取消你开车的资格，因为你是一个态度粗暴的司机。让你暂时去汽车队当一名普通工人，在你把嘴里的脏话改掉后，那时我再考虑是否让你重新干原来的工作。”

“可您是谁呀？”司机恢复过来了。

“我是厂长的朋友！”我们这位朝他点点头，又笑了笑。然后对他说：“快去暖暖身子吧，你的房间里生好了炉子。等你恢复好精神后，下来我们一道吃晚饭。”

这位司机不是什么英雄人物，但也不是那种未经搏斗就举手投降的人。

“可是，您有驾驶执照吗？”轮到他 转 入进攻了。“据我所知，”他说，“要是没有执照，就是厂长的朋友也禁止开小汽车。除此以外，这是国家的车呀！”

“你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对此 我很 欣赏！”我们这位以满意的目光看了看他。“因为你敢于向我提问，”他继续说，“我将请求我的朋友委任你当汽车队的领班，可你别做最落后的人！”接着向他出示了驾驶执照，这是第一流司机的执照！

那位摆了摆手，深深叹了一口气，有气无力地朝自己的房间走去。现在 他完全 象 一 只落汤

鸡。

“我等你吃晚饭，小伙子！”尤利扬·埃夫蒂莫夫在他后面喊道。

“谢谢，您自己吃吧！”司机回答说，他更加显得有气无力了，“我不想吃！”

“那就随你的便吧！”尤利扬耸了耸肩。

他仿佛一下子把他忘了，不停地喝酒，看样子象个陷入沉思和忧虑之中的人，各种小菜几乎动也没有动一下，不象是个馋鬼或贪吃的人。晚饭准备好后，他让店老板给司机送去一只小鸡和烤面包，还有一小瓶白兰地。“让那个倒霉鬼暖和一下身子吧！”他笑了笑，又立刻把他忘了。为了有个伴，他邀请店老板坐到自己的桌旁。“请坐！”他对他说，“让我们一起吃晚饭吧！瞧外面下起了多么大的雨啊！”

“是在下雨呀！”店老板回答说。

“这种时候一个人独自呆着是危险的！”尤利扬说。

“那是为什么呀，先生？这里没有任何东西会对您构成威胁！我的店光明正大，何况警察局离这里不远。”

“是吗？”尤利扬笑了起来，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儿笑。

店老板后来说，他笑得并不特别愉快。无论怎样，他高兴地接受了尤利扬的邀请，坐到他的

桌旁，津津有味地吃着菜肴，并给客人讲述了H城生活中的各种故事。

尤利扬·埃夫蒂莫夫抵达H城后，他对高级饭店的蔑视，住进旧客栈；他对吉普车司机不明朗的态度——这一切的一切，当考虑到他毕竟是一位厂长时，有些事情很难说是符合正常逻辑的。编辑同志，您自己想想看，哪个大厂的厂长会坐在一辆破旧吉普车的方向盘前，开车去工作地点呢？哪一个尊重自己的领导者，而且还是工程师和博士，会自作主张处理一个粗鲁的司机呢？他还扬言到达工作地点后，要副厂长发布一项解雇这位司机或者降低他的工资的命令，说是按劳动法典办事！要用这种办法对付调皮捣蛋的人，要追究这种人的责任……然后，一个象他这种级别的人怎么不住进高级饭店，而去一个过时的旧客栈凑热闹呢？还有给犯了错误的司机送白兰地，邀请一个素不相识、脱离了时代的轨道、还在维持早已过时的旧客栈的店老板同桌进餐——这是不是曲解了民主的含义呢？

根据健全的理智的逻辑，假如这一切不是自相矛盾和互不相容的话，那就太奇怪了！

尽管行为有些古怪，但尤利扬·埃夫蒂莫夫出色地掌握了管理艺术，在很短的时间内，安装工作和各项技术装备进展迅速。首先他是个教育家，了解人们的弱点，善于找到最有效的方法去

克服它。编辑同志，我要告诉您，在他来到有色金属加工厂之前，集体宿舍变成了打牌的场所，同时还酒气熏天，烟雾腾腾，简直象座地狱。谁也不遵守禁令，尽管根据我的明确的命令，各集体宿舍的墙上都张贴了这样的标语："严禁打牌！""室内严禁吸烟！"可谁也不重视这些禁令。

那时，工人集体宿舍安排在一些木板棚里。正如神经科医生所嘱咐的，为了使神经得到休息，我禁止使用大于四十烛光的灯泡，晚上十点钟后，只许每个房间开一盏灯。这样，节约了电，使疲倦的人得到休息，恢复体力。但是，尽管我采取了许多措施，灯还是一直亮到半夜，骰子啮啮响，扑克牌响个不停，一些年轻的坏小子拉起手风琴，使劲弹着吉他。这个工地的人来自全国各地，什么人都有，还发生过青年人跳进女工集体宿舍的现象呢。

尤利扬·埃夫蒂莫夫一到，就命令在每个集体宿舍放一台电视机，指定吸烟地点，开放棋类游艺室、报刊阅览室，而在离工棚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的地方，盖了——尽管说得有点夸张——音乐亭。这是一个简陋的木板棚，没有围墙，只在上面盖了一个圆锥形棚顶。您瞧，短短的时间内，他就使那些禁令成为多余的了。您大概会问那些爱喝酒的人怎么办？他们被赶出宿舍，钻进音乐亭子里，但又从那里被赐了出来，最后不得

不钻进灌木丛里，蛇和其他的爬虫又把他们从那里赶跑了，他们只好边喝啤酒，边仰望月亮和星星。

我知道这次改革活动将以清查财务、扣回日常用品方面未经核准而支出的款项而结束，但尤利扬做得非常巧妙。就在那年，他让厂里业余文艺队为H城人举办了两场音乐会，而将这件事遮掩过了。

自尤利扬·埃夫蒂莫夫厂长走马上任后，安装工作和建筑施工紧张地开展了：工厂装备了机器；厂房南面，开始迅速地竖起工人集体宿舍楼的砖墙和水泥柱。

在工厂宽敞的大厅里，工人们安装好了各种笨重而又复杂的机器，譬如我记得电力水压机就有 250 吨重。编辑同志，我跟您讲一个安装这部机器时发生的，跟我们前厂长的古怪性格有关的故事吧。

这个碾压“锤”应当安装在厂里的锻造分车间，整个车间约有五十米长，位于大厅的前部。为了把机器运到这个地方，司机从车间的东门用天车把“锤子”和有关的设备逐渐运过去。由于路线太长，这一工作进展很慢，而且我们这位司机有个习惯，就是每隔三小时得从驾驶室下来，喝一杯咖啡，吸一支烟。您会问：领导怎么会容忍这样的工人？会容忍的，因为他是个优秀的专业人

材，在本职工作方面，他一贯是模范工作者，不知得过多少次劳动奖章。这样高水平的专业人材，当时很难找到，哪儿也没有。车间主任给他提意见时，他回答说："不喝杯咖啡，不吸支烟，我就头晕，这是职业病，因为我老是从上往下瞧。"第二天批评他时，西莫师傅生气地说："假如我下来使您感到不愉快的话，那就请另找吊车司机吧！"

在那个巨锤运到车间之前，我们不能没有吊车司机呀，可是西莫师傅的行为也真叫人难忍——会对整个集体的纪律产生不良影响的。

一天上午，西莫师傅从吊车上下来之前，尤利扬·埃夫蒂莫夫指示在车间中央摆上一张方桌，铺上雪白的桌布，而旁边摆了一张厂长的客人坐的皮沙发，有人送来了一热水瓶咖啡，一包上等香烟，还有杯子和碟子。尤利扬的女秘书站在桌旁，身穿服务员的工作服。西莫师傅从吊车上下来后，穿着工作服的厂长朝他迎面走去：

"西莫师傅，你好！"尤利扬热情地朝他点点头，甜蜜地微笑着，"跟你握手我感到非常愉快！"

"我也感到非常愉快！"西莫师傅回答说，并以疑问的目光朝四周瞧了瞧。

"我来为你效劳！"尤利扬对他说，"来，请喝咖啡，请吸烟！如果有什么不合你的口味的话，请说一声，下次我们尽量改进！"

"那是为什么?"我们这位搔着后脑勺,觉得陷入了圈套。"没有必要，我跑到咖啡馆,要多少有多少!"

"你的头昏沉沉的，怎么好让你跑呢,西莫师傅，千万别这样做!外面气候潮湿,秋雨绵绵,要是你感冒了怎么办?我们从哪里能找到象你这样技术熟练、又很自觉的工人呢?"

尤利扬一边温和地说，一边拉着西莫师傅的手，让他坐在皮沙发上。女秘书马上为他满满地倒了一杯咖啡。

"可是……"西莫师傅开始绷着脸，皱起眉头望着咖啡如何冒出甜而又香的热气。"可是……"

"没有关系，西莫师傅,不要担心工作!"尤利扬拍着他的肩膀，"你休息吧,我代你去开一会儿吊车。别担心，我周密地思考过，不会让大锤和有关的部件放在外面淋雨的!我这两只手干什么使的呀!"

当我们这位老爷司机正在思考如何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不致于弄得尴尬不堪时，尤利扬已经走了。他沿着梯子往上爬,走进吊车驾驶室,坐在西莫师傅的位子上，握着操纵杆。开吊车他不如老师傅那么熟练，但能自如地对付各种操纵杆和踏板，所以他毫不迟疑地将各种部件吊到指定的地方。运输队的工人们在下面挥动着鸭舌帽,热情地为这位胜利者高呼"乌拉"，因为今天西莫

师傅喝的咖啡，不会要他们掏腰包。

这时西莫师傅喝起咖啡来象喝毒药一样，他不敢抬起眼睛往上瞧，不敢朝旁边看，因为无论谁路过车间时，都会象对待叛徒一样看待他的。

“下去吧，厂长同志，这不是您干的活！”

“瞧你说的，西莫师傅，这种活难不倒我！”

“快放下走吧，别让人笑话我啦！”

“可是头怎么样？”尤利扬用手指敲了敲前额，“不晕了吧？”

“已经过去了，厂长同志，我一点也不感到晕了。”

从这一天起，西莫师傅规规矩矩地坐在驾驶室里，耐心地等待下班时间到来。

这件事后不久，我遇见了尤利扬。

“当您相信西莫师傅的良心时，”我问他，“不是过于拿自己的威信冒险吗？”

“是冒险呀！”尤利扬微笑着说，接着他的眼睛突然暗淡起来。这种现象在他身上常常发生，嘴角边还挂着微笑，而眼睛却开始发黑。

“您为什么要那样做呢？”我又问他。

他耸了耸肩，没有回答，继续朝前走去，时不时地朝旁边挥挥手。“他好象不让人提不愉快的问题”——这种想法掠过我的脑际。

我不知道自己对不对，但有时我觉得在某种情况下，他过于冒险；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他好

象是故意寻求风险。而冒险，根据我的浅薄的见解，根本就没有必要，因为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计划超额完成了，保持了应有的进度，工作质量也很少有低于世界水平的。这些成绩是如何取得的呢？厂里有当时留下来的专家，请问他们吧，他们会给您讲的……我想说的是冒险行为。冒险一词总是或多或少地使我不安，所以凡是带有冒险的行为，都会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就象地震、火灾和水灾难以令人忘记一样。

这件事发生在十二月，他上任后已经过了十七个月。我想大概是新年前最后一周吧。我们弄到了一批铅和锡，约有六十吨，都装在集装箱里，每箱约有四五吨重。下了一场大雪，当运输队从火车站出发时，雪还下个不停。不知您注意到了没有，离H城不远，有一段很陡的上坡道，路在那里来了个急转弯，这地方被东北边一块高地挡住了，使它成为避风的地方，因为高地象一道屏障一样挡住了东北风。这里的积雪有一米多厚。

不过，我觉得有必要暂时放下这个故事，重点讲讲尤利扬，以便让您了解他是在怎样的心情之中碰上这件不愉快的事情的。尽管尤利扬待人热情，有礼貌，但他是个性格内向的人——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他常常陷入沉思之中，仿佛有一种存在很久的痛苦，不时地拜访他，在他的心

灵上投下了阴影。也许这不是痛苦，而是某些问题，对此他绞尽脑汁，可仍然无法找到合适的答案。对这些问题的本质，对折磨着他的痛苦的实质，我不敢妄加推测，也许他脑子里有某种新的施工计划，被“上面”否定了，没有被采纳……谁知道呢！也许他那稀奇古怪的性格，对他在生产方面提出的一些聪明而合理的主意，投下了怀疑的阴影，加上领导通不过，这种情况使他很痛苦。完全是可能的！……或许他在研究复杂的数学题——他不是数学家吗——可是缺乏解答难题的能力。因为他是博士，而这些题目又正是博士和教授这一类人才能理解和解答的……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而当自尊心得不到满足时，众所周知，他便会感到眼前一片黑暗。

他眼睛发黑，大概是由于这种原因造成的。他有一双很好的眼睛，浅灰色的，正如我已经给您说过——令人感到和蔼可亲。只要看他一眼，您就会觉得他是一个愉快的、待人温和和友好的人。可是您与他交谈时，他的眼里会突然出现云彩，他的目光随之暗淡下来。他将目光投向别处，好象是在同您交谈，实际上在想别的事情。他不象那些心不在焉的人一样瞎想一气，而是想他自身的事，在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之中漫游。编辑同志，这时他的目光会变得非常奇怪——其中还在

同您交谈的那一小部分是愉快的，另外那转向他自身的大部分却变得暗淡起来，黑得象井底，不用说，外面的人无法看清底下的情况。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为施工问题跟领导争吵使他不安，要么是在科学方面一些他没有解答的难题常在他脑子里转——我是这么想的，因为学者们也有自己深深的忧虑和不愉快。他们一想起这些事，眼睛里就会发黑。就拿我来说吧，干部问题一压到我头上，我就感到头痛，更何况用数学公式证明宇宙中等于零的东西并不等于零，而毕竟是一种东西，也就是说它有重量和相应的长度呢……

同志，我想对您说的是我们厂长当时并不愉快。他的眼神常常发黑，而外面是白茫茫的冬天，就象画家画的一样。在H城感觉不到冬天的美丽，因为它是盆地，陶瓷厂和玻璃厂的滚滚浓烟常常笼罩在城市的上空，要是今天下了雪，明天它就会脏得象一件没有洗的衬衣。有色金属加工厂离H城三公里，不算远，但它位于盆地口上，这里总有风——上午刮东风，下午刮西风，把烟雾吹向巴尔干山和平原，所以雪能长时间保持白色，一出太阳，白得耀眼！

可是，那年十二月，太阳几乎没有从天空探出头来，不停地下雪，积雪很厚。一个山丘上——路正好从那里拐弯，通往厂里——积雪封住了道

路，不能通行了，尤利扬派了一队又一队的人去清扫，但无济于事。他们好不容易清扫一段，一阵大雪又盖满了。而想让厂里这批货暂时存放在火车站，那是不可能的，我们那些没有卸货的车皮乱七八糟地挤在月台附近，造成了混乱，必须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这时，尤利扬吩咐从雪中清扫出一条小道。这条小道从那难以通过的拐弯处开始，一直向下延伸，直至连接大路。在不同的地段，小道有时陡，有时平缓，坡度大致为10—30度。与此同时，厂里的木工车间开始用厚的长方木和圆木紧张地制作大雪橇。

编辑同志，您会问为什么尤利扬决定采取这个冒险的措施，难道H城没有扫雪机吗?是的，H城没有扫雪机，州城有一台，但那一台也坏了。

天气特别冷，暴风雪使人睁不开眼，叫人喘不过气来，空气中散发着磨热的轮胎味。司机们把各种骂人的话都骂尽了后，纷纷关上了驾驶室的门，点燃了香烟，露出一副副对无论谁的命运都不感兴趣的样子(当然啰，他们自己本身的命运除外)。这时，尤利扬命令卸下集装箱，装在雪橇上，甚至连行政人员也被叫来帮助卸集装箱。

送来了二十把雪橇，每把有两个很粗的操纵杆。箱子倒不大，但死沉沉的。这段路约一公里多长，狂风大雪影响能见度，所以这种作法是非

常危险的，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愿上帝保佑雪橇不要在什么地方翻倒，否则驾驶雪橇的人只会在雪中留下一滩鲜红的印记，四五吨压在一个人身上——您想想看，那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惨景啊！我至今只要一想这件不妥当的事，背上就会起鸡皮疙瘩。

不管多么危险，还是有很多自愿报名的人，但尤利扬从候选人中只挑选了没有成家的小伙子。当跳上第一把雪橇的不是别人，而是尤利扬，是厂长时，担心和惊讶达到了顶点！……第一次冲锋时，总司令能冲在战士们的前面吗？什特雷夫副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都竭力劝他放弃这种任何人都不需要的英雄行为，不是有足够的自愿人员吗，可他甚至不愿听他们把话说完。这一天，他的目光里没有丝毫的愉快。

这个暴风雨般的一天，有一个特别的场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们都聚集在雪橇通过的路线的中段，注视着雪橇如何从拐弯处下来，又如何最后到达大路上。当尤利扬的雪橇——它是为其他的雪橇探路和开辟道路的第一把雪橇——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时，突然间它朝右边歪斜了，雪橇前面的什么地方妨碍它前进；然后又歪向左边，一根圆木飞到空中去了。尤利扬身后五吨重的箱子摇摇晃晃，把绳子绷得紧紧的，连我都吓得把眼睛闭上了……什特雷夫副厂长的夫人站在

我旁边，她象被捅了一刀似的尖叫一声，顿时倒在雪地里。

当我睁开眼睛时，尤利扬的雪橇快到大路边了。什特雷夫副厂长把妻子扶起来，她脸色铁青，不知是冻的，还是由于紧张所致；她的下巴不停地颤抖，象装在晃晃荡荡的弹簧上似的。

“快给她穿心排草酊！”党委书记说。

谁也没有带这种药。

什特雷夫副厂长帮她掸掉粘在大衣下摆上的雪。就在这时——同志，您想想看——她开始笑起来，但不是笑自己。她的眼睛里冒出了泪水。

过了一会儿，尤利扬也来了。他带来两个人，手里都拿着铁锹，以便把雪道上这个该死的地方填平。

“当看见您的雪橇摇晃时，什特雷娃同志倒在地上了。”我附在他耳旁小声说。

同志，您瞧他怎么着，他连肩也没有耸一下，是风刮得他听不见呢，还是他压根儿没有注意——我至今不知道。

第二天，贺电象雪片似的从四面八方飞来了——有部长的，州委领导的，各部门头头的。他看了一部分，其他的直接扔进字纸篓里了。而仅仅过了一星期，同志，当他处于荣誉的顶峰、一个隆重而充满胜利的新年在等待他时，他突然丢下有色金属加工厂，离开了H城，再也没有回来。

在工作方面，没有理由使他迈出这一步，厂里的工作进行得愈来愈好。

可是，一个人怎么会知道别人充满矛盾和不协调的内心里发生的事情呢？

宿舍管理员的讲述

尤利扬·埃夫蒂莫夫是个怪人，但又是个有功劳的人。由于这种种原因，我们必须以理解和负责任的态度谈论他。您可不能去找各种倒霉的人询问尤利扬这一类人的情况，因为他们会从个人受挫折的角度去描述他；同样不能找对自己的“地位”不满意的人——对这种人来说，领导一开始就是他们倒霉的根源；也不能去询问那些“候鸟”——他们从这个工地转到那个工地，呆不长，所以他们的印象是表面的。同志，我在工地上呆了将近二十年，积累了不少经验，五花八门的现象见得可多呢。因此，我对自己看问题的见解很自信。当我说尤利扬·埃夫蒂莫夫精通业务，但是个怪人时，您要相信我。

同志，在尤利扬·埃夫蒂莫夫负责厂里的工作时，我不是什么头头，就是说当时我是宿舍管理员，但不是管理处的头。我安排工人们住进工

棚和集体宿舍，分发枕套和床单；每天早上给厨师们称出一天生活所必需的油、大米和其他食品。我只有一个助手，所以工作负担很重，象一匹马沿上坡道拉超重的车一样。但我没有怨言，因为管理员职务是受人尊敬的，何况我的工资也不算低。此外，我没有失去希望，我相信尤利扬有朝一日会意识到管理处的重要性，会让我当头头的。

遗憾的是，他当权的时候，管理处没有建立起来。不过尽管如此，我现在荣幸地当了处长，这应归功于我们的前厂长尤利扬·埃夫蒂莫夫。我跟您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吧。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他突然离开了有色金属加工厂和H城，但上午——请注意！这天上午他写了两份鉴定：一份是关于助手什特雷夫的，一份是我的。

同志，对类似的举动，您有什么想法？能解释一下吗？当尤利扬·埃夫蒂莫夫永远离开有色金属加工厂和H城时，谁知道他心里有多重的包袱啊！奇怪的是，恰恰在生活中如此痛苦的时刻，他想到了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对什特雷夫来说，还可以说得过去，他是副厂长，尤利扬几乎每天晚上去他那里玩，而且他家里还为尤利扬留了一间房子，尽管他也住别的地方。我是想说，对什特雷夫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可对于我呢？

这件怪事还不仅仅在于他注意到了我。同志，

他在鉴定中把我表扬了一番，那样夸奖我，把我描绘得那么好，连我本人都暗暗怀疑自己——尤利扬·埃夫蒂莫夫指的是我，还是另外一个人？他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在谈到我的真正的功劳时，还说了一些并非真实的，而是他当时想出来的事情。他杜撰出各种事例，说我是个英明的当家人和理想的管理员，说他几乎把我当成自己亲密的顾问和一个他与之商量最重要的意见的人。

当新厂长给我宣读这篇鉴定时，同志，我感到万分惊讶！我站在那里听着，就象在蒸笼里似的，汗直往外冒。因为实际情况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指我那些不值一提的功劳，而是指他对我的关心。同志，在他坐下来给我写鉴定之前，我对他来说等于零，什么也不是，从来没有专门找我谈过话，没有跟我商量过任何问题。无论我怎样试图跟他谈谈工作中的事，他总是叫我去找他的助手什特雷夫，没有为我挤出过一点时间。哦，他来工厂的头一天除外，当时我们一起呆了几乎一整天，直至下午很晚的时候。

不过，同志，您不要以为他只对我采取这种轻视态度，绝对不是！他对所有的行政人员都是这样——冷冰冰的，不过问行政人员的事情，把行政人员全部交给自己的助手什特雷夫。我听一些年纪大的同志说，在行政人员和行政事务方面，他象那些曾经领导过全国第一批大工程——例如

季米特洛夫格勒混凝土预制厂、斯坦姆波利基斯水库、列宁厂和克雷米科夫齐钢铁联合厂的负责人一样。他们特别注意穿棉袄的人，尊重他们．这样的人是领导注意的中心；而对于我们这些拿着公文包的人——当然啰，工程师除外，不过当时他们也穿棉袄——却把我们看成是办公室人员。

尤利扬·埃夫蒂莫夫作为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并不轻视我们的工作，没有使我们受过委屈，待我们还算热情，但他内心里同我们格格不入，他心里没有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当新厂长把我叫去，给我宣读尤利扬写的鉴定时，我感到万分惊讶的原因。瞧，马上就带来了结果，这是理所当然的。新厂长上任后不几天，就委任我当管理处处长。

直至今天，我还无法解释这件事，但每当我想起它时，我脑海里就会出现尤利扬离开H城前不久发生的另一件事。当时，我们从雪里开辟一条路，好用雪橇拉装铜的集装箱，卡车没有来得及将它们运到厂里。下了一场大雪，天气严寒，道路积满了厚厚的雪，我们无法从城里运食品，燃料也用完了。一天早上，我们在食堂分发了干粮，但却无法烧开水泡茶，一些好找碴儿的人开始抗议。这时，一贯在公共食堂同工人们一起吃早点和午饭的尤利扬，发表了简短而特殊的演

说。

我还记得他当时说的一些话。“我们象行军中的战士！”他说，“每一个人都应当了解，在行军条件下，困难是战士每天都会遇到的客人！……当我们的工厂尚未稳稳地站住脚时，会有困难的。”那么什么时候才能站住脚呢？”有人问。“当我们按时完成计划，我们生产的有色金属产品达到了世界水平时！”尤利扬说，“那时，我们也会有通往车站的铁路支线，在城里会有自己的集体宿舍，铁路线直达工厂的车间。那时，我们将象完成了战斗任务的战士一样，不再象野营似的过冬了，我们将会生活得很好。而现在，我们象在行军，有时条件好一点，有时差一点，谁要是不适应这样的生活，那就请走吧，愿他一帆风顺！”

同志，这番话中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我来告诉您。我早就跑过很多建设工地，但在有色金属加工厂呆下来了，因为这里交给了我更负责的工作。我知道自己能当上头头，多亏尤利扬，是他把我推荐给现任厂长的。就是说，我没有理由说他的坏话。不过，要是把近十年来我在他们手下工作过的各位领导比较一下的话，应该说在某些方面，他走在他们前面；而在另一些方面，他落在了后面。他用电子计算机工作，使用电子技术检查重点施工的地方；而不重视诸如管理处、供应、生活设备这样一些平凡工作。现在还有哪

位厂长把“行军”挂在嘴上？宿营和行军已是过去的事情，建设初期曾是那样。是呀！今天有谁会决定用雪橇去拉几吨重的集装箱呢？尤利扬·埃夫蒂莫夫不给索非亚发电报，让他们派扫雪机来支援，却在一米深的雪里开辟道路！

好吧，就假定他在某些方面象个落后于时代的领导者吧。我这个应该感谢他的人，也同样要说：“他落后了！”“怎么？”有人会愤怒地质问，“当他，而不是别人，使厂里的工作摆脱落后状态时，你们怎么把他说成是‘落后的人’？难道用落后的方法能使工作摆脱落后状态吗？”有人会这样愤怒地质问，我会马上藏起自己的尾巴。同志，如果您的想法跟我一样的话，您也会藏起尾巴的，会这样做的。由于挽救了安装工作的落后局面，提前完成了任务，尤利扬·埃夫蒂莫夫荣获了国家领导人颁发的金质劳动勋章！

瞧，就是这么个死结！从哪里着手把它解开呢？

现在，我给您讲讲我们头一天认识的情况吧。一天上午，什特雷夫副厂长给我来电话：“快到厂长办公室来一趟，我给你介绍新厂长。以后你得按他的吩咐工作！”“好吧，”我说，“会办到的，谁叫我当管理员呢！”

在去厂长办公室的楼梯上，我碰上了司机纳斯科。

“见到新厂长了吗?”我问他，“人怎么样?”

“来者不善!”纳斯科耸了耸肩，“为我在路上说的一句话，就用调动工作来处分我，让我去汽车队当普通工人，还让我步行七公里才到城里!”

“别胡说!”我惊呆了，“真的这么厉害吗?”

“不知道!”纳斯科耸耸肩，“后来他请我喝白兰地，让我暖暖身子，而今天早上又以严厉申斥减轻了我的处分。”

在前厅里，我差点儿跟工会主席撞了个满怀。他象从澡堂里出来一样，浑身是汗，满脸通红，一副对什么事情困惑不解的样子。

“莫不是新厂长给了你很大的压力?”我开玩笑地问。

“不知道!”他也象纳斯科一样耸耸肩，把我拉到旁边的窗前，小声地对我说：“今天早上八点以前他就来了，八点整，他命令我关上大门。‘把所有迟到的人都记下来!’他对我说，‘工人、技师、工程师都一样! 并发布一道命令，给他们以申斥和警告处分。在厂部所有重要的地方贴上通告——安装工作继续停滞不前时，将按劳动法中最严厉的条款处分迟到者!’”

“你瞧他!”我免强笑了笑，但我马上感到笑不起来，“就是说他是个严厉的人啰，动不动就处分别人。”

“问题在于表面上看不出他是个严厉的人!”

工会主席摇了摇头。接着，他叹了一口气说："你很难理解他——发布处分命令时还笑，仿佛分发礼物似的。"

"这种人最危险！"我说。因为我在许多工地上见过各种各样的人，积累了不少经验，所以我最后说："对这种人要永远保持警惕！"

我走进厂长办公室。什特雷夫坐在沙发上，而新厂长端端正正站在开着的窗子跟前。我觉得比较正确的应该是厂长坐在沙发上，而什特雷夫站在窗子跟前，不过随便他们怎么着吧。后来我得知他们两人年纪相同，但当时我觉得尤利扬大一些。这不是说他脸上和身材方面有什么老年人的迹象。他中等身材，但象田径运动员一样端正挺拔；他颧骨突出，刚刚从嘴角边露出两道皱纹，而他的嘴象画的一样——两片富于性感的嘴唇，正如今天青年人所说的，会使女人为之倾倒。一个高高的额头足有一寸半，象个篮球场，而他的眼睛象两只准备展翅飞翔的鸽子。他的头发是淡棕色的，但又好象呈淡褐色，在阳光下显得柔和、光亮，活象成熟的玉米穗。尤利扬看上去就是这副样子：是个聪明的美男子，而不是轻浮的美男子！是的，尽管他眉目清秀，但看上去显得比什特雷夫年纪大。虽然什特雷夫，同志，请记住这一点，虽然什特雷夫有胡子——一寸长，还有点驼背，同这个什特雷夫比起来，尤利扬看上去却

要大一些，真是怪事！同志……看样子他是个年轻的男子，可是无论跟哪个同岁的人站在一起，给人最初的印象是他显得年纪大。总工程师尼科拉·尼科迪莫夫当时五十岁，但当我头一次见他们在一起时，我觉得尤利扬年纪大。无论从身材、脸部、年龄——他三十六岁，尼科迪莫夫五十岁——来看，跟尼科迪莫夫比起来，他当然年轻。但是，我不是对你说了吗——无论跟谁在一起，头一眼看上去，他总是显得年纪大。然后这个不真实的概念消失了，可是人往往会记住头一眼给他的印象！

当我走进办公室时，他朝前迈了一步，同我握手。他的右手不象工人的手，但握得很有力，象个男子汉，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内在的力量，而不是外在的，无论如何不象优柔寡断的人的手。当时我有点惊慌，他客气地朝我笑着，给我指了指一把椅子，叫我坐下。

“斯托扬师傅，你想喝什么咖啡，土耳其的还是一般的？”他以象跟自己人说话的那种语气问我，仿佛童年时代我就跟他玩过捉迷藏和跳背游戏似的。

“一般的！”我小声说。

他按了一下铃，女秘书，也就是新娘子帕夫利娜从隔壁房间过来了。如果说我刚刚碰到的工会主席象个从闷热的澡堂里走出来的人一样的

话，那么帕夫利娜的脸上则留下了伤透了心的痕迹。她脸色苍白，目光不停地转动，战战兢兢地从这件东西转到那件东西上，眼睛浮肿，仿佛这个可怜的女人在厂部厨房的冰窖里呆了一两个小时似的。“新厂长大概把她刮得不轻吧！”我脑子里这样想。从此以后我的心离他远了，直至他离开前不久夸奖我时，我才重又接近这位大人。对我本人，他倒没有使过什么坏；至于他不想单独成立管理处，这是他对待行政工作总政策的态度，而不是针对我个人的，这样，我没有理由把他往坏处想。不过，从我看见女秘书帕夫利娜——伤透了心的新娘的那一天起，仿佛有一堵墙横在我与他之间。

我不知道别人对您说过什么，还会对您说什么，大概您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吧，因为他是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说好——特殊的人。

还是让我们回到我已经开始给您讲述的那件事情上来吧。

“请给斯托扬·斯塔门科夫要一杯咖啡和一杯白兰地！”他对帕夫利娜说，毫不礼貌地从头到脚打量着她。

这时，他的嘴角边露出了一丝同情的微笑。可是同志，就在那一刹那间，这笑容马上就消失了，来得快去得也快。同志，我还发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这一丝同情的微笑不仅没有使他的

目光明亮起来，反而使他的眼睛变暗了，当时在他和我们之间，仿佛降下了一道帷幕，他简直把我们忘了，大概是在思考自己的工作吧，仿佛我们已不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似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令人感到奇怪的人！

同志，后来我有机会多次观察他这种爱好沉思、一时间把周围的人都忘掉的习惯。他在公共食堂吃午饭，与他同桌进餐的一般有总工程师尼科迪莫夫和助手什特雷夫。在他来厂之前，这两人在城里吃饭——什特雷夫在家里吃，而尼科迪莫夫在高级饭店的餐厅吃。可是后来由于在上司面前不好意思，他们也不得不开始在公共食堂进餐了。他俩与他同坐一桌，而那张桌子就在我对面，所以我有时能看见他如何瞬息间流露出一丝微笑，又如何把那些跟他同桌进餐、受人尊敬的人忘了。但他们并不生气。尼科迪莫夫不爱说话，而什特雷夫就其性格来说是个温和而谦虚的人。一位剔着牙，另一位愉快地和对一切都不在乎地微笑着，而尤利扬象注视着什么东西——天知道是什么，只有他的眼睛才能看见。

那天早上，当帕夫利娜走进房间，为我准备咖啡时，也是如此。我看不惯他那陷入沉思的样子，更看不惯他那奇怪的微笑。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微笑就在出现的那一瞬间消失了，所以我感到很尴尬，偷偷地朝什特雷夫看了看，但愿从他

那里略知一二眼前这位是个什么人。可是什特雷夫一个劲儿望着自己的脚，大概感到自己象一条岸上的鱼吧，他——撇开工作中的事情不说——是个对人非常客气的人。这是我头一次接触我们这位新领导的怪脾气。

而我们这位领导突然间神经质地大笑起来，摊开两手。说实在的，我背上起了鸡皮疙瘩。

“这个年轻的女人，”他说的是帕夫利娜，“大概以为碰上了一条披着人皮的狼吧！……全身颤抖着，究竟是为什么呢？她在我身上看到的应该是温顺的羊，而不是狼！真的是这样，你们说呢？”他转向什特雷夫，对他说：“我至少该给她最后警告处分，可我却心软了，只给她严厉申斥的处分。我从一个客观的裁判——我应当成为这种人——变成了羊羔，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究竟是为什么？”

同志，后来我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八月二日和三日，帕夫利娜不是锁上了办公室，去办婚事吗，尤利扬一到厂长办公室就处分她。本来这件事是他来厂之前发生的，他完全可以高抬贵手，不去过问。可是，正如您看到的，他没有高抬贵手，甚至恰恰相反。我已经给您讲了他如何在什特雷夫和我面前表示后悔，似乎发了“善心”，在他看来处理得太轻了。他就是这么个人！不说“早上好”和“祝贺你”，而给她严厉申斥的处分。你就

吻一下她的小手吧，那我才觉得你心地善良呢！

您大概会问什特雷夫是什么态度吧？他毕竟是副厂长呀！怎么不维护一下那个女孩子呢？唉，同志，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的性格！什特雷夫从来就是一个态度温和、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和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没有个人的私欲。如果上级对他说："什特雷夫，你同意当厂长吗？"他会象被开水烫了似的往后缩，尽管他对厂里的工作了如指掌。要是我，尽管我不是工程师，会马上说："当然同意，只要马上给我发布命令！"而他肯定会往后缩。因为我习惯于独立处理自己的工作，而他一贯是助手，总觉得需要靠山。有的人生来就是当头的料，而另一些人生来就是当助手的料。同志，他属于第二种人，属于那种在强者的影子下生活的人。培养他们当领导，但他们没有勇气去掌舵，缺乏自信心。唉，同志，要是我有半张工程师文凭的话，那就不是领导一个厂，而是领导一个象克雷米科夫齐那样的联合企业啰！可是，哎！……尽管当管理处处长也不坏。什特雷夫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没有当厂长的野心，真是个闷葫芦。虽然有点驼背，但他的胡子使他象预言家耶雷米雅，您知道有多少已婚女子思慕他，对他表示亲切吗？

同志，我不是对您说过吗，我要是处在他的地位，也准会象耶雷米雅的……哈，哈！

您问他是否结婚了？那还用问！他妻子是个大美人，象水一样清澈，象糖一样甜；不过作为男人，在我们之间可以这样说，即使她是个宝贝，难道人一辈子就注定只能跟一个女人吗？

在这一方面，同志，这一带倒是没有流传过有关什特雷夫的流言蜚语，没有听说他跟哪个女人有过来往。

在这个问题上，我对尤利扬也不怎么了解。唉，到处嘀嘀咕咕，说他跟什特雷夫的妻子似乎有什么关系。不过，我本人不了解这件事，尽管就其性格来说，尤利扬是个怪人，是个危险的男人。退一步说，即使他们之间真有什么事，即使她真属于尤利扬，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会象别的人。他待我不错，我不便说他的闲话；同时也得留点心，要是有朝一日他又回到有色金属加工厂的话，那怎么办？

要是真的那样，同志，那我就会在对他说“早上好”之前，就被他象扔软木塞一样从厂里踢出去了；而他准会在后面同情地望着我，迷惑不解地问自己的助手：“这个人为什么大喊大叫？我象羊羔一样对待他，并未亏待过他，而他却大喊大叫，究竟为什么？”

同志，现在我跟您说说同一天上午，我们是如何跟他一道去H城，为他安排住所的。

临行之前，什特雷夫不好意思地咳嗽了几声，

说起话来仿佛有点结巴，对尤利扬说：

“前厂长住在共和国饭店，这是一家现代化的新饭店，有各种各样的设备。不过，要是您不喜欢的话……饭店毕竟是饭店，也就是说没有那种亲密的气氛，对不对？您可以看着办……唉，我们家二楼有一个单独的房间。”

“‘你们’是指谁？”尤利扬问。

“我和我妻子。我妻子是H城人，在本地一所中学教文学。她继承了父母的一所小房子，两层楼加一个小花园，第二层实际上是一个大房间，有凉台……我是说，万一……如果您不喜欢那家饭店，又找不到更好的住所的话！”

“我一定去看你们的房子！”尤利扬微笑着说。“既然有凉台，门朝花园开，我一定要去看看这间房子，谢谢！”

他非常热情地朝什特雷夫点着头，好象他是什特雷夫，而什特雷夫是他似的。同志，他有这种习惯，喜欢温存地朝部下点头，极其热情地微笑，一下子把人弄得不知所措。同志，碰到这种客套之后，一个人往往会感到有点受之有愧，心里觉得过意不去。

我给他派了一辆伏尔加牌小汽车，但他把司机打发走了，他不喜欢别人为他开车。我们装上了他的箱子，接着就动身了。

当时，通往H城的路从葡萄园和果园蜿蜒而

过。现在这一带变成了别墅区，到处是红砖砌成的小房子。葡萄种植业早就衰落了，外地来的人购买了地皮，盖了别墅。我们厂在靠近路的中段也有一座四层楼房，是职工休养所。不过，尤利扬在这里的时候，那儿还是一片葡萄园和杏园。

我们上了坡，到了拐弯处，路从那里通往H城。我们左边伸展着小客栈老板桑多大叔的葡萄园。他在葡萄园的正面盖了一间小木屋，离它不远的地方，一所一层半的小白房子特别显眼。房子周围是果园，这样，房子正面有一半看不见，不过透过树枝可以窥见顶楼的凉台，屋顶伸出的瓦檐遮掩着它。不知道是这个凉台吸引着他的目光呢，还是那些果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抑或是那片葡萄园——他把车停在铁丝围墙的院门前，久久地仔细往里面瞧。

“房子和葡萄园全都是桑多大叔的。”我说。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就是小客栈的主人。”

“我就想住这里！”他一边说，一边笑。由于这一笑，他的脸仿佛开朗了。这种笑完全不象他那种刚一出现就马上隐藏到嘴角边的危险的笑。“我想住这里！”他重复了一次，闪耀在他脸上的那一丝看不见的内在之光，开始慢慢消失了。尤利扬又恢复了以前的本来面目，他象个呆呆地望着无法够着的东西的人那样唉声叹气，摇着头，几乎气呼呼地踩了一下油门。

不知道是谁使他受了委屈，什么事情惹他生气，他走进饭店时，脸上阴沉沉的，以极其轻蔑的神情察看前厂长不久前住过的那套房子。假如您问我这套房间怎么样，同志，这是一套豪华的住所，有壁镜，红桃花心木地板，浴室铺了大理石，工作间挂着长毛绒红窗帘，而卧室的窗帘是蓝色的，台灯上装有绿色灯罩，茶几上摆着电话，床头边安装有收音机和闹钟。他单身一人，还需要什么呢？

在饭店经理的亲自陪同下，我们走进了那套房子的工作间。尤利扬打开窗帘，往外瞧了瞧。

“很舒适！”经理说。“正好对面是停车场，早晨去你们厂和州城的公共汽车从这里发车。你们看见停车场右边被推土机铲过的那个地方没有——两年后，那里将是一片市场，H城人可以去那里买肉、蔬菜和鱼。共和国饭店位于本城最美丽、最热闹的地方！”经理最后说，满意地搓搓手，仿佛这家饭店是他个人的，他把H城客人的钱都刮进了自己的腰包似的。

“嗯，是呀！”尤利扬点点头，一道深深的皱纹使他的眉毛几乎成了一条直线。“我将会闻到鱼的香味；而早上，当各家店铺开门营业时，将会出现这种市场通常有的喧闹声，那时我就不需要闹钟了。这么方便的地方，我还找不到呢！”

他突然不作声了，开始细听隐隐约约的乐器

声，这声音象是从地板下，从我们的脚底下传来的。

“你们听见了吗？”经理笑着问。“这是饭店的爵士乐队，是第一流的露天舞台乐队。我们这里是第二层，但仍然能清楚地听见打击乐和萨克管声，您会有经常性的娱乐活动。”他转向尤利扬，“上午乐队排练，而晚上从八点起为听众演奏。前厂长对这种环境很满意，他说：‘早上这种音乐使我精神振奋，而晚上使我很快消除疲劳。’当他带某位女友来，不愿在公开场合露面时，他就给指挥二十块钱，请他稍微提高一下乐器的音量，这样，便可在这里听到清晰的音乐，人们跳舞、娱乐，不必担心被别人看见。”

“太理想了！”尤利扬说，他以阴沉沉的目光看了经理一眼，使那个可怜的人有点感到不安。“可是我听说有规定，禁止乐队的最高音量不得超过七十五分贝！您听说过这种规定吗？”

总经理耸了耸圆得象西瓜的肩膀。就身体的这一部分而言，我们两人很相似。不管怎么说，职业会在一个人的体态上打上烙印，譬如我发现宿舍管理员和饭店经理在体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第一流饭店的经理也温和地耸耸肩，他究竟应当遵守某种有关分贝的规定呢，还是应该注意顾客的兴趣？

“我不记得是否有人对这种似乎超限的分贝

提过抗议，”他说，“谁也没有给我提过意见！”

“也没有人指责您允许别人在您的眼皮底下进行贿赂，是不是？”

“什么贿赂？”我们这位一时还没有转过弯来。“我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贿赂！”

“嗯，我不怀疑！”尤利扬说，“只是您允许乐队指挥当着您的面受贿，接受有色金属加工厂前厂长二十块钱。不过这是小事，朋友，是小事！”

“当然是小事！”经理竭力想掩饰自己的窘境，但为了防备万一，他机灵地要了一个手腕：“如果您租这套房子，我们将提供您所需要的一切，使您在各方面感到舒适方便！”他讨好地说。

“我不怀疑！”尤利扬回答说。他嘴角边出现了一丝危险的笑容，笑容消失后往往会发生晴天霹雳。他沉默了一会儿，直至微笑隐藏到嘴角边为止，然后他脸上带着某种阴险的表情，问：“那么譬如说女伴呢，你们能经常给我找到吗？因为我的工作很忙，哪有时间去自己找呀……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明白您的意思了，只不过这一类事情是别人管的，而不是我……不过，他们会跟您联系的，请放心，这一点我敢保证！现在在H城可以随便挑选女人。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在这里您会感到很方便的。”

“就是说，我可以指望您啰？”尤利扬问。

“您的前任从未向我抱怨过一声。”经理说，一边轻轻地搓着手。“在一切方面，都是第一流的服务。有您这样的顾客光临，是我们饭店的光荣！”

“谢谢！”尤利扬热情地朝他点点头。“房子不租了，不过您的殷勤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将推荐您去应该去的地方。”他摇摇头，为自己的某种想法微笑了一下，然后补充说：“我不会忘的，请放心！”

同志，他兑现了自己的话：后来向市委“推荐”了他，以致那位不得不移居州城……，

同志，我心里想，他有什么必要找我们这位的碴儿？一个人想讨好他，使他过得更愉快，可他却不吃那一套，还要多管闲事，有什么必要？不过，这不是我的事，我不想对它作出判断，也不想把他往坏处想，恰恰相反。

后来，尤利扬将车拐到旧市场附近，正好在桑多大叔的小客栈对面下车。颇为出名的店老板已经知道了昨天晚上住在他这里的是位什么人物，毕恭毕敬地迎接他，尽管太阳晒得很厉害。他穿着一件绣有金银边饰的上衣，腰间系着围裙，头上戴了一顶帽子，以便当这位要人跨进他这旧客栈的门槛时，好马上向他脱帽致敬。

尤利扬很受感动，为我和店老板每人要了半奥卡①葡萄酒，而他自己只要了苏打水，因为他

① 1奥卡等于1.282升。

要开车。桑多大叔对他节制饮食有点感到不快，但尤利扬拍了拍他的肩膀，对他说：

“朋友，不要发愁！我将成为你这里的常客，并在你这里宴请所有最重要的客人！”

尤利扬这番话是出自内心的，但并未使头发花白的店老板得到多少安慰，因为他最清楚，世界上没有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生活中注定要消失的东西，都会逐渐消失，任何甜言蜜语也不能将它们挽救回来，这就是规律。桑多大叔的父亲塔纳斯，当年曾是有名的油漆匠和制皂匠。当这些行业衰落时，他便开了一家小酒馆，盖了面包房，旁边还开了点心铺，这三家店相互支撑。塔纳斯闭上眼睛时，已为未来的客栈积累了一些资本。但当时是赚钱的好时机，这三家店不应相互牵制——小酒馆支援面包房，而面包房支援点心铺。H城人都作葡萄酒生意，这座小城是本县的中心，通往附近各地的条条道路都经过这里，从各家酒店和律师事务所门前通过。这种时代要求开办客栈和市场，桑多大叔把握住了这个时机，用塔纳斯积攒的钱开了这家小客栈。

桑多大叔给我们讲起了小客栈的兴衰史。

客栈也有自己的青年时代和壮年时代，然后它开始变老，正如这座小城和它的居民一样，也正如我们这些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一样。每一次，

当小城的手工业搁浅时，就会出现一些新的事物，于是又慢慢发展起来。但总的来说，各项事业陷入困境，年轻的H城的血都流入了大城市。客栈和我的同岁人，用一句现在的时髦话来说，都“活到头了”。譬如对某座为时已久的建筑物，不是用推土机几下子把它推倒，就是让它孤零零地留下来，自己举手投降。我告诉您，假如不是决定在这里建造工厂的话，那么H城就会变成一个养老院，成为老年人休息和忆旧的地方。现在，老城将会涌出一股强大的血液，会再次复兴，但那些日子已屈指可数的人，不会再象青年人一样跑跑跳跳了，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人们的习惯也会不断变化，今天当对面有高级饭店时，谁还会住你这小客栈！如果说象你们这样的人来我这里住宿的话，那是出于好奇心和好心，或者是因为什么事情与新的风气闹翻了；但是，年轻人，不会永远闹翻的。

我的好孩子，我坦率地告诉您，如果说我还在经营这个小客栈的话，那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赚头，我甚至早就不对此寄托什么希望了，我老是赔本。为了支撑小客栈，去年夏天我卖掉了一块李子园和一块葡萄园。从各地来的青年人，连看都不看一眼小客栈；本地的青年人，他们也都从这里走过去，都去高级饭店的大厅举办婚宴，庆祝生日和命名日，来我这里的只有一些老人、猎

人和喜欢民间风味小吃的人。这里只有四间客房，就是昨天晚上您和司机睡觉的地方，这就是一切。

我给您讲一件事，好让您看看时代如何不帮忙，对落在后面的人什么也不管。我妻子七年前去世了。我有一个儿子，他在索非亚学习商业，现在是首都东方区百货大楼的经理。去年他与一位跟他同岁的朋友回家过年，一起欢度除夕之夜。我简直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难道有比自己的亲生孩子更亲的客人吗？让我给您说说我为节日晚餐准备了一些什么食品吧，那简直好极啦！有带辣味的烤小猪，油炸小泥肠，腌肉，在特制的瓦罐里发过酵的奶酪，香喷喷的热面包，各种泡菜，酸白菜，浇上醋和橄榄油的烤辣椒；餐桌上还有各种烤制食品，油炸鸡腿，上等肉冻，更不用说烧酒和葡萄酒了——李子酒和葡萄酒冒出一股一股的香味，都是放了三年的陈酒，一年的酒，我不会让它上桌。

天色黑下来后，我去准备晚餐，而他们却有些不耐烦了，呆呆地站着，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一口接一口地喝酒，时不时地看看手表。正当我从烤炉里取出小猪时，我儿子说："爸爸，要是你饿了的话，就先吃吧，我们到饭店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

这话象刀子割我的肉似的。我两条腿颤抖起来，即使我的心被掏出来了，也不会这么痛的。

他们要到把我活活埋葬掉的人那里去……我的亲生儿子，好心的人啊！你们瞧瞧，这是我的亲生儿子！

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转向一旁，免得他看出我满脸不高兴的样子。

“去吧，孩子！”我对他说。“只是不要回来太晚了，这些菜做好后，再热就没有味道了，不好吃了。”

我收拾好了桌子，坐下来等待——除夕之夜，难道一个人能独自吃饭吗？

我跟您说都说不出口。两个美男子直至黎明时才回来，外面已经开始天亮了。他们流露出一副愉快而满意的神情，而腿却几乎支持不住了。

“你为什么不睡呀？”儿子大声对我说。“我们本来想马上就回来的，可是饭店里的女伴把我们缠住了，谁也没有料到这里跟索非亚差不多！来，祝贺新年！”

他们在行李里翻找，给我送了新年礼物。儿子送我一顶滑雪帽、一条围巾和一副手套；他的朋友送我一瓶威士忌。只是滑雪帽对我来说年龄大了些，而威士忌这种高级饭店里的饮料，我连见也没有见过。

然后，我们走进卧室，一直睡到中午。晚上又下了一场雪，雪花还在飘落，对面的巴尔干山白得象白雪公主。他们两人起床了，看见这美丽

的景色后，便立即把烤小猪塞进背袋里，拿了一个圆面包，带上滑雪板走了。

“我们去山上散散步。”我儿子说。“你吃那些带馅的东西吧，我知道跟肉比起来，你更喜欢吃带馅的食物。”

晚上，一个从山上滑雪回来的邻居家的小孩告诉我，说他们托他给我捎信，他们决定留在山上“贝利梅尔”小店过夜，叫我别担心他们。嗯，那好吧，随他们的便吧，我能命令他们在哪里睡觉吗？于是，我便叫了两个同岁的人来，一起喝酒吃饭，我开始大口地喝酒，一边喝，一边喘着粗气。

“你怎么啦？为什么喘着粗气呀？”一个人问我。

“这有什么好问的！”我说，“我感冒了，是着凉引起的。”

我还能对他们说什么呢？为什么要让人家扫兴呢？我邀请他们来，是让大家开心，而不是来听我诉苦的！

我亲爱的客人，你们瞧，时间是个什么玩艺儿！它一超过你——就不用再指望它了，不会给你带来新的好处。时间也走在我的前头了，我为何还要支撑这个客栈呢——只有天知道！有人说要在我的小客栈和院子这块地方，盖一个好几层的百货大楼。那好嘛，既然决定了，那就盖吧！

H城是座大城市，不能没有百货大楼。我会去养蜂场，上帝保佑我活多久就活多久。可是常常来这里的那些人怎么办？我既不能丢下他们不管，也不能用马车把他们带走。他们常来这里举办宴席、婚礼和娱乐活动，如果我摆酒席请他们的话，就是十二条街也不够呀！

同志，店老板给我们讲了一些这样的故事，而尤利扬是不是听了，这我很难说。他又给我们每人要了半奥卡葡萄酒，请我们喝；但他大概没有听那位老人的唠叨，因为他的样子象是在思考自己的事情。所以最后当他问店老板是否可以将靠近路旁葡萄园那间有凉台的房子租给他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店老板回答说，只收与客栈其他房间一样的租金，如果尤利扬喜欢那间房子的话，那就请住下，他将是店里最尊贵的客人，想住多久都可以。他妻子活着时，他常常去那间房里，但自从她死后，他没有去过那里，也不想从凉台上看它一眼，因为现在没有人从下面亲切地朝他微笑，并说："来吧，桑多，到我这儿来，一起喝一杯！"

说完这番话后，桑多大叔从柜台的抽屉里取出一串钥匙，从中取下两把，递给了我们这位头头。

"这是房门钥匙，"他指着钥匙说，"而这把看

起来很旧的铜钥匙是开大门的。住下吧，我的好客人。星期日我去你那里呆一两小时，看看你布置得怎么样，同时也带你看看地窖，那里有贮藏了九年的东西，哈，哈！让你瞧瞧你这位店老板大叔还为世界留下了一点财产！”

我们将车朝什特雷夫副厂长家开去，但到了半路上，尤利扬放慢了车速，调转车头往回开。我们又到了共和国饭店，尤利扬将车停在饭店的玻璃门前。门卫出来迎接我们，满脸堆笑，而尤利扬却背朝着他，几步走进了旁边的花店。对一位象他这种地位的人来说，他在花店里呆的时间比我估计的要长多了；出来时，他拿了那么多花，连我都感到不好意思，至于门卫怎么想的，我没有想过。因为女人拿花——在一定程度上还说得过去，而男人拿花——我觉得有点不成体统，而且也不完全合乎习俗。

可是，尤利扬根本不注意我和门卫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想的。他左手抱着一大束郁金香和唐菖蒲，右手拿着一小束，也可以说是一小把白石竹花和铃兰花。

当尤利扬坐到方向盘前，用手帕搓手时，他说：

“大的一束是为我们的新娘子帕夫利娜买的，所以我挑选了唐菖蒲和郁金香，祝贺婚礼时宜买这种花！”

"早上，你在她屁股上踢了一脚，而现在却要献给她一束美丽的鲜花！"我想这样对他说，但是，我当然没有说出口，除了这不是我分内的事，我不能插手厂长的政策外，他还是个难以对付的人，你根本无法知道他会如何回敬你，会把你剁成几截。

"而这一小束是为什特雷娃同志买的。"他继续说，"我没有见过她，不知道她……"

"她是本地一所中等技术学校的文学教员。"我马上告诉他，因为我想他大概对她的职业感兴趣。

"……不知道她外表如何？"他继续说，仿佛没有听见我说的话似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小束花对她很合适！管理员，你觉得怎么样？"

"对不起，对上司的妻子，我不便发表什么意见！"我提防着，免得陷入可能的圈套，因为虽然我喝了一奥卡葡萄酒，但我的脑子还很清醒。

什特雷夫的家在中心街的尽头，通往桑多大叔家的那条路从这里开始，我们最好先去这一家。我建议尤利扬停车，可他断然地摇摇头：

"我们先去桑多大叔的葡萄园瞧瞧，那里看完后，再返回什特雷娃同志这里来！"

"随您的便吧！"我说，尽管我认为会跑冤枉路。生活告诉我，不管有理没有理，不能跟性情

古怪的领导争吵。

同志，怎么对您说呢。桑多大叔的那间房子很矮，是一间阁楼，但凉台外面展现着一片美景，从这里一眼可以望到巴尔干山，那一片广阔而神奇的景色尽收眼底。房间里的摆设让人看不起眼——一张光秃秃的木炕，一个空床头柜，一面破镜子，这就是一切。但我们这位一点也不在乎，他根本不注意摆设，而一个劲儿为景色而兴高采烈，最使他高兴的是葡萄园里的一块高地。我没有问他，不知他对这块地方有何打算，但我估计他是有所考虑的。

我们把箱子留在桑多大叔的阁楼上，接着又急急忙忙往回赶。快到中午了，天气很热，我昏昏欲睡，而尤利扬却吹着口哨，看起来我们在桑多大叔那里短暂的停留使他很满意，他精神爽快极了！我们渐渐把桑多大叔的葡萄园抛在了后面。大约过了十五分钟，我们又到了什特雷夫家门前。这所房子有两层，正面朝我们来的这条公路，它从一片片葡萄园中蜿蜒而过，最后一拐弯，直通我们厂区。

什特雷夫同志的妻子出来迎接我们。假如什特雷夫同志不是我的上司的话，那我肯定会大大恭维她一番。当时，她确实是值得恭维的。我有一条规矩，凡谈及上司的妻子时，不可多嘴，我想这样做是对的。管理处的事情已够我操心的了，

同志，我何必把另外的事情放在心上呢？

她在院子里迎接我们，她的小女儿——一个四五岁的小天使在她身边玩耍。尤利扬和她的小女儿一下子就混熟了。同志，我发现尤利扬很喜欢跟小孩闹着玩，尽管这样跟小孩打打闹闹与一位领导——而且是工程师兼学者——的身分不怎么相称。

那个小姑娘跟我们这位工程师淘气了一阵之后，她母亲打发她去自己房间里睡觉，而将我们请到客厅，那里有一架钢琴。她用冰凉的马林果汁招待我们。不知是由于这果汁的缘故呢，还是由于在桑多大叔那里喝了一奥卡葡萄酒，抑或是由于天气太热——我很想睡觉，所以什特雷夫的妻子玛娅与我们这位之间的交谈，有许多话我都没有听清楚。

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打瞌睡了，因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们谈论起某些书来了，坦率地说，这种谈话对我来说太高深了。

突然间，一阵突如其来的响声把我惊醒了。我吓了一跳，摇了一下脑袋，开始我以为自己在做梦呢。我的上司坐在钢琴前，按动琴键，弹了一首快活的小调，同时摇头摆尾；而那个小姑娘穿着睡衣，在周围跳来跳去，一边跳舞一边笑，笑得可欢呢。而玛娅……她忽而看看客人，忽而看看孩子，但更多地望着客人——假如我弄错了

的话，就请原谅！——她脸上容光焕发，要是此时此刻太阳瞧见了她的话，也会嫉妒的。

同志，当我打盹时，不知道尤利扬和玛娅是否上楼看过房间，或者尤利扬没有去看什特雷夫家为他提供的房间，就同意成为他们家的房客。还有一件事，我也弄不明白——当玛娅那样亲切地留我们吃午饭时，为什么尤利扬拒绝接受邀请？已到中午了，正是吃饭的时候。

“谢谢！”他朝她点了点头。

同志，我告诉你呀，当他朝她点头的时候，他完全不象一刻钟前弹钢琴时，象小孩似的兴高采烈和无忧无虑地朝小姑娘点头的那个人。他仿佛注视着自己，而没有看玛娅，他那急速而令人难以捉摸的微笑又在他嘴角边露了一下，很快又不见了。

“谢谢！”他对玛娅说。“您热情好客，亲切可爱，我非常高兴以后找机会与您共进午餐！”

玛娅的表情也象他一样。她刚才望着他时，脸上的那种充满热情的微笑，象被风刮走了一样，完全消失了。

“随您的便吧！”她对他说。

一路上，他一直沉默不语。

到达厂部后，他给我一些钱，让我把桑多大叔那间房布置一下，说要住那里，吩咐我购买床单、地毯、挂毯、茶几布和一个花瓶，还要我找

一个女人把那一层好好打扫一下。

“今天就这么多事，”他朝我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后，他又补充说：“明天给我买一张小桌子、一个书架和两把椅子。”他的嘴角边又迅速掠过一丝微笑：“我想，有了这些东西后，房间就算布置好了。”

“有事您就吩咐好了！”我说。那种好奇心弄得我心里痒痒的，我忍不住了，就问他：“那么要不要为什特雷夫那间房选购点东西呢？”

他没有回答我，只冷淡地朝我点了一下头，一道皱纹出现在他的眉宇间。

“我租了那间房，有时会去那里。”他用冷淡的声音对我说。“所以，你用麻袋装上书，送到什特雷夫家，放在二楼即可。”

“好的，我这就去！”我说，可我心里想：“怪人！放着好房子不住，偏住那荒凉的地方，不知他是怎么想的！”

当天晚上，他召集全厂职工开会，严肃地谈了迟到问题。“我不会原谅任何人！”他对工人和工程师们提出了这样的警告。然后，他用自己的钱请每个人喝了一杯烧酒——从看门人开始，直到什特雷夫和总工程师尼科迪莫夫……

同志，尤利扬就是这么个人。

一位商业局长的讲述

编辑同志，既然是重要单位派您来的，并且还带有介绍信，我不会把您打发走的，将尽量为您效劳。请坐！要不要喝杯咖啡？不，请不要拒绝！我用来招待客人的咖啡是专门预备的上等货，也就是说供招待领导用的。到了商业局长这里，总该品尝一下咖啡吧，随便哪一种都行！……哈，哈！请坐！我这就按铃叫女秘书来，请不要客气！

是的，同志，一切都得按秩序进行，首先喝咖啡，然后交谈，在这以后如果有必要的话，请再提意见……对不起，您不是来提意见的……刚才我谈到秩序，同志，秩序是人类最英明的创造。我看见它的裤子上有镶条，制服上有带穗的银色肩章，手里拿着结实的牛皮带，谁要是错一步，就会抽谁！要是没有秩序会怎么样？那就会象池塘里的青蛙一样呱呱乱叫，各唱各的调，谁也不会把领导的话放在心上，同志，秩序就应当这样——

穿着镶条裤，制服上有带穗的银色肩章，手里拿着鞭子……您知道我这个有着多年经验的人，是如何看待秩序的吗？我会告诉您的，给我们送咖啡来时，我就这个最重要的问题给您谈谈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必须注意两点：第一，"每个人应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第二，"同志们，请尊重领导！"我说得对吗？啊，对了吧！尽管我不是知识分子，但生活经验使我变聪明了。同志，我告诉您，假如我们美好的生活受到不应有的挫折的话，那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人不遵守这两条神圣的原则，只要他们觉得怎么方便，就怎么生活。有没有依据？同志，我将给您举例说明。

那家高级饭店有一个可容纳五十人就餐的宴会厅，设这个宴会厅是非常必要的，我认为！来了高级客人，按照我们的风俗习惯，在哪里用面包和盐迎接他呢？当然是在这个宴会厅！总结工作改选大会结束后，新选出的领导班子在哪里举行就职仪式，为未来取得成绩而举杯相庆呢？还是在那个宴会厅。所以我完全赞同设这样的宴会厅，它是生活中所必需的。这个宴会厅旁边有另一间小厅，非常隐秘，一共有五六张桌子，平均以每桌四人计算的话，那么这间小厅一共可容纳二三十人。H城社会界名流及其夫人，加起来也就这么多。他们是第一书记、市长、卫戍司令，共和国规模的工厂——有色金属加工厂和陶瓷

厂——厂长。在这一伙最高级的人士中，还应加上二三个人，这样就齐了，他们是市工会主席、法院院长、农业人民联盟市委书记。任何普通人都不能进入这个专门设立的小厅，这些人需要在安静中讨论社会和国家大事。不过，这家高级饭店里还有一个厅供另一些人使用，他们是上层人物，但不属于最高级别的人士之列，如商业局长、合作社商店经理、银行分行行长等等，这些人直接掌管H城的实际事务。编辑同志，这个厅有十来张桌子，照道理位子足够了，但实际上乱糟糟的，因为无论谁，只要塞给门房几角钱，就可以找到位子，而且还由自己挑选。

就拿我来说吧，当时我是街道蔬菜商店经理，出售胡萝卜、白菜、莴苣和其他蔬菜。我念过几年书，顶多也就是当我把次等莴苣当好的卖时，能算出有多少赚头罢了。这样，我积攒了一些钱，便有点飘飘然，很想见见世面，在厂长们面前，在各种高级官员、领导、记者面前露露脸。我很嫉妒他们的职位和官衔，我有的是钱，想怎么消遣，就怎么消遣。

就是说，我给看门人一点钱，便能带着夫人大模大样地进入上流社会的活动圈。因为我不懂得那里的礼节，于是大吃大喝起来，吃得高兴时，就使劲拧我夫人一把，并扯着嗓子唱了起来。

您瞧，编辑同志，为了那一点钱，下级就不

听从领导的吩咐，不忠于职守！

在这个上流社会人士活动的大厅里，由于人声嘈杂，一个人几乎无法安静地跟妻子吃完一盘肉丸子。

假如那个穿着镶条裤，制服上有肩章，手里拿着鞭子的人认真工作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事。编辑同志，请听我说，我知道该说什么。

同志，咖啡终于来了，好极啦！我特别喜欢咖啡。为了使办公室散发出真正的上等咖啡厅的那种香味，两杯咖啡就足够了，顿时空气就会变样。

同志，前面我谈到秩序，如果每一个人都忠于职守，尊重领导的话，那么生活中任何时候都会有最良好的秩序。

譬如说我吧，您知道我从什么开始干起的吗？是从卖化妆品开始的，如肥皂、香水、除臭剂等等。但我绝对遵守这两条原则，忠于自己的职守，听从领导的吩咐，所以您知道我已经爬到什么地位了。假如上帝保佑的话，还可以爬得更高呢！

您大概已经觉察到了，我谈这些并不是瞎扯，而是从贵杂志社交给您的任务出发，使您对有色金属加工厂前厂长尤利扬·埃夫蒂莫夫的道德面貌有一个印象。

您喜欢这种咖啡吗？同志，请随便喝吧！我很高兴，只要顾客满意，我总是很高兴。

同志，我感到为难的是会使您失望的，但没有办法，您不会从我这里听到对尤利扬的夸奖，对此我也很苦恼，请相信我，如果您盼望我讲这个人的好话，那您就打错了算盘。我非常遗憾，但作为一个负责任和坚持原则的人，我不能说违心话。

我非常了解，他是优秀的领导，甚至荣获过金质劳动勋章。这好极啦！但据我所知，您不是来了解他作为领导的才干，而是想了解他为人怎么样。是这样吧？唉，既然是这样，那就请听我讲。您作笔记吧，用脑子记也行，写在本子上也行，您怎么方便就怎么办吧。我去第一书记那里开会时，总在一个红皮厚本子上作记录。同志，将来这就会成为资料，而且这也是出于对领导的尊重。

尤利扬是个性格不稳定的人，喜欢冒险，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同志，简单地说，他不是个严肃的人。严肃的人与冒险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各种违反公共准则的行为是格格不入的。他尊重成文的法律，但也欣赏不成文的规定。

我给您举几个例子，您就会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了。早在他到达H城时，他就不按照跟他同级的负责人士的安排，去五星级共和国高级饭店就餐和住宿，而挤到一家《玫瑰送芳香》这首歌流行的那个遥远的时代留下来的旧客栈里去。只有过

往的行人、要求不高的蹩脚猎人和那些喜欢用硫酸一样的烧酒往喉咙里灌的酒鬼，才会去这家小客栈。谢天谢地，三年前把这所破房子推倒了，现在那里耸立着百货大楼。

编辑同志，我们就假定那个晚上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尤利扬陶醉于青年时代的回忆，不了解那家客栈当时可怜的情况而付出了代价吧，就算是这样吧；可是，您知不知道后来这个很有名望的公民如何想方设法要"为后代"保存那所破房子吗？说真的，假如不是州里领导人头脑清醒的话，那他就成功了。

我问您，他自作主张想保存那所破房子，这象什么话？如果这不算是无政府主义的话，那就奇怪了！……而且做这种事的不是别人，而是一个全国规模的工厂的厂长！对不起，我认为类似的行为不是稳健的人所应有的！

同志，请原谅，我想提个小小的问题：您有几套住宅？我不是指别墅，假如您有的话，而是指住宅……一套？我也是这么估计的。我本人也只有一套住宅，人们一般都只有一套房子。这很好，可我们这位却有两套房子，干什么用？他是单身汉，没有老婆孩子，却要两套房子。您说说看，该不该出现这种事？

如果注意到了房子的位置和它们的主人的话，那么这件事看起来就更加令人奇怪了。尤利

扬首先在自己的助手什特雷夫工程师家租了一间家具齐全的房间。什特雷夫是有家室的人，他妻子很漂亮，是教员，有一个五岁的女儿。然后，尤利扬在另一座别墅住下来，您猜是谁的别墅？啊？您不会猜到的，编辑同志，我告诉您吧，就是那家小客栈，就是酒鬼们常去的那个地方……人们常说物以类聚嘛……两处的房子相隔约有两公里远，都朝着从城里通往有色金属加工厂的那同一条路。根据当时传到我耳朵里的消息，尤利扬在别墅里度过大部分空闲时间，但有时也去什特雷夫家那间布置整齐的房间；而什特雷娃有时也带着女儿去他那里，因为别墅周围是一片葡萄园，天气好时，是散步的好地方……

我没有别的意思，同志，根本没有别的什么意思！我只想请您注意一点：一个庄重的人，而且是在领导岗位上，不会以任何方式公开占着两套房子；庄重的人尊重道德，决不会公开向它挑战。可尤利扬，我不是对您说过了吗，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不管你道德不道德。

我再给您讲一件最严重的事。

尤利扬开始领导有色金属加工厂的那年秋天，天气很不好，经过炎热和干燥的夏天之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雨天，天空阴沉沉的，下起了大雨，白天黑夜下，田野和果园都积满了水，无论是人还是车，都无法靠近楼前；仓库都空了，

合同变成一纸空文，失去了价值。整天吵吵闹闹，每个人都要东西，并进行威胁，可是我从哪里能搞到东西呢？我们刚刚能供应高级饭店的餐厅——有一个正式的午宴，客人已经到了，不是不能在客人面前丢脸吗？可是人们都纷纷挤了进去，这不是闹着玩的，好在经理挑选了一些身强力壮的人，我们才维持好了秩序。这就是说食品供应陷入了困境！譬如有色金属加工厂，按照合同本应供给他们一百公斤奶酪，但只给他们送了三十公斤；应供给他们一百公斤猪肉，只给了十公斤，其他依此类推。蔬菜根本就没有。最后，我们惊讶地发现连洋葱也不够了！有色金属加工厂的情况真是可怜！他们都住在木板棚里，既潮湿，又寒冷；他们每天只能往肚里灌点白菜汤，连这也不够，而且他们还让帮他们盖宿舍楼的工人在食堂就餐，这样一来，连白菜汤也愈来愈少了，变成了清水汤。我有什么办法呢？

于是，一天早上，他，就是在全H城出了名的尤利扬·埃夫蒂莫夫，亲自来找我。

“负责供应的首长！”他极其热情地朝我微笑着，点着头，他嘴角边出现的一丝微笑马上又消失了，象沉到了海底似的。“负责供应的首长！”他又重复了一遍，他的眼睛里仿佛弥漫着一层浓雾。“要是三天之内你不给我供应食品的话，那么工地上的工人就会不干了，大多数安装工人也会

仿效他们的。大家被你这该死的白菜汤灌腻了。"

"同志,"我非常礼貌地说,"我们最近就会得到一批食品,我一定尽量多分点给你们!"

"是吗?"尤利扬说,那一丝神秘的微笑又出现在他的嘴角边。"那你们什么时候能得到这批食品呢?"

我吃了一惊,不知是由于他那一丝神秘的微笑,还是由于他眼中的黑雾引起的。

"我会及时通知您的!"我说,"只要一得到消息,我就马上给您挂电话!"

他走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连忙用手帕擦额头上的汗珠,心里想:"从下一批的供应品中,我首先得分给高级饭店。此外,党委书记的女儿要结婚,要请一百五十人吃饭,这得有东西呀,总不能让高级饭店用白菜汤来招待参加婚礼的人吧!"

供应品运到火车站后,我绝对保密。我绕道去车站,走了一半路,连两部卡车的司机也不知道我把他们带往哪里去……最后,我们到了货物站台。瞧,火车来了。就在这时,一位穿着整齐的男子朝我走来,摘下帽子,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他就是尤利扬·埃夫蒂莫夫,一伙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站在他的周围,他们穿着蓝短衫,蔑视地盯着我,一个个露出一副不要命的样子。我这才知道我被人出卖了,两条腿颤抖起来……

不一会儿，从什么地方推来了磅秤，由站长、他的助手和售票员组成了验收小组。尤利扬那帮小伙子，从每种卸下的货物中称出按合同该交付给他们的东西。轮到卸小猪时——一共十头，是为高级饭店的婚礼而准备的——我的心憋不住了，便闯进调度室，想给当局打电话，请求紧急支援和协助。可报务员是个一贯不友好的人，这次对我更加恶劣。“您是什么东西？”他大声说。“这是公用电话吗？告诉您，这是公务电话！不行！”他拒绝了我。我对自己说：“尤利扬这个冒险分子和无政府主义分子，怎么把车站里那些老奸巨猾的坏蛋都争取到了自己方面去？这是怎么回事？”

由于尤利扬这种令人难以容忍的无政府主义，我希望第一书记狠狠地处罚他，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在市委全会上反而夸奖了他一番。“尤利扬·埃夫蒂莫夫以自己的行动，”他说，“留住了工人们，他们超额完成了今年的计划。所以我们有理由向上级报告，关于有色金属加工厂，尽管落后了，但计划定会按期完成。”

全会结束后，第一书记在朋友之间较小的范围内说：“同志们，自家人总是自家人！我们跟尤利扬的父亲在同一支游击队战斗过，他是个非常好的人，但有一个小毛病——当情况危急时，他会独自用自己的脑袋去冒险！”

同志，最后我要告诉您，尽管餐桌上没有真

正的小猪，但婚礼进行得很愉快，尤利扬对提高大家的情绪用尽了心机。为了粉饰自己的可耻行径，他使出了十八般武艺！那天，他早早去那里，亲手制作了两只非常考究的小猪——一只是用豆泥做的。而另一只用的是土豆泥。天知道为什么，这两只假小猪居然在婚宴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他带来了有色金属加工厂的业余乐队。同志，您想象得到吗，他拿起指挥棒，站在前面，开始指挥演奏维也纳华尔兹舞曲，那不是开玩笑的，而是名副其实的舞曲，他象个真正的指挥家……

您想想看，一位厂长连这也干！而且不是一般的厂长，而是共和国规模的工厂的厂长！

您还想从我这里听到夸奖这个怪人的话吗？

决不会听到的！我有自己的原则。

我讲完了！

一位工程师的讲述

跟那些在出生之前就已交上好运的同事们所不同的是，我，鲍扬·斯皮罗夫不是出身于富裕家庭，我的名字不会给人以什么深刻印象。由于这种原因，我早就知道，只有通过努力，我才能走在生活的前列，在舒适和享乐方面不应过多挑剔，至少在职务的阶梯上没有爬得较高之前应该这样。所以，当尤利扬·埃夫蒂莫夫把一切接过来，开始管理这家工厂时，我由于自己的努力，已经是安装指挥部的领导。是的，尤利扬来时，我已经是个头头。我有一辆日古利牌小汽车、黑西服和锃亮的皮鞋，多少还有些存款。而您知道我多大年纪吗？三十一岁！大多数这个年龄的工程师还刚开始起步，得用父母的存款购买小汽车，而他们个人的存款不会超过可怜的三位数。

可是，假如朝中无人的话，一个青年人无论如何努力，一般来说在职务方面只能慢慢前进，

很难往上爬。不仅要有人给他指点，强调他的成绩和勤奋，不断夸奖他．而且当提升的机会到来时，主要领导的眼里还得有他才行。唉，我不愿意被人误解，我不是悲观主义者，不是说一个有能力的年轻工程师，如果没有靠山，就一定会老是原地踏步。勤奋会受到奖赏，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如果一位年轻的工程师有自己的人时，那就会是另外一回事了，会在阶梯上迅速往上升，间隔的期限也会缩短。

我刚来到工厂时，上层领导中我没有人，必须着手建立关系网。坦率地说，机会帮了我的大忙。我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有什么必要隐瞒呢，不过那个出现在我前面的人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运气简直突然降临到了我的头上！但是，事情看上去又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有一回，我开车在中心街上慢慢行驶，突然间，我在人行道右边发现了什特雷夫副厂长的夫人玛娅。现在她怎么样——我不清楚，他们一家早就离开了H城，但当时她身材苗条，是个少有的金发碧眼美人。

在此之前，我只在正式场合见过什特雷夫两口子，不过已经知道他们的一些情况。什特雷夫当时是有色金属加工厂副厂长，而玛娅在H城一所中等技术学校教文学。尽管他们有双份工资，但家里生活相当拮据，要付买住房的钱，玛娅要供妹妹在索非亚上大学，还要付保姆费，孩子体

质很弱，他们不想送她上幼儿园。他们至今还没有购买小汽车，无论玛娅从市中心的商店里买了多少东西，都得用手提着回家。

这样，我开车超出她几米远，便停住了，急忙下车，非常客气地朝她点点头，说：

“什特雷娃同志，请上车！我很高兴送您回家，正好我也去那边。”

或许因为我是她丈夫的部下，所以她信任我；也可能因为我年轻，身材匀称，有风度，给她留下了良好印象，她稍微有点感到不好意思，但只是最初一瞬间，而然后就朝我微笑着说：“斯皮罗夫同志，您真热情，谢谢！”说完，就把两个装得满满的袋子递给了我。

我们走了约十分钟，就到了那里。什特雷夫的家在通往工厂的公路旁。象所有年轻而有远见的人遇见顶头上司的夫人时所做的那样，我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在她面前显示自己是个聪明而有知识的人。此外，我发现她自尊心很强，这一额外的理由更加促使我以最合适的方式显示和炫耀自己。

“什特雷娃同志，我很羡慕您，”我对她说，“您出生在这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十年以后，它就会象一个小巴黎！我们现在行驶在上面的这条“三位游击队员”大街，将会与香榭丽榭大道媲美！”

“您大概去过巴黎吧？”她问我。

从她的声音里我把握不准她究竟是相信我去过呢，还是只不过这么估计的，但我当机立断：如果顺势骗她一下，也许会对我有利。

“是的，当然啰！”我说，“我在这个当代的巴比伦①住过两三个星期！”

她迅速瞥了我一眼，是惊讶，还是好奇，只有天知道。她没有言语，但我确信：在她眼里我至少高出了一头。在巴黎过两三星期的单身生活，这就意味着葡萄酒和女人……在一个普通的外省女人的幻想中，这些东西会使一个男人变得很有吸引力。

我帮玛娅把东西送到门口，跟她告别时，我特别殷勤地吻了一下她的手。尽管她是有色金属加工厂副厂长的夫人，看上去非常自信，她还是有点脸红，因为H城还没有男人吻女人的手这种习惯，而且直盯着她们的眼睛……

晚上，下班前五分钟，什特雷夫副厂长用电话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走过院子时，仔细回忆自己对玛娅的举止，莫不是什么地方有差错吧，看来一切都正常，但我心里还是不踏实。什特雷夫性格温和，但即使是最温和的人，吃起醋

---

① 巴比伦，古代“两河流域”最大城市，曾为古巴比伦王国与新巴比伦王国首都。

来也会发疯发狂的！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斯皮罗夫同志，今天上午您帮了我妻子的忙，送她到家。"他说，"我非常愉快地以她和我的名义感谢您！"他伸出手来，使劲地握着我的手，"您的热情举动使我们很受感动。"

我把手放在胸前，说：

"别这么说，副厂长同志，别让我脸红！我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我送您尊敬的夫人连两公里还不到呢！"

"亲爱的朋友，我们感谢您，不在于走了多少公里，而在于您表现出来的好心好意！"他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让我坐在办公室里那把唯一蒙了面料的椅子上。

当时，即尤利扬到来的五个月前，我们才完成了一半安装工作，所以还无权考虑办公室的摆设问题。工人们都住在木板棚里，领导的工作间、各种办公室也都设在类似的板棚里；正如后来新厂长所说的，我们是在"前线环境"中生活和工作。厂长办公室象木工房一样，散发着新鲜松木的气味。未来的集体宿舍、食堂和办公楼，才刚刚用钢筋水泥浇灌地基。

"您使我感到非常荣幸！"我点点头，谦虚地坐在一把最普通的木椅上。"这种好椅子是高级工程师和领导坐的，"我用头示意了一下那把蒙了

面料的椅子，“而我只不过是一颗最普通的螺丝钉。”

“嗯，有朝一日您也会当领导的！”什特雷夫温和地微笑着，“再过多久提升您，我们心里早就有数了，您就乐观些吧！”他微微打开中间那扇把他的办公室跟旁边隔开的门。“雅娜奇科娃！”他喊自己的女秘书，“劳驾你再来杯咖啡，我有客人！”

接着，聊起了我的专业和家庭情况，话很投机。最后，女秘书雅娜奇科娃送来咖啡后，他点点头，让我喝咖啡。他喝了一口，然后说：

“我曾找尼科迪莫夫工程师要过您的材料，想了解一下您在哪个组工作，是否胜任所肩负的任务。正如您所知道的，尼科迪莫夫负责领导厂里的工程师。”

“尼科迪莫夫工程师！”我装出一副震惊的样子，“在这个严厉和要求很高的人眼里，我大概等于一个零！”

“哪里，不要这么瞧不起自己嘛！”什特雷夫热情而又带点忧伤地朝我微笑着。

他之所以目光忧郁，我看是由于身体缺陷引起的——他有点驼背，不怎么厉害，但毕竟有点驼。对象他这样有漂亮的妻子的人来说，这一缺陷是真正的不幸，我很了解这一点。落在谁的身上都倒霉，但不知是什么鬼让他娶了一个交际

花？他只配得上一头普通的母牛，而玛娅是头威严的羚羊，大自然的杰作。为了缓和他们之间身体上明显的不平衡状态，什特雷夫显出一副仪态优雅的样子，并且别出心裁，尽量使自己象个“神痴”：长胡子，尖下巴，面颊深陷——不知他是用怎样的饮食法来维持这副模样的。说实话，这样的男人不会激起我的同情之心，恰恰相反！可是，在当时那种场合，我必须注意，因为我的未来取决于这头长着大胡子的小山羊。

“尼科迪莫夫同志恐怕不会记得我的模样吧！”我继续装出一副忧郁的样子，“我们这些普通的工程师一共有十多个，他怎么会记得我们呢？”

“他应当了解你们！”什特雷夫说，“我敢肯定，他认识你们所有的人。”

“我不信！”我说。

“随便怀疑人可不好，您会使他心里难过的。比如说您吧，他就记得很清楚，对您的印象不错，认为您是一个守纪律和勤奋的专家。”

我低下了头。

“他认为您是个好专家。”什特雷夫继续说，“而我觉得可贵的是，您是个好人。我感到非常可贵，因为我见过不少专家，他们并不是香花。”

“什么人都会有！”我说，“世界非常复杂，重要的是各人搞好本职工作。”

“首先要体面地生活，”什特雷夫伸出了食指，“这是最主要的，谁体面地生活，他就会问心无愧地工作。有人问心无愧地工作，成为模范，超额完成计划；但生活得并不体面，他们贪财，还有其他毛病。”

“你瞧他这个品行端正的人！”我心里想，“在给我念道德经！”

“我完全同意。”我说，“应当体面地生活和体面地工作。”

“体面地工作来源于体面地生活，前者是后者的结果！”什特雷夫强调说，“规律是一回事，后果是另外一回事。朋友，请不要在规律和后果之间划等号！为了问心无愧地工作，就必须体面地生活，这是真理。”

他那副圣像般的模样和指导性的话语，使我想起了神父。于是，我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斯皮罗夫同志，您不同意吗？”他突然问我。

“哦，哪里！”我说，“怎么会不同意呢？正好相反！”

“您是个好人，不应当也不可能有另外的想法。可是有些人不赞成我的原则，例如尼科迪莫夫就不同意我的看法！”

“怎么可能呢？”我假装很惊讶。

“他认为我们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我们不善于很好地工作。而我说，我们之所以落后，是因

为我们没有问心无愧地工作。这是不同的概念，有原则性的区别！他的观点源于这样的信念：劳动过程中主要的是能力和灵活。而我说，劳动过程中主要的在于自觉性，有了自觉性，能力和灵活就能起作用；没有自觉性，工作就不会有进展，尽管人们有能力，并熟悉自己的业务。”

“让尼科迪莫夫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说，“这是他的事！”

“就拿我们落后这件事来说吧，”什特雷夫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现在这是引起我们和部里不安的最重要的问题。事实上应当如何解释我们的工作进展缓慢这件事呢？尼科迪莫夫认为，安装工人的技术培训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我们厂长要求也不够严格。而我认为，当一个人有自尊心时，他就会尽其所能地工作，对别人忠诚，不用罚款和其他处分，也会完成任务。遗憾的是，我们大多数人缺乏自尊心，所以工作时随随便便，纪律也松松垮垮。”

“我认为培训也好，自觉性也好，都不应当偏废！”我说，“培训和自觉性都应处于最佳状态！”

“原则上是这样，您说得对，可是在具体情况下怎么样？”他朝我笑笑，“您认为在具体情况下哪一方面可以偏废一些？”

当我看到他逼我表态时，我内心有点生气。为什么非要我倒向一方呢？真见鬼！让他们在厂

里摩擦去吧，这件事与我有什么关系？我插手干什么？

“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说，“没有现成的答案。不过我将认真观察厂里的工作，同时注意总结自身的体会，这样过一段时间，可能会得出某种有说服力的结论。如果我有机会再一次荣幸地跟您交谈的话，那么我将乐意告诉您我是怎么想的。”

我感到已经摆脱了“包围”，心里轻松多了。他想把我也卷进去吗？去他的吧！

“我很喜欢您。”什特雷夫说，他脸上确实露出满意的表情。

而我感到惊讶的是，在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上，他如此坦率和明确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不会给自己造成困难吗？不会跟尼科迪莫夫这样有影响、有威信的人发生危险的冲突吗？

“您是个诚实和坦率的人！”什特雷夫说，“我尊重诚实的意见，即使跟我的意见不相吻合也罢。我在很多问题上不同意尼科迪莫夫的看法，但我尊重他，因为他不隐瞒自己的想法。您承认没有考虑过厂里落后的原因，很好！一个领导者要承认自己的错误，那必须有高尚的气度，您有这种气度！它会立即引起人们注意，因为今天很难找到不把自己看成是圣人的领导者。”

“你真幸运，老兄，你真幸运！”我心里想，

"你很聪明，但性格太软弱，所以你不敢进行真正的斗争，而爱耍小聪明，用狡猾的手腕回避危险的问题，而不卷入尖锐的冲突之中。所以你摆脱掉了。"

"您就观察吧，调查吧，分析吧！"什特雷夫继续教育我，"当您得出某种结论时，请把自己的意见告诉我。您是个爽快的好人，再次会见您的话，我会非常愉快的。"

"谢谢您的关怀！"我非常礼貌地朝他点点头，而心里想："我并不象你想象的那么好。"

我生活中这令人难忘的一天以一件幸福的事情结束——什特雷夫夫妇邀请我吃晚饭。正当我与什特雷夫讨论忠诚、坦率这些作为人的高尚情操的最崇高的表现这一问题时，玛娅来电话了。她想对丈夫说什么，这不是我该管的事，但一开始他们谈的就是我。一个人怎么会知道命运之神给他安排了什么，会怎么作弄他，使他在哪里生根呢？所以，福音书上写道："天机不可泄露。"就是说任何普通人不会肯定地知道最近或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地震、房屋倒塌或者喝得醉醺醺的司机突然朝你冲来——难道有人能预见这种种事情吗？

什特雷夫对玛娅说："你知不知道今天上午用车送你回家的那个热情的年轻工程师，现在就在我的办公室？"对于这个问题，玛娅大概同样以问

答问："真的吗？"因为什特雷夫马上肯定地说我在那里："是呀！"

因为女人都天生地具有一种利用天时地利的本领，玛娅大概对丈夫说："那你为什么不请他到家来？"她肯定提出了这种建议，因为什特雷夫立即回答说："瞧，这个主意很好，我一定邀请他！"

即使我没有百分之百准确地转述玛娅的话，他们的想法也肯定是一致的，所以什特雷夫邀请我去他家吃晚饭。我以感激之情接受了他的邀请。在类似的情况下，哪一个人会拒绝顶头上司的邀请呢？最后，他妻子作为第三者有什么不对，我为什么要用拒绝来使她不高兴呢？

虽然没有为我提供特别的酒菜，但我不会忘记这个晚上：没有经过特别的努力，我就成了这个家庭的朋友。问题在于要及时认准方向，正如我所做的，谢天谢地，我不缺少窥测方向的能力。小索妮娅很乐意跟"叔叔"玩，看得出他们不怎么管她。我学狼嚎，装成狗熊的样子，用四条腿在厅里爬；总之，我装出各种怪样，她父亲恐怕做梦也没有这样做过。但是对一个模样象预言家耶雷米雅的人来说，要用四条腿在厅里爬，把牙齿磕得咚咚响，象母熊一样发出哼叫声，也确实不方便。小孩玩得非常愉快，临睡觉前，他们只好硬把她拽走，跟我分开时又哭又闹。我清楚地看见玛娅的眼睛里充满了多么感激和温暖的表情。很

明显，预言家耶雷米雅不适合作活泼的小索妮娅的伴侣。我面前展现了作即兴表演的广阔天地，我感谢命运之神给我提供了象演员一样表现自己的机会。

于是，我也有希望了。什特雷夫副厂长需要朋友，以便有人听他那出于好心的没完没了的唠叨；需要与人商量假如把楼上的房间出租的话，会不会有损于自己的威信；下象棋时，也要有人被将死。玛娅——她需要有人陪她丈夫玩，以便使她自己腾出时间去弹钢琴；或者独自站在窗前，心不在焉地仰望夜空。我耐心地听副厂长没完没了的唠叨，建议他出租房间，自愿输棋；而对于玛娅，我则偷偷地、会心地报以微笑。

两星期后，我收到了第一道委任状——提升我为技术部主任。我开始起跑了。

开始时，是玛娅或什特雷夫邀请我去；而后来我们之间达成了一项默契——不经专门邀请，我也去他们家做客。为了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和尊重，我逗索妮娅玩，用四条腿在地毯上爬；与此同时，为了博得什特雷夫的欢心，我问心无愧地故意输棋，而对玛娅，我继续微笑——当然是偷偷的，尽可能叫人琢磨不透。我听情场老手说，令人琢磨不透的微笑会使那些浪漫的年轻夫人焦急不安，我觉得玛娅也是这种人。我之所以认为玛娅浪漫，不是没有理由的——她总是弹一些古

典作品、奏鸣曲、小夜曲，一次也没有听她弹过富于生活气息的作品，比如欢快的流行歌曲。

尽管什特雷夫一家每周去高级饭店的餐厅吃一顿饭，有时去市委第一书记或市长家里喝咖啡，同时也邀请一些著名人士偕夫人来他们家喝咖啡，但他们参与的上流社会生活跟他们的身份不怎么相称，我觉得他们生活得相当闭塞。起初，我以为他们之所以脱离H城上流社会生活的娱乐活动，是由于手头经济拮据所造成的；但后来我确信其原因在于他们的性格，什特雷夫夫妇简直不愿意在社会上活动。为什么？我不想猜测——我不是，也不想成为精通人的心灵的专家。

在我与他们直接接触的几个月中（从三月中旬至八月底），我有机会直接观察他们的生活，这就使我逐渐明白一些事情。比如下列情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什特雷夫，为人稳健，已经三十八岁，职业是工程师，大厂的副厂长；对妻子温情脉脉，这与一位新郎或某个富于浪漫色彩的大学生更相称。我亲眼看见他有时如何给她送花，这些花是跑到市中心买来的。天啦？当这个有点驼背，模样象个仿佛用某种神奇的法术从圣经里跑出来的预言家的人，如何象个当代的唐璜①，根

① 唐璜，系中世纪西班牙传说中的青年贵族，欧洲许多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

本不顾及别人的议论，手持一束鲜花，在中心大街走着时，看起来既可笑，又可悲。他胸前捧着一束用锡箔包的鲜花，在市中心大街闲逛，这跟一个大厂的副厂长很不相称，真见鬼！除了给她送花外，有时他还出乎意外地送她银手镯和项链，这些东西不怎么贵，但毕竟不是不要钱的。对他这种作法，我很不理解，一方面需要出租房间，另一方面又乱花钱买手镯和项链！

真令人难以置信，可又是事实，这个人大概很爱自己的妻子吧！有色金属加工厂副厂长！这种安闲度日的男人更喜欢单独呆在妻子身边，而不愿出去做客或去高级饭店的酒吧间喝威士忌。

玛娅显得正常多了。六年的夫妻生活已经结束了她的少女梦，她举止平静，不摆架子。根据我的观察，她对丈夫向她献殷勤的种种努力显得非常冷淡，不仅如此，我觉得她已经在抱怨他了。

去外面寻求欢乐是合情合理的，但我没有见她这么做过。她就一直这样苦恼下去吗——我不信！她二十七岁，这是个最不安份守己的年龄层次；是教师职业妨碍她吗——这种假设看来也站不住脚，谁也不会象过去那样用道德的绳索去束缚女教师，今天她们想干什么便可干什么，想去哪里就可去哪里，完全有自由。可是玛娅，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不寻求欢乐，对我仍然采取

"中立态度",也就是说离"行"与"不行"是等距离,总之是含含糊糊的。

在这种令人纳闷的环境中,只要一遇上她的眼睛,我就继续令人琢磨不透地朝她微笑;跟索妮娅玩;陪什特雷夫下棋,故意走错,耐心地听他那些颇有教益的教导。

天气暖和起来了,我们开始在院子里活动。我用从工厂里拉来的废木料给索妮娅做摇床,我干木工活倒挺顺手,摇床做得很结实,有时玛娅也经不住诱惑,躺在里面前后摇晃几下。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放肆地死死盯着她的大腿,而她望着我就象望着空荡荡的旷野一样。很明显,时机成熟了。她本性浪漫,大概今后想用"爱情"把我们连在一起吧。

不管能否得到"爱情",最后我总会有所得的;即使我现在两手空空也不要紧,跟这个家庭交朋友肯定对我今后在厂里的提升有好处。提我为技术部主任仅仅是开始,只要有什特雷夫作靠山,我就会不费吹灰之力,沿着阶梯迅速往上爬。一个年轻的工程师还能幻想什么更好的东西呢?

但是,与什特雷夫一家交往的好处,不仅仅跟我的提升有关系。当然啰,就其重要性来说,职务方面的升迁是第一位的,可是人不是还有私生活吗,在这方面也同样要相应地注意和关心。当回顾自己这一段生活时,我满意地发现收获不小。

首先我想指出，当我去什特雷夫家做客时，我愉快地感受到了舒服和温暖。我在青年时代不曾有过合适的家庭环境，我的父母不和，常常吵架，互不相让。大学年代就不用提了——宿舍里乱七八糟的景象，至今仍叫我心中不快。而什特雷夫家一切大不相同！这里有的是平静而温暖的交谈、安静和理解，甚至玛娅弹的忧伤的曲调也不会使我情绪低落。一种我过去只听说存在过的高尚气氛感染了我，我仿佛到了另一个星球；更不要说玛娅那令人迷恋的魅力了，这种魅力在我内心里激起了强烈的欲望和最甜蜜的希望……

跟什特雷夫家交往除了精神收获之外，我还有物质收获。是的，后者还不怎么明显，可是不是一滴水一滴水地积起来，最后汇成水库吗？不错，现在谈论水库是有些夸张，但毕竟有那么回事呀。我是单身汉，跟什特雷夫交往之前，我经常去看电影或者去高级饭店的酒吧间喝杯烧酒，以消磨时光。有什么办法呢？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这使我感到厌烦，因为不要忘记，我当时刚满二十七岁啊！可是每天去看电影吧，是不可能的，那时H城只有一家电影院，一部片子要放整整一周。要是酒吧间有单间，我可以在那里独自喝酒的话，那还马马虎虎可以，没有什么关系，一杯烧酒花不了几个钱。可是，一个人能藏到哪里去呢？无论去哪里也会被人看见的。某位工程师或同事走

进来，发现了你，就会连问也不问坐到你的桌上。“我给你作个伴”，他说，“免得你寂寞。”我最害怕伴了，但我怎么对他说呢？“所以你得请客，我不能白来！”于是，他敲了几下桌子，叫服务员过来。我能公开地把他撵走吗？尽管我心里想：“滚开，畜牲，我不需要你！”那他就会当着全体工程师和工人的面取笑我。所以我只好忍住，甚至还微笑着，而那个无懒得寸进尺，又要了第二杯烧酒……

每天晚上或隔一天晚上都是这样，而这需要钱啊！当我开始去什特雷夫家时，这些钱就留在我的钱包里，积攒下来了。

以前，每逢休息日我就难受，寂寞得要命。我不是本地人，没有亲戚家可去，以减轻寂寞。我交的朋友也不多，因为我既不玩牌，也不打猎，又不是酒鬼，常常自己变着法子来消除寂寞。我把小汽车开到厂里的车间，将各种零件卸下来，进行清洗，然后重新把它们装好；中午随便吃一点带去的东西，休息一会儿，又接着干，这样时间就过去了……可是，自从我成了什特雷夫的好友后，一切象变魔术似的起了变化，节假日具有节假日的内容，他们盛情地招待我。当什特雷夫给我论述有关人的尊严的观点时，我就睁着眼睛休息一会儿，焦急地盼望玛娅用眼神向我表示她准备回答我的炽热的情欲。为了加速这个甜蜜的时刻的到来，我间接地采取攻势，尽可能迎合

她的母爱，使她受感动——我背着小索妮娅，跟她作各种游戏，在院子里学马儿跑……

正当我以多种收获迎来了夏天，准备秋天收获硕果的时候，尤利扬那不祥的阴影却突然笼罩了我们平静而美好的生活。

从他出现的头一天起，他就给我施加压力。为了处分迟到的人，他便关上正门和所有其他的门——前厂长做梦也不会采取的严厉和毫不客气的措施。之后，尤利扬在尼科迪莫夫的陪同下，带着鹞寻找猎物的神情，走遍所有的车间。他穿着皮夹克、灯心绒裤和翻领白衬衣。他脸部有明显特征，使人一下子就能记住他那忧郁的表情。我本人不喜欢这种表情，仔细打量他一番后，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了我的心头。

他一到我们组，就迅速朝周围扫了一眼，马上问一位工人：

"这些零件为什么都乱堆在这里？"

那个工人不知所措地看看我，耸耸肩。

"为什么？"尤利扬问我。

跟我打招呼时，他的眼睛冷淡地望着我，但是浅灰色的，目光是坦诚的。后来，他凝视着我时，他的眼睛黯然失色了，目光愈来愈象一堵横在我前面的灰墙。

"我们下班前，尽量多存放些零件，"我说，"免

得明天早上等着从外面运进来。厂长同志，我们是想争取时间，一上班就进行突击，以完成任务。”

他的嘴角边露出某种笑影，使我觉得有点可笑。他在小本子上记着什么，样子象个给学生记二分的冷酷无情的教师。接着，他以冷淡的语调吩咐我半小时后去他那里。

尼科迪莫夫站在一旁观察这种场面，看得出他很得意。他坚定和毫不妥协地主张消除安装工作的缓慢状态，但实际上没有得到前厂长的支持。什特雷夫想把坚定和毫不妥协的方针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所以只部分地支持他。不管怎样，当我听见新厂长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时，我两条腿有点发软，而耳边仿佛从远处传来了十几辆机车刺耳的汽笛声。

我去厂长办公室时，路上遇见了几位同事，厂长已经跟他们谈过话。他们看上去与其说惊慌，不如说大惑不解，嘴里嘟嘟囔囔，不象以往那样说说笑笑。“他们还不了解在跟谁打交道！”我心里想，尽管我对新厂长也一点不了解。

在厂长办公室里，我遇见了尼科迪莫夫和什特雷夫，两人都坐在那里，而厂长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嘴里叼着一支烟，双手插在皮夹克口袋里。

“哦，您也来了，斯皮罗夫同志！”他突然友好

地朝我微笑，以更令人料想不到的手势请我坐到他写字台右边的皮沙发上。

“不敢当！”我竭力推辞。“这两位负责同志，”我朝什特雷夫和尼科迪莫夫点点头，“都坐在木椅上，我怎么好意思坐贵宾坐的位子！”

“不用担心！”这次尤利扬酸溜溜地笑了一下。“我请您相信，这两位同志对他们的位子很满意，他们不愿意调换位子。我说得对吗？”他转向他们俩。

他俩点了点头。什特雷夫说：

“我们很好，您不要担心我们！”

“因为，”尤利扬继续说，他的眼睛开始慢慢黯淡下来，“这张沙发现在起着普罗克鲁斯特①的床的作用。您知不知道‘普罗克鲁斯特的床’是什么意思？”

“我是机械工程师，”我说，“没有研究过文科方面的问题。”

“古希腊强盗普罗克鲁斯特有两张床，一张长的，一张短的。要是俘虏了矮个子，他就让他躺在长床上，用摇车把他的身体拉长，直至脚板抵住床头为止。要是俘虏了高个子，就让他躺在短床上，齐床头砍掉他的腿。我的皮沙发也象普罗克鲁斯特的床，我邀请一些重要的同事坐在这张

① 普罗克鲁斯特，系希腊神话中的强盗。

沙发上，商谈工作。请坐！”

我呆呆地望着他，既感到害怕，又觉得受了委屈。不知道他是开玩笑，还是神经有毛病？

我鼓起勇气问：

“我能否问一下，您叫我来有什么事？”

“来，请坐下说！”尤利扬不怎么高兴地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只是开个玩笑。您大概没有看出我是开玩笑吧？”

“有各种各样的玩笑呀！”我说，就老老实实地坐在他那张可恶的沙发上。

“您应当学会忍受批评！”尤利扬说，“而批评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就是‘普罗克鲁斯特的床’。”在堆满烟蒂的烟灰缸里，他慢慢弄熄了香烟，刹那间皱起了眉头，不知是由于烟灰缸引起的呢，还是因为他不喜欢我。一瞬间，我们之间就笼罩上了某种反感的情绪。他重又把手插在皮夹克口袋里，又来回踱着步，以同样的语调继续说：“我叫您来是出于好奇！我想知道你们为什么做那种蠢事——故意把一些废金属堆放在工作间里？”

“同这个人难以打交道！”一种失去立足点的感觉开始朝我袭来。“我们还没有象人一样相互认识，他就远远地用斧子警告我，而现在把我节约时间的措施说成是蠢事！”

“我早就对您说过，存放零件是为了节约时间！”我说。

他大笑起来，我觉得很不礼貌，他仿佛在跟一个最普通的工人打交道似的。

“这些领导同志，”他用头指指什特雷夫和尼科迪莫夫，“说了你们许多好话，而你们却继续干非常明显的蠢事！下班时，为了在堆积如山的零件里腾出一条路来，你们会损失很多时间，而你们却把这说成是节约时间！你们把进行安装工作的时间浪费在不该做的事情上，同时你们十分肯定地说加快了安装进度，我如何理解你们的作法？斯皮罗夫同志，您能否给我解释一下？”

我什么也没有给他解释，因为失去了立足点的感觉使我脑袋发晕，我的胃差点儿返到喉咙里了。

晚上我去什特雷夫家，如此这般地给什特雷夫讲了一通，说我感到很失望，已经出现了不祥的兆头！这个人为什么要抓住我不放呢？

而他是个宽厚而善良的人，亲切地拍拍我的肩，安慰我。“不光是对你，”他说，“大多数人有此同感，可以说他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谁也不会放过。难道你没有发现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吗？”

我参加了会，见到了会场上引起的骚动。我的情绪更加低落，“要是尤利扬站住脚的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得到提升了！”我深深叹了一口气，真是个非常可怕的人！

什特雷夫认为，他虽然严厉而且有点凶，但熟悉业务，只是无法解释他请客的举动，三四十瓶烧酒，外加相应的菜肴——而菜也相当丰富，包括橄榄、辣椒、半个鸡蛋和一小块奶酪——这些几乎花掉了厂长一个月的工资。不过，别管他的开销吧，什特雷夫说。还有一件更不寻常的事，那就是在会上他毫不讲情面，压制工程师和工人们的不满情绪，给他们当头一棒，而在餐桌上却活泼愉快，向那些被他尖锐批评过的人祝酒，最后放声唱起歌来！是个什么人啊！什么性格？——什特雷夫非常惊讶。

“真是个非常可怕的人！”我说。因为他吃饭时没有给我祝酒，我补充说：“是个危险分子！”

“为什么？”玛娅问。

那天晚上，她头一次插话，而她的脸，不知道为什么红得象芍药。

“还用得着问吗？”我说，“这种人什么都会干得出来！眼睛盯着你，降你的职，而然后又请你吃饭，祝贺你前程远大！”

“这很有意思！”玛娅沉思地说。

“不如说是凶兆！”我皱起了眉头。

“我的天啦！”玛娅说，“对您来说，每一个比较特殊的人就是‘怪’人，每一种比较特殊的行为就是‘凶兆’！”

“我尊重正常人和正常的行为。”我说。

“而我认为一切超出陈腐和公式化概念范围的东西都有意思！”玛娅说。

我看了看什特雷夫，他正低着头听妻子说话。

“您大概想标新立异吧！”我说，“您没有选择好时间，今天我们对标新立异已经感到腻烦了。”

“而有时陈规倒使我感到腻烦。”玛娅说，她的脸又红了。

“玛娅，”什特雷夫温和地说，“你是在为我们的房客说话吗？你想为他推波助澜？”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玛娅气呼呼地说。

“什么房客？”我问。

“您不知道吗？”什特雷夫说，“我们把楼上的房间租出去了。”

“租给谁了？”我不相信地问。

玛娅抢先回答说：

“我们把它租给尤利扬·埃夫蒂莫夫了，就是新厂长。”

“一切都完了！”我心里想，觉察到额头上的冷汗直往外冒。“一切都完了！”——就象敲响了丧钟一样，我的血液直往上冲。

“到春天为止，我们得积钱买小汽车！”什特雷夫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我们不是在为购买拉达牌小汽车而存款吗？”

“好啊，好啊！”我点着头，听着钟声。我听着，

听着，突然间一个解救的主意掠过我的脑际：我为什么不利用什特雷夫夫妇去跟尤利扬接近呢？既然我是他们的朋友，也会成为他的朋友！人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吃吃喝喝，就这样互相接近。友谊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好极啦！”我用手掌在膝盖上拍了一下。“你们把房间租出去了，这种作法非常明智。”我说，“为什么要让它空着呢？你们把它租给新厂长，这更加明智！租给一位厂长，租给一位交际广、威信高的人，比租给普通人好。”

“可是，您不是不支持这样做吗？”玛娅说。

“有什么办法呢？”我叹着气说，“为了我的小朋友索妮娅，我就忍气吞声吧……”

我开始每天去什特雷夫家，希望遇见尤利扬，他已是他们家的房客。可是我却一无所获——尤利扬没有露面。

一天晚上，我问玛娅：

“你们那位房客是不是不来住了？他会不会找了另外的房子？”

“啊，不会！”玛娅大声说，“他没有放弃这里的房间。不过，他要利用美好的夏夜，观察星星。他是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星星是他的专业，他正在写一部关于星球产生和发展的书。”她沉默了一会儿，显得有点激动。然后又补充说：“您知不知道，我用他的天文望远镜观察过木星？啊，您

要知道，这个星球看起来多么神奇啊！”

“是吗？”我不怎么高兴地说，接着也沉默了一会儿，“您是说天文望远镜？好极啦！……难道他有天文望远镜？”

“不怎么大，但毕竟是天文望远镜！”她说。

“是吗？”我象鹦鹉学舌一样重复了一遍，“您观察到了木星？……看来您去过桑多大叔的别墅里他那间单身房间？”

“是的！”玛娅点了点头。“几天以前，我去他那里玩过。”她眼睛里调皮地闪现出了火花，“是与索妮娅和我丈夫一起去的。”她故意停了一会儿后，补充说。

我觉察出了这种故意的停顿，我内心充满了忿怒和惋惜。

“确实是这样，”我说，“当一个人取得了象尤利扬那样高的职务时，要人、美女和上流社会的各种人物都会去他那里做客的。下层的人真难熬啊！我们每周去看一次电影，有时晚上去中心大街散步，有什么办法？”我叹了一口气，“每一个人生来就注定了自己的命运。”

“您的心太坏了！”玛娅以责备的眼神看了看我。“这种话您怎么想得出来？”她沉默了一下，耸了耸肩，“难道您今天晚上来我们这儿，就想说这些话？”

我觉得说得有点过分了，所以决定转换话

题。

“请原谅！”我说，朝她微微弯了弯腰，“这是命运之神尚未从我身上剥夺掉的唯一的欢乐……可是，既然舞台上出现了星星和天体，还有一个使星星接近我们的眼睛的天文望远镜——上帝也可能会剥脱我这唯一的欢乐！”

“哎呀，瞧您说了些什么呀！”她捂了捂鼻子，仿佛吹来了什么难闻的气味似的，“我不喜欢听这种话！假如我的学生这样说，我会给他二分的！”

“您这是什么意思？”我流露出惶惶不安的表情，事实上我确实不安，因为“二分”一词听起来从来不会使我感到愉快。而在尤利扬出现后，我觉得她象一颗定时炸弹。在这外省悠闲的浪漫气氛之中（天文望远镜、星星，行星、木星），弄不好明天她就会跟我翻脸。所以尽管很勉强，我还是露出了愉快和无忧无虑的笑容，挥了挥手说：“玛娅，难道您没有看出我是开玩笑吗？”我说，“您以为我会由于那位夜间观测星星的厂长而吃您的醋吗？别这么想，玛娅，请别这么想，好吗？”

我弯下腰去，殷勤地吻了吻她的手。

“明天见！”我说。

“明天见！”她朝我点点头。不过，我还不至于那么笨，以至看不出她笑得非常勉强。

“等着瞧吧！”我对自己说，“这种身带天文望远镜的厂长现在不会爬得很高的！”

忧虑毕竟涌上了我的心头，就象那头一天上午由于事先存放的那些该死的零件，尤利扬指责我时一样……

我象以前一样去什特雷夫家，但我仔细打听尤利扬什么时候去他们那里（就是说他在那间房里过夜）和他们计划什么时候去他的“天文台”……我不想在隐秘的情况下面对面地碰上这个怪人。很遗憾，他是我的行政和技术领导，不是我不相信自己，而简直是……原则上我避免正面冲突。在大多数情况下，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发生冲突，不会给被领导者带来好处的，过去是这样，今后大概也还会是这样。

九月。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正在擦洗和修理汽车零件，抬头一看，尤利扬站在我身旁。我扔下沾满油的破布头，恭恭敬敬地跟他打招呼。

“继继干吧！”尤利扬朝我点点头。

我弯下腰去，重新拾起那块破布头。怕什么，不是上班时间，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尤利扬点燃了一支长香烟，嘴里往外喷着烟，微笑着，他的眼神看上去友好而热情，瓦灰色的眼睛象鸽子，显得很柔和。

“有好几次，我见您干同样的活，”他说，“总是

慢慢地擦洗自己的汽车。您没有别的兴趣吗?”

“什么兴趣?”我问。

“比如说读读报纸或者杂志，翻翻书呀!我在文化俱乐部开设了图书馆，您一次也没有光顾过!”

“您对我是否去图书馆感兴趣,是不是?”我大声说,“真关心! 谢谢您的好意! 不过说到书嘛，我是在家里读!”

“是吗?”尤利扬似乎有点怀疑。

他不怎么相信地笑了笑，但不敢对我再说什么，大概他想起了我有什特雷夫这样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作靠山吧，而且我不止一次地跟文学教员玛娅这样一位引人注目的女士交谈过文化问题，谁能证明我不读书不看报呢?

尤利扬吸了几口烟,不声不响地朝我挥挥手，慢慢地走远了。他一边走，一边朝旁边轻轻地挥手。

几天以后，由于我谎称读了书，他粗暴地回敬了我。这个好挑眼的小人! 政府要求有色金属加工厂尽快投入生产，而他却注意我的私生活，拿我当靶子，把我变成他注意的中心!

不过……“女人最重要!”法国人说……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使我的名誉在玛娅面前受到影响。

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我在什特雷夫家碰上了尤利扬，玛娅刚刚打发索妮娅去睡觉。

什特雷夫看上去很疲倦，打着呵欠，在窗子旁的沙发上打盹，而玛娅和尤利扬坐在钢琴旁，翻阅乐谱，不时低声交谈几句。当我见他们如此亲热地交谈时，不由想到他们什么事不会干呢，我心中燃起了怒火。

“厂长同志，”我走近他们时，说，“今天晚上您不观察星星吗？玛娅同志说，您经常消极地观察夜空。”

“我没有对您说过他消极地观察夜空！我不使用这种目空一切的词。”

“我相信这一点。”尤利扬说，“我没有听您说过这种话。”

“当我在巴黎时，”我说，“一天晚上，我去蒙马特勒① 散步，那里有一位天文学家建议我用天文望远镜观察木星。”

“真有意思！”尤利扬说，他的嘴角边流露出一丝象刮胡子的刀片一样锋利的微笑，“那么，如果您记得的话，这个不寻常的夜晚是哪一个月？”

“我想是四月，天主教的复活节前后。”

“哈—哈—哈！”尤利扬愉快而又凶狠地大

① 蒙马特勒，位于巴黎郊区，19世纪末成为艺术家、名士生活的地方。

笑起来，“请注意！您在哪里发现了这个天文学家？他把天文望远镜安装在什么地方？”

“忘记了！”我说。

“大概是在高地上吧？”

“是呀，在高地上。”

“那么，那里有些什么著名的建筑物？”

“当时好象没有！”

“哈—哈—哈！”尤利扬又大笑起来，但这一次完全是恶毒的笑。

“笑什么？”我生气地说，“我看不出我的话有什么好笑的，值得这么大笑！”

“您怎么没有说可笑的话呢？”他那双瓦灰色的眼睛黯然失色了，他的目光象巨浪一样朝我紧逼过来。“第一，”他说，“四月傍晚是看不见木星的，即使象您说的那位天文学家也会知道这一点。第二，蒙马特勒高地上耸立着一座古老的大教堂，两个多世纪以前就建成了！”

“也许说的是别的星，而不是木星。至于大教堂，我没有什么印象。我既非天文学家，也不是建筑学家。不，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使您这样盛气凌人地大笑！”

“四月的傍晚看不见任何星星，所以这个时候不会有任何天文学家出现在高地上。朋友，你根本没有去过蒙马特勒，却要谈论天文学家和星星。这如此可笑，假如不是什特雷娃同志在这里

的话，那我更要大笑，恐怕您至今尚未听说过那种笑！”

“每个人都会记住巴黎一些不同的东西！”我蔑视地耸耸肩。

天啦，这个人突然把脸一沉，他的目光象可恶的巨浪一样无情地涌向我：

“您去过卢浮宫①，是不是？”他问我。

“而且不止去过一次呢！”我说。

“那么，卢浮宫前有些什么？”

“能有什么呀！有街道，还能有什么别的东西？”

“哈一哈！哈一哈！”尤利扬重又大笑起来，但这一次他那不祥的笑声中响起了仿佛是凶狠的调子，“您为什么撒谎说去过巴黎？”

“别说他了！”玛娅求他说，连看也没有看我一眼。

祝你活一百岁，我的皇后，谢谢你说的好话！我羞愧得透不过气来。

“谢谢您，玛娅！您维护了我！”我低声含糊地说，“这个人不懂得开玩笑！我开个玩笑，可他却当真了。咳，咳！”

于是，我赶紧溜走了，免得他问我在家里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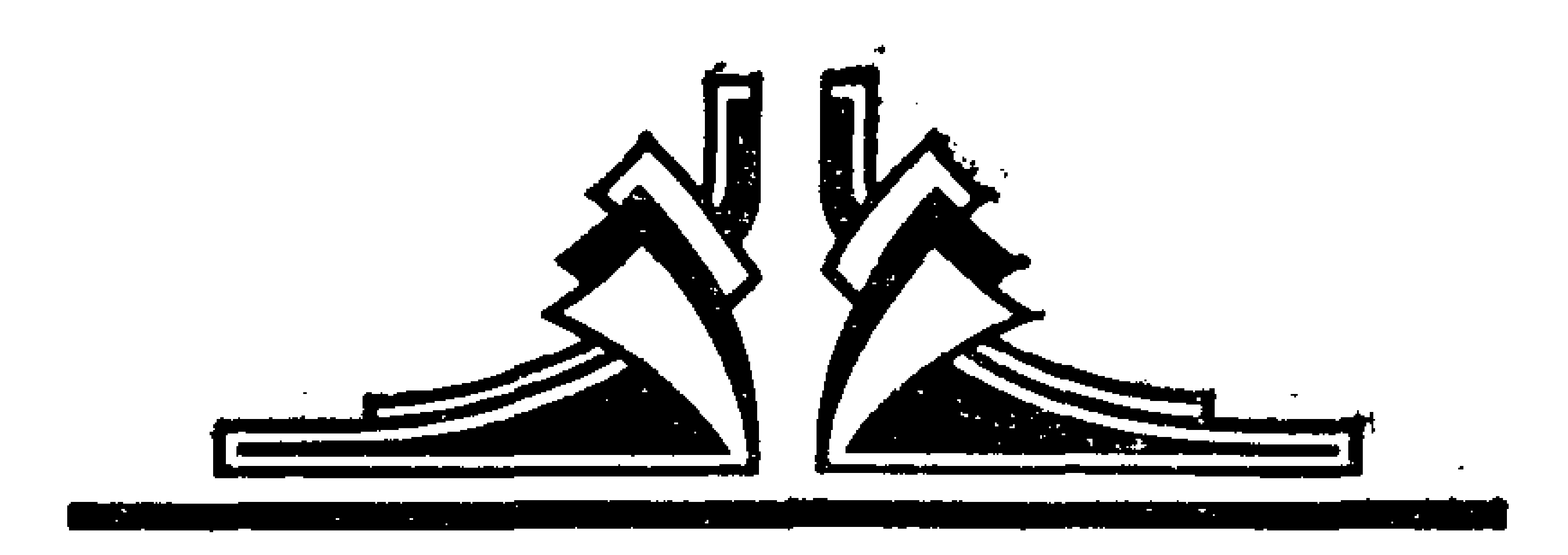
---

① 卢浮宫，位于巴黎，原为王宫；1791年起改为美术馆，藏有许多古埃及、古希腊罗马及西欧的艺术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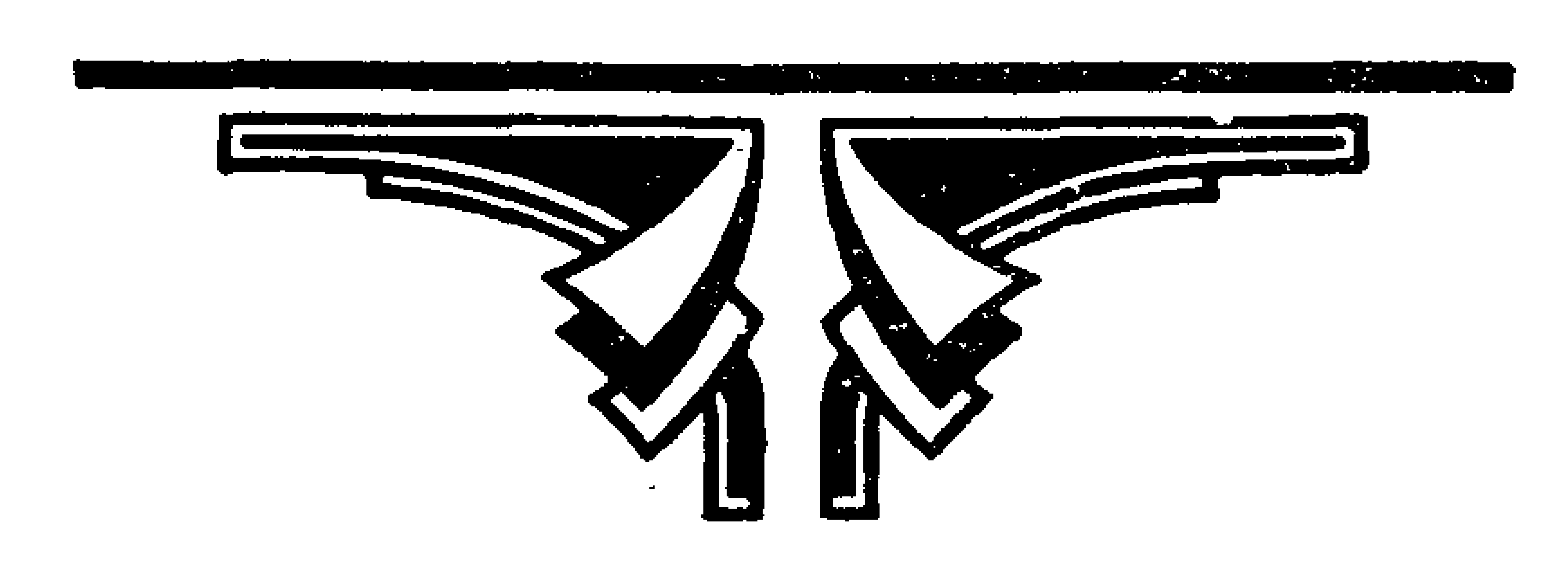
些什么书，而我家里连一本书也没有。我是来H城建厂的，而不是来用书消遣的。

尤利扬就是这样一个不懂礼貌、没有良心的人。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嘲弄属下人员，用这种方式在美丽的玛娅的眼里抬高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了不起的领导者和理想的男人！

真是个可怕的人！



作者关于尤利扬的
青年时代及当时
他在H城生活的札记



埃夫蒂莫夫一家

尤利扬出生时，从戈尔诺里亚霍沃村到H城有半天路程。当时，从戈尔诺里亚霍沃去县城都是乘马车。那是一条土路，马车后面尘土飞扬，遮天蔽日。二十年后，尤利扬正好中学毕业，从H城去戈尔诺里亚霍沃一小时就够了，当时正好修了柏油马路，新公共汽车弹指间就把他送去了。现在，去戈尔诺里亚霍沃又得要半天，就象当年马车沿着土路吱吱爬行，车轮深陷在泥土里一样，倒退到了过去那个时代。这不是因为重又时兴马车，无论你去哪里，今天既没有马，也没有那种车！——这些东西只留在年纪比较大的人的记忆之中，只有在这种朦胧的回忆中才可体会到马蹄得得、车轮愉快地吱吱作响的情景。过去的事物既没有恢复，也不可能恢复，可是戈尔诺里亚霍沃已经人烟稀少，不再是农副业基地，所以不会使H城感兴趣了。而H城变成了一座工业城市，

对戈尔诺里亚霍沃失去了兴趣，不再理它。它们之间过去那条十分活跃的道路已经荒废了，柏油路面严重损坏，到处坑坑洼洼，象是数千辆坦克从那里驶过，被履带碾过似的。所以，如果有人想开小汽车经过那里，不想拿车的弹簧冒险的话，那么他沿着那沟痕遍布、坑坑洼洼的路面每小时最多只能行驶十公里，也就是说需要半天，就象使用各种各样的马车和酒罐车那个时代一样。

戈尔诺里亚霍沃由两个村庄组成，下村位于平原上，而上村则座落在山坡上，再往上就是山。村中心在一层层的台地上，那儿解放前就有一所学校，不同的时期进行了多次修缮。六十年代，当尤利扬在戈尔诺里亚霍沃念书时，那所学校是七年制，人很多，仅戈尔诺里亚霍沃的学生就有一百名左右。

很早的时候，下村的居民种植葡萄和粮食作物，而上村人则养羊，砍树烧木炭，采集草药。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后来的农工综合体，戈尔诺里亚霍沃人发展了生产，他们的劳动收入也得到很大提高，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天然的“后方”——H城。葡萄酒厂会收购全部葡萄，酒桶作坊和大车作坊收购木料，山里的草药和本地土产——野草莓、黑莓、马林果、石枣等，被有远见的H城妇人抢购一空，她们自古以来就是自

然疗法的信徒和家制甜食的热烈爱好者。

一切就是这样进行着，直至寂静和偏僻的H城变成沸腾而热闹的工业城市为止。热火朝天的建设开始了，H城里里外外都变了样。在生产葡萄酒和果酱的同时，准备生产陶瓷面料和有色金属轧件。在青年人移居H城后，戈尔诺里亚霍沃留下来的人不多了，他们开始为州城啤酒厂种植啤酒花，给那里的家具厂供应木料。通往州城的公路铺了沥青，而通往H城的公路却任其自然地荒废了，渐渐变成了“叹气之路”——搬到H城的戈尔诺里亚霍沃人，每当回家探望自己的老窝，返城时总是为“失去的天堂”而长叹。当然罗，当他们重新踏上新H城的大街，置身于专门用来驱散浓雾的黄色灯光之中时，他们就立即把“天堂”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们尽情地享受H城共和国高级饭店里的暖气、威士忌和舞厅所带来的快乐。

这样，从前面提到的这条路的命运中，我们可以看出戈尔诺里亚霍沃与H城关系史上的某些篇章。我们自然不会深入地去探讨这一问题，因为我们感兴趣的首先是年轻的尤利扬，而其他的东西只是作为“历史背景”顺便提一下而已。

关于三十七岁的尤利扬，我们听到了相当多的说法，但作者认为这还难以确定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意见多种多样，一些是相同的，另一些则分歧很大。尽管相同的意见占多数，但某些

比较特殊的看法，否定的和半否定的，也能引起严肃的思考。不仅如此，作者觉得即使那些相同的意见——也不足以说明尤利扬的性格，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使它变模糊了。

无论如何，作者决没有把自己对尤利扬的性格的看法强加于人的意思。假如他想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读者的话，那么他就不会给读者讲述旁的人所听到的和所想的东西了。作者见到的是什么人，就把他描绘成什么人。

还是让读者大胆说说自己对尤利扬的看法吧，作者将揭示一些有关这个有意思的人的家族和他青年时代的某些材料，为读者提供方便。至于他父母的生平材料，是从一些年龄较大的戈尔诺里亚霍沃人那里收集的；而关于他青年时代在H城的生活，作者从H城中学的档案里发掘了一些，同时与他以前的老师和房东，还有另外一些不愿在作者的故事中透露其姓名的人—他以前的同学和朋友谈过话。

尤利扬的祖父埃夫蒂姆在戈尔诺里亚霍沃村当了多年的牧师，他对教民要求严格，同时也严以律己。年纪大的戈尔诺里亚霍沃人讲述他如何两次因犯了错误而自我惩罚。有一次，他听取一位少妇忏悔时，脑子里掠过一丝邪念，于是他罚自己吃两个月面包和水，而当时是一月，餐桌上有烤火鸡、香脆可口的油炸食品和千层饼，还有

戈尔诺里亚霍沃淳香的红葡萄酒。第二次惩罚自己是因为复活节前夕他跟妻子同居了。整整一个月，他赤着脚在街上和野外行走，赤着脚去教堂，赤着脚作弥撒，头发也没有梳成髻，就象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那样披头散发。要不然，他倒是个体态端正的人，有洪亮的嗓音，一唱赞美歌，吹一口气，就象刮东北风一样，离他最近的蜡烛全被吹灭了。

为什么和怎样免去了他的教衔的呢？这件事传遍了整个教区，传到了H城，在社会舆论界引起了激烈的反响。戈尔诺里亚霍沃有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寡妇，小的两岁，大的八岁。这个妇女的丈夫去世的那一年，当地一个财主拿出死者欠他债的借条，连眼都不眨一下，就把她唯一的一块地占为了已有。寡妇失去了理智，抱起最小的孩子，一同跳入村边李子林附近的水坝里。埃夫蒂姆牧师为这个不幸的女人和她的孩子举行了安魂祈祷。从墓地回来后，他在教堂院子里燃起了大火，把十字架和圣母像扔进了火里。由于犯了渎神罪，他被传到该教区宗教法庭的被告席上，被宣布为异教徒，解除了教衔。但是，这位以前的牧师并没有由于这一严重处分而灰心失望，他剃光了头，穿上长统靴，系上红腰带，在富裕门下村商业街开了一家小店。开始时，他出售一些服饰用品、煤油、焦油、绳子等商品，而后来——

就是对最富于想象力的人来说也很突然——他把小店变成了肉铺。他买进牲畜，亲手屠宰，但并不随便卖高价，而且还赊给穷人，到了该还帐的日子，他也不去逼他们。只有对那个害死了寡妇的恶棍，和他的全部亲戚，包括他本家和舅舅家的人，他连一丁点儿肉也不卖。他有一条象牛犊一样大的狗，它安静地躺在肉铺前，不咬任何人。但只要那个恶棍从什么地方一露面，它便马上跳起来，黄毛竖立，露出利齿——朝他猛扑过去，咬他。不过从来没有咬伤过他，前牧师只训练它吓唬一下那个坏蛋，却不想让他那不干净的血流出来。

这位从前的神职人员盖了一所两层楼的漂亮房子；当他妻子去世后，他又续了弦。他第二个妻子，戈尔诺里亚霍沃村里唯一离过婚的女人，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在婚后的第七天就把他赶跑了，她肩上扛着猎枪，在山上建了三个烧木炭的窑。这个当时有些古怪的女人名叫伊万娜。她生了一个儿子，前牧师为了表示自己对妻子的怀念而给他取名伊万。尽管埃夫蒂姆的肉铺和其他东西有着丰厚的收入，可伊万娜还是不放弃烧木炭。她雇用上村的穷人，接济他们，给他们分木炭。她为什么要烧这些窑，戈尔诺里亚霍沃人无法理解，只有她丈夫觉察出来了，但他不说。他比她大二十岁，他觉得对她一些任性的要求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这是很自然的。她最喜欢胡闹着玩，这一弱点后来使她付出了生命。一个早秋的晚上，她漫游山毛榉林，遇上一场大雨，她仍然在窑旁边过夜，这样便得了一场重病，两星期后就闭上了眼睛。伊万当时十四岁，他父亲刚刚送他上H城混合中学。

伊万长大了，他沉默寡言，爱好沉思，喜欢作出突然性的决定，跟别人的关系弄得很僵。他是个数学尖子，读了不少书，但他几乎不与任何人交谈读书心得。他难以交朋友，同时又容易失去朋友，因为他对他们的缺点既不愿避而不谈，又不能适应。在政治方面他保持中立，但毕业前一年，他在学校的历史小组作了一个报告，毫不含糊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去解释历史事件。紧接着，在热烈的讨论中，他把法西斯组织的头子们说成是“不学无术之徒”，对其中某人的抨击尤其猛烈。由于这种行为，他差点儿被学校开除，但他在此之前无可指责的品行和他作为数学天才无可争辩的威信，使他免于处分。

被革去教衔的牧师好不容易盼到儿子长大，想把店铺和帐目都交给他。牧师早就不屠宰牲口了，也不在肉店站柜台，他侄儿暂时代理一切；而他大部分时间就站在凉台上，远眺山中他死去的妻子烧过窑的地方，仿佛盼望她肩上扛着猎枪从那里出现似的。可是，关于肉店的事，伊万连

听也不愿听，更不要说经营了。他的心向往书籍，他总想跟老师们在一起，如饥似渴地听他们回忆九月起义[①]的日日夜夜和讲述苏联的奇迹。

他在家里和图书馆之间闲逛了一年，然后一扭头，到贝尔科维查师范学校念书去了。现在，老头手边既没有圣经，也没有十字架，无法发泄对不孝之子的不满情绪。他卖掉店铺和财产，只保留了一些静静地放在林间路旁草地上的蜂箱。他盖了一间茅屋，搬到那里住下。而变卖财产的钱，他都捐献给了图书馆；另外，给伊万留了一所房子和一个大金首饰，以使他记住自己的母亲。一年后，他望着那条通往山间的路，静静地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醒来。

那是紧张的革命年代，群情激愤，充满了浪漫色彩。三十年代中期，戈尔诺里亚霍沃的教师们几乎每天都盼望革命爆发。他们晚上听信使从城里带来的消息，而早晨则站在学校的高地上，朝H城望去，看有没有一队队起义的人民，打着红旗，吹奏着音乐，朝这边行进。伊万同样注视着那个方向，侧耳细听远方的音乐，观看红旗，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以严肃的表情走进教室，出一些难题考学生，对他们吹毛求疵，毫不留情地记二分。

---

① 1923年9月，保加利亚爆发了反法西斯起义。

“你这样难为孩子们干什么?”有一次音乐教员问他，她是他的朋友，并跟他同在一个党小组。“一个新世界诞生了!”她激动地说，“可你却用那些直角边和斜边把学生弄得糊里糊涂!打倒资产阶级的无聊作风!”

“可我认为革命不会鼓励空议论，不会为愚昧敞开大门!”伊万紧锁着双眉说。

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不尽相同，但相亲相爱。伊万唱歌走调，维奥列塔不会区分直角边和斜边，圆规和音叉之间能找到什么共同之点呢?如果以为有相同之处那是可笑的，尽管如此，伊万表示爱她，而维奥列塔马上同意了。难道当初被革去教职的牧师埃夫蒂姆和烧木炭的伊万娜的心灵之间存在过相同之点吗?

他们婚后一年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爆发战争的第二年，伊万参加了游击队，随后不久，维奥列塔也上了山。伊万在H城混合中学的同学迪尼奥·迪诺夫斯基也从邻村多尔诺里亚霍沃跑出来，钻进了树林。迪尼奥和维奥列塔在另一个战区不同的游击队里，但他们三人命中注定被同一颗福星所照耀——奇迹般地经受住了同法西斯分子、寒冷和饥饿的搏斗，九日①晚上，他们作为H城的胜利者走到一起了。在黑暗中，维

① 1944年9月9日，保加利亚从法西斯统治下获得解放。

奥列塔根据走调的歌声认出了自己的丈夫，而伊万根据自己妻子那温柔悦耳的声音发现了她。第二天早上，他俩在市政府门前遇见了迪尼奥，他受委托负责组织H城临时行政领导班子。

“你适合干这种差事——组织官僚机构，”伊万傲慢地说，“而我，要是取决于我本人的话，我想干点小事！哎！”他握紧了拳头，忧郁地摇摇头，“嗯，上帝不让好牴人的母牛长角呀！”

“你想干点什么‘小事’？”迪尼奥怀疑地望着他。

伊万又叹了口气，然后拉着妻子的手，到广场上去了。

尤利扬生于一九四七年，当时是七月，所以给他起名为尤利扬①。伊万提议起这个名字，因为他很尊敬那些性格坚强、立场鲜明的人，如罗马统帅尤利·恺撒②。而维奥列塔表示同意，她觉得这个名字既好听，又漂亮。

只有迪尼奥·迪诺夫斯基有一次在H城遇见伊万时，表示不同意！

“尤利·恺撒反对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他给朋友提起了这个历史事实，“他惩罚共和政体的领

① 保加利亚语中“七月”音译为“尤利”。

② 尤利·恺撒（公元前102/100年——前44年），罗马独裁者、统帅。

袖，宣布自己为独裁者!”

“知道!”伊万不愉快地点点头，“今天我们这里不会产生找共和政体的拥护者算帐的那种人，而且共和国非常需要性格坚强、手段果断的人!所以我认为起这个名字没有错，而且很好!”

一九四八年秋，领导决定让伊万和迪尼奥去苏联学习机械工程，迪尼奥马上表示同意，并且去了；但伊万放弃了这次机会，留在了农村。当时戈尔诺里亚霍沃正好建立生产合作社，这种事情是少不了伊万的，他请求下一年再去。可是，第二年年轻的合作社经历了危机，他是管理委员会主席，轮船遇险时舵手离开岗位是不行的。接着，复杂的年代来到了，不是要解决“谁战胜谁”这一历史性问题吗，人们的心灵里也爆发了革命。这样一来谁也不再提学习的事，何况伊万本人也把这事忘了。七年后，由于在艰苦的头几年，他对反对派和动摇分子做得太过火了，而被从主席位子上拉下马时，他想起了这件事。想是想起来了，可是为时已晚，学习的年代一去不复返地飞逝了，运气已经完了。他是个“过去”有功的人，所以没有让他失业，重新派他去戈尔诺里亚霍沃一所旧学校当算术教员。这样，他又成了妻子的同事，她教孩子们多、元、咪……他们在那个教研组相遇了。当年他们就从这间房子的窗户里往外瞧，看有没有暴动的人流欢天喜地地打着红旗，

朝这边走来。

从这以后，尤利扬父母的生平中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了。他们先后去世：他母亲先走；而他父亲是在尤利扬取得数学硕士学位后一个月去世的。我们只想提一提最后一件事。在十一年级，尤利扬毕业时，教员伊万将当年被革除教衔的牧师埃夫蒂姆送给他，以使他记住自己的母亲（肩上扛着猎枪，骑着骡子去烧木炭的伊万娜）的那件金首饰，送给了尤利扬。

我们借助于年纪较大的戈尔诺里亚霍沃人的回忆，讲述了（尽管是粗略地）尤利扬的父母的生平，以便了解他性格中某些重要的遗传因素。究竟哪些遗传特征注入了他的血液里，是怎样溶合的——关于这个问题，作者不应当跟读者交换自己的看法，何况这是不适当的，以免使读者为难，或者说不应当跟那些讲述的人发生争论。自然，他变换了他们的名字，但这不一定非要他同意他们的意见，更无需在他们的意见后面署名。他刊登了他们讲述的故事，用公文语言来说——“备查”，而读者是否接受他们对尤利扬的看法，或者持否定意见，抑或是批判性地对待这些看法，否定这一部分，同意那一部分——这是他们个人的事情。“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嘛”——作者高度评价这句通俗的话语。

尤利扬在戈尔诺里亚霍沃度过了童年和少年

时代，在当地学校念到七年级。那是令人忧虑和充满暴风雨般的岁月，所以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不是平静地度过的，不象后来一代人只在学习和无忧无虑的游戏中度过。世界在他眼前崩溃了，紧接着又重建起来了。学校也发生了变化，譬如给他印象很深的是课本中许多东西不可信，用新的解释代替了旧的；只有算术谁也没有碰一下，这门科学矗立在世界上，其中一切都是无可争辩的，谁也不会怀疑它的那些定理，或者想用新的代替它们。在不断变化和靠不住的早期生活知识的海洋里，算术最牢靠。还有他父亲坚韧不拔和信心坚定的品质给他留下了良好印象。有的人咒骂他，另一些人颂扬他——他既不会情绪低落，也不会飘飘然，始终保持着平衡。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对权利和尊严的理解而得到报偿。只在当有人对他要狡猾的手腕，公开践踏真理或者嘲弄神圣的原则时，他才怒不可遏。在这种情况下，他变得凶狠而危险。尤利扬尽管对真理的认识还很模糊，但他觉得眼前的父亲象个巨人。尤利扬绝对相信他，并且当他与他母亲进行激烈的争吵时，尤利扬内心里总是站在他一边。每当他伸出手指，斥责反对派或恶霸时，她总是表示反对，不能忍受他的过火行为，反对他的极端措施。一开始就坚定地站在父亲一边的尤利扬，不同意她的观点，但内心里佩服她，为她有与这样严厉的人

进行争论的勇气而高兴。他父亲一般不同意，不让步，最后挥挥手，拿起鸭舌帽，静静地站着，听他母亲说完最后一句话。而她沉默不语，砰地一声关上门，走进里屋。这种场面的结局往往都是一样的：他母亲掏出手帕擦眼泪，而他坐在她旁边，低垂着头。可能是因为她为他而发愁。或是她很快就没事儿了——她是了解自己丈夫的品德的；于是，她拥抱他，将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开始低声地为他唱歌，歌唱当过小羊倌、牧过羊的小伙子，歌唱救出了自己的情人的羊倌，歌唱公爵夫人塔玛拉……然后兴致勃勃地唱起了一九零五年的俄国革命歌曲，每次都以情调伤感的“夜晚的钟声”这首歌而告结束。

在这里，作者顺便问一下，肩上扛着铁枪烧木炭的伊万娜当年是否给儿子伊万这样唱过自己喜欢的歌曲，就象当过游击队员的维奥列塔给伊万的儿子尤利扬唱歌一样呢？

世界上还有一些固定的东西，在我们这位主人公还是少年的时候，就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譬如星星。为了让他更快地成长，培养他的独立生活能力，夏季伊万总是送尤利扬去他姨父佩尔万的牧场，他当时负责放牧一部分合作社的羊。羊圈位于山麓的林间草地上，前面伸展着一片绿草地，后面茂密的山毛榉林郁郁葱葱。温暖的夏夜里，佩尔万露天睡在羊旁边的角落里，在

自己身旁为尤利扬铺了一张羊毛垫子。小孩习惯于城市的家庭环境，难以入睡。羊毛刺着他，树叶的响声打扰他，两只捕狼猎犬突然的叫声使他胆战心惊，可是蟋蟀的歌声使他沉浸在幻想之中，他久久地仰望着头顶上的繁星，为每一颗星总是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而感到奇怪，任何一颗星不会妨碍别的星，不会挡住它的道路。有一次，他听见一个戈尔诺里亚霍沃下村的人恶狠狠地对他爸爸说："你和你的人挡住了我的路！"天上不会发生这种事，那里秩序井然。"上高年级时，我会学习星星如何遵守秩序的。"尤利扬想。"高年级不是要讲授有关天空和星星的课吗。"有一回，他给爸爸讲起了天文观察的印象，爸爸打断他说："别急，上中学时你会学习有关星星和天体规律方面的知识！一切都得按步就班！"

尤利扬在戈尔诺里亚霍沃七年制学校毕业后，去H城混合中学继续学习。他离开戈尔诺里亚霍沃时，心情很压抑，他父亲被撤掉了主席职务！母亲常常哭泣，一些过去被伤害过的富人家的子弟在他面前幸灾乐祸，讥笑他，威胁他。"新主席上台，也决不会让你们得意！"他轻蔑地回敬他们，"你们这些富农余孽！"他十四岁时，已经懂得政治，但他内心非常不快，为父亲而痛苦。他一贯相信的神圣真理，现在被某些人当作石头抛弃了。

尤利扬寄居在父亲的一位老朋友特里方·瓦西尔乔夫家。当时特里方·瓦西尔乔夫是市委宣传部长。他有一个女儿，叫卡琳卡，比尤利扬小两岁，身体瘦弱，双肩耸起，胸脯扁平，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戈尔诺里亚霍沃合作社前主席、现任教员伊万在一家普通但很干净的餐馆为儿子预付了膳食费，为他在市中心书店买书开了帐户，接着就回去了，没有说什么温柔的话语，只是使劲拍拍他的肩，握握他的手。他唯一的嘱咐是：好好学习，凭良心生活。三十年前，被革除教衔的牧师埃夫蒂姆把儿子留在H城念书时，也表示过同样的愿望。在生活奇怪的变化中，什么事情不会重演呢！

尤利扬几乎完全是沿着父亲的脚印在前进。他不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在不影响交际的情况下，他不爱瞎聊，不跟那些海阔天空胡聊的人为伍。他学习很好，但各门功课中最喜欢数学。早在那时，他就养成了严肃的性格，不喜欢精神萎靡不振、意志薄弱的人。他固执，有时刻薄地批评别人，满心自负，所以别人难以跟他来往，这种情况并不使他感到特别痛苦。

他喜欢独自到野外去，爱听音乐，爱从后面看漂亮的姑娘。当我们指出他喜欢独自散步、爱漂亮的姑娘和音乐时，必须马上指出三点，否则对

他的看法就不准确。第一，他多半喜欢严肃的音乐，尤其是维也纳华尔兹舞曲；第二，节假日他不去野外，“群众性的”郊游妨碍他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会扰乱他的思维，他不喜欢星期天去集市散步；第三，他都是偷偷地看漂亮的姑娘，但不追她们，而等待她们来追他。

象别人一样，他也为自己的弱点付出了代价。为了听音乐，他不得不出去做客（卡琳卡和她的女友都疯狂地喜欢流行音乐），而出去做客打乱了他的计划，中断了他的工作。为了不让人流影响他，他最乐意天气不好时出去散步。因为他不去追求姑娘们，于是便制定了一套“固定不变的”战略——以自己的威信给她们以强烈的印象：在数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在小组会上积极发言；在有漂亮姑娘参加的场合说些俏皮幽默的话语。

“幸福的青年时代！”——假如不是如此坚决地保证沉默，以免影响读者的意见的话，作者准会这样怀念地感叹。

不管尤利扬有什么弱点，并不影响他那始终如一的强烈的自尊心：要在数学方面继续前进，一定要在最短的时期内把最好的人抛在自己后面，要取得在他之前H城中学任何一个学生不曾取得的优秀成绩。

尤利扬在数学、物理和天文学方面怎么会表现出这种强烈的自尊心呢？无疑，他的家族有这

种根基。一些退休的老教员还记得他父亲——被革除教职的埃夫蒂姆的儿子——突出的数学才能。而在后来成了店主的埃夫蒂姆牧师本人身上，大概逻辑思维与抽象的神秘想象是齐头并进的。当然啰，时代已从埃夫蒂姆牧师的儿子的意识中清除了神秘主义，而埃夫蒂姆的孙子继承了爷爷抽象的想象力，这有助于培养他数学方面的爱好，鼓励他以顽强的精神去探索和发现真理。

作者认为这些遗传特征构成了尤利扬的性格的基本核心。但是人的性格中“纯”核心一般是不存在的，还要加上父亲和母亲方面的其他特征，还有在不小的程度上一个人在其成长的环境中所养成的特征。大概那个烧木炭的古怪女人和爱好浪漫歌曲的母亲都“活”在尤利扬的心上吧；而当年强加在他父亲头上的罪名，肯定象不灭的炭火一样，在他心里暗暗地燃烧。

但是，走过了作者解释和假设的不可靠的小路后，应当重新踏上事实的阳关大道。九年级时，他在数学方面已经是第一名。十年级一开学，他就在老师的帮助下，开始研究高等代数。十一年级末，他在《自然与代数》杂志上发表文章，解析“不同种类的线性微分方程式”。这是个复杂问题，就是对高年级大学生来说也够难的了。他的数学老师几乎都以同等的身份开始跟他交谈。

为了利用外国的数学和物理书籍，他潜心学

习俄语。苏联翻译出版了世界上所有的名著。通过市图书馆和在人民银行当地分行的帮助下，他节衣缩食，顺利得到了一些最引人注目的物理、数学和天文学出版物及其目录。

现在我们该三言两语谈谈这位主人公的外貌了。我们可以参考几张班级毕业照，是最后一学年末照的，作为资料保存在学校图书馆的影集里。奇怪的是，无论是《算法》杂志的编辑，还是这些杂记的作者，都未能找到尤利扬独自照的像片。作为一个年轻人的生活起点的实物证明，非常需要这种照片。运气朝作者微笑了：作者认真地调查他的生平足迹——几乎被擦掉了的生平足迹将他引进了一个中年妇人的装订工厂。这个妇人象天使一样可爱，骶骨受过伤，左腿不可救药地瘸了——几乎是拖着走，象是别人缝上去的一样。在这家工厂里，作者在一个洛可可式的小巧精致的旧柜子的玻璃后面，发现了尤利扬的照片，从反面用圆珠笔写的日期来看，是他十九岁那年最后一次去H城之前照的，因此这张照片是尤利扬的毕业照。

那个有着天使般可爱面容的中年跛腿装订女工名叫莉莉。

不过，关于尤利扬与莉莉的故事，读者将会从尤利扬亲自写的日记中另外了解到一些东西。现在作者想利用这个机会，利用从装订工厂的柜

子里找到的东西，用几个简洁的故事描绘一下主人公——他当时是什么样，就描绘成什么样，而不是十七、八年后，他当了有色金属加工厂厂长时的情景。

在照片的深处，巴尔干山象个幽灵在远处模模糊糊地现出了轮廓，它的山脊象托多尔的洋娃娃峰或另一座类似洋娃娃的山峰。作者想指出的是，就是这座巴尔干山，同样可以从桑多大叔别墅的凉台上清楚地观察到，尤利扬第二次在H城逗留时就住在桑多大叔的别墅里……

不过，让我们回到照片上来吧。尤利扬穿着学生装，对他的身材来说明显地短了点，没有戴帽子。他那高高的额头会使人感到惊讶，不听使唤的厚发乱蓬蓬的(大概被风吹的)，使人觉得可笑。一对大眼睛射出坚定的光芒，仿佛它愿意时，就能在自己和世界之间竖起一堵无形的墙似的。他的嘴几乎是直的，上嘴唇中间有点弯，象拉得不太紧的弓上的弦。颧骨突出的脸上已经长了络腮胡子，不算漂亮，但会博得别人的尊敬，因为可以看出他意志坚强、自信和有文化修养，这些优点不是每个青年人都具有的……是的，尤利扬早在那时就有一张给人印象深刻、在无数的人中能使人记住的脸。

关于尤利扬的照片，作者想提一下一个细节，一个穿着学生装的姑娘，腼腆地抱着双膝，

坐在他腿旁稍高一点的位子上，看上去象十七岁，最多十八岁。一个人只要认真注意她那温柔可爱的脸和值得信赖的深蓝色的眼睛，就会不费力地认出她就是今天的那位，在工作间里放着洛可可式柜子的装订工人，不过这是当年的她。不用说，当时她处在青春时期，如同金色的朝阳。

为了结束有关尤利扬青春时代生活的叙述，作者向读者提供他在H城中学文学小组会上的几次发言，并试图重现一部分尤利扬与莉莉的关系史。

……我以极大的好奇心认真地阅读了伊某某和佩某某的作品，这些作品描写农村合作化的胜利。假如根据他们写的东西来判断的话，那么两位作者离真理那样远，就象从我们这里到月球的距离一样。在伊某某的小说中，农村革命被描绘得象一个欢乐的婚礼，人们听了一个报告，受到教育，于是就同心协力地携起手来，去地里铲平了地界，并在那里高唱《国际歌》；回来后，男女老幼去场地上跳起了霍罗舞①，连大地都震动了，只有本村最有名的一家财主从紧闭的窗子里往外窥视，并不住地咒骂，声音当然非常小，因为他怕别人听见……这是彻头彻尾的胡言乱语。农村革命对一些人来说是婚礼，而对另一些人来

① 霍罗舞，是保加利亚一种民间圆圈舞。

说则是葬礼。在田野里唱《国际歌》，但教堂里的钟没有敲响，……而且不是从一个窗子里，而是从相当多的窗子里，许多忿怒的人往外瞧，他们那样地咒骂，十个村子九个能听见……不过，如果说伊某某用带露水的花束来掩饰真理的话，那佩某某则是赤裸裸地侮辱真理。你瞧，穷人们对合作社一无所知，就作出了决定；而对合作社有所了解的富裕农民——硬把他们拉进去，所以头几年合作社很不顺利……简直岂有此理！……我建议这些作者去描写鹳如何在春天用嘴叼着小鹳或者歌唱"祖母的纺车"，而不要抓那些决定命运的题材，对此他们既无经验，也不理解，还缺乏"头脑"！

……既然你们对我的意见感兴趣，我就告诉你们：跟狂人创作的现代诗歌比起来，我更喜欢写得好的传统诗歌……

……有人问我为什么我这个数学爱好者来到他们这些文学爱好者中间，说什么我象杆面杖吹火——一窍不通。我要以同样的精神回答这些好奇的同事：我来这里，是为了让你们——亲爱的同志们——中间也有一位聪明人！

……姆同志肯定地说，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是一门"令人伤感"的艺术……由于她的这番话，如果我是国王的话，我就会提姆同志为王后，也许我会把手伸给她……啊呀，姆同志！唯一跟数

学接近和相似的一门艺术，您想想看——这门艺术就是音乐，首先是莫扎特[1]、贝多芬[2]、肖邦[3]的音乐，因为如同数学用方程式释译自然界中不清楚的规律一样，音乐用和声去表现任何其他艺术无法表现的人的内心的激动！……

---

① 莫扎特（1756—1791），奥国作曲家。

② 贝多芬（1770—1827），德国作曲家。

③ 肖邦（1810—1849），波兰作曲家、钢琴家。

跟莉莉的关系

直至十一年级毕业时，尤利扬才以自己“固定不变的”战略在爱情方面获得了胜利。十一年级有一个名叫莉莉的姑娘，她的头发象玉米穗一样呈金黄色，两只眼睛象高山湖泊一样呈深蓝色。她那圆润的小嘴总是温柔地微笑着——声音柔和动人。她腰很细，而腿长得象小羚羊。她是个好学生，文学课全班第一名，但没有任何突出的特点，例如象尤利扬所表现的那样。他早就爱上了她，那是为什么？不过哪个小伙子会说出他为什么爱上了一个姑娘呢？大概她对他也不是没有意思吧，可是他的名气那么大，把他弄得象一尊塑像，而姑娘们怎么会承认自己爱一尊塑像呢？

一个十月的晚上，文学小组散会后，他俩一下子肩并肩地走在一起了，谁知道为什么——他们自己也难以置信。其他的人很快就走散了，——他们与微分方程式和积分有何共同之处呢？让他

俩尽力设法找到共同的东西吧，这会为他们说笑打闹提供很好的借口。

"要不要我送送你？"尤利扬朴直地问。

"不用！"莉莉有点不好意思，"可别耽搁你的时间！听说你总是很忙！"

"胡说！"尤利扬有点生气地说，但愤而不怒。

"不知道！"莉莉说，"别人都说你一贯很忙！"

"嗯！"尤利扬耸耸肩，"我没有时间打牌、听流行音乐和参加各种吃吃喝喝的集会，到那里去的往往是一些最无才能、最无出息的青年男女。不过，我随时都乐意听听好的音乐和去公园散散步！"

"我就住在公园那边，在罗西查街！"莉莉马上说，"只过两条街，很近。"

"知道！"尤利扬朝她微笑着说，"好几次你从家里出来时，我看见了你！"

"是吗？"莉莉出自内心地感到惊讶。

"你们家在银行分行旁边，而我有时去那里，请求允许我订俄文杂志和购买某一本非常重要的书。"

"如此说来，你也认识我母亲罗？"莉莉差点儿绊倒了，尽管这地方人行道很平。

莉莉的母亲是分行行长。

"她是个非常可爱的妇人！"尤利扬说，"看上去极其严厉，但我敢肯定，她的心象棉花一样

歌！”

莉莉在这个问题上持相反的意见，所以她没有吱声。

“让我们走吧！”尤利扬建议说，“我决定在吃晚饭之前，一定要去公园散散步。”

他是说谎。公园今天不在他的预算之列，而饭店他也决不会去，因为他本月的贷款已经花光了。他肯定会一面翻阅最近一期《自然与数学》杂志，一面用一个咸面包充饥的。阅读和面包相结合好极了，就象豆子炖猪蹄一样。

那是个美好的秋夜，明亮而寒冷。静寂的林荫道上行人稀少。

“真奇怪，你在这本数学中能找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呢？”莉莉说，“我们大家都感到奇怪。文学中有主人公，惊险情节和爱情，可数学呢？只有公式！”

“公式和文学一样解释生活，只不过按另一种方式罢了！”尤利扬笑了笑，“而且更准确，更客观！”然后他继续说：“这些公式研究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宇宙，揭示自然界的规律，深入到它的秘密之中！”

“什么秘密？”莉莉惊奇地问，“难道数学能够猜透譬如说为什么玛丽公主会爱上毕巧林① 吗？”

① 玛丽公主和毕巧林，为俄国作家莱蒙托夫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

“但是，它能解释为什么玛丽公主和毕巧林能够相互交谈和接吻，而不会象原子一样从宇宙朝不同方向飞散！”尤利扬说。

“亏你想得出来！”莉莉笑了起来。然后又问：“那么能不能解释为什么星星很美？”

“那有什么难的！”尤利扬说。

“你说什么？”莉莉大声问。

“美就是辉度，而辉度有数量和颜色。数量可以用表格描绘出来，颜色可通过对星球进行光谱分析看出来。你觉得妙吗？”

“妙极啦！”莉莉点点头。

他们在一块周围长满了栗子树的草地上停了下来，尤利扬指着几颗星星，它们在一起正好象字母“M”。

“你知道这个星座叫什么名字吗？”

她摇了摇头。

“是仙后星座！”尤利扬说。“从前，埃塞俄比亚曾有一个国王叫采费伊①和王后卡西奥佩娅②，……你看见了吗？”他给莉莉指了指，“那就是卡西奥佩娅。后面几乎组成一条直线的那三颗星——这是安德洛墨达③……”

① 采费伊，即仙王星座。

② 卡西奥佩娅，即仙后星座。

③ 安德洛墨达，希腊神话中埃塞俄比亚国王采费伊的女儿，为使国家免遭海怪的搔扰，被国王献给海怪，后被佩尔修斯救出。她死后变为仙女星座。

他们从公园这一边到那一边走了两趟，直至这时佩尔修斯①最后才发现被捆在岩石上的安德洛墨达和海怪基特②，它正露出利齿要吃她。当他俩开始围着公园转第三趟时，佩尔修斯从袋子里取出被割断了的墨杜萨③的头，给基特看，基特便立即变成了一个由最普通的石头组成的小岛。他俩在公园里转第四圈时，佩尔修斯拥抱着安德洛墨达，就这样一直抱着飞到埃塞俄比亚首都，降落在痛苦不堪的国王采费伊和痛不欲生的王后卡西奥佩娅的宫廷里。当他们得知女儿如何被救时，便高兴得跳了起来，让安德洛墨达给佩尔修斯做妻子……大家都幸福地生活着，而当他们死后，诸神将他们变成了美丽的星座……

"你瞧"，尤利扬指了指顶空，"安德洛墨达的拯救者和情人佩尔修斯就在她旁边。这个传说好吗，莉莉？"

"我很喜欢！"莉莉说，并哆嗦了一下。

"莉莉，为什么哆嗦？"

"我有点冷。"她说。

直至这时尤利扬才注意到她穿着短上衣。毕竟已是秋夜，从多瑙河平原吹来了一股凉风。

---

① 佩尔修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杀死蛇发女妖墨杜萨，从海怪手中解救了安德洛墨达，建立了迈锡尼城。后变为英仙星座。

② 基特即鲸鱼星座。

③ 墨杜萨，希腊神话中的女妖之一。

“我真该死！”他深深叹了一口气，“我象个卑鄙的市侩一样，只顾自己穿着风衣，没有看见你冻得打颤！”

他解开风衣的钮扣，用一半风衣罩住她的肩。为了这样做，他必须用一只手搂着她。

“你觉得这样做好吗？”她问。

“你指的是什么？”

“就是你这样搂着我呀！”

“可是没有别的办法呀！”他说。然后他又反问：“为什么不好呢？”

她没有回答。

“你就做安德洛墨达吧，”尤利扬说，“凉风就是想要吃掉你的海怪基特，我及时赶来了，使你免受基特的害。”

“可是你从口袋里掏出来的墨杜萨的脑袋在哪里呀？”莉莉低声问。

“咳！”尤利扬说，“现在没有任何墨杜萨了，社会主义时代不允许这种可怕的东西存在！”

“当然罗！”莉莉点点头，“我没有考虑到。”

一种令人心醉的感觉迷住了他们的大脑，当他们紧紧地靠在一起站着时，他们觉得自己真的就是安德洛墨达和佩尔修斯！甚至觉察到真的在黑暗中飞翔，而他们周围金色的星星在闪耀。大概是受这种富有魔力的感觉的影响吧，他低下头去，而她抬起了自己的头；他们的嘴唇碰在一起

了，相互溶合了，仿佛早就在互相寻找似的……

他们手挽着手，又在公园里逛了一会儿，走到浓荫处，他们停下来，又吻了一阵子，仿佛喝过施了妖术的葡萄酒一样，不会使他们的热情熄灭，而在他们的血液中燃起了火焰。

最后，他们到了莉莉的家门口，她停住脚步，说：

"现在该说晚安了！"

"难道不去看看采费伊和卡西奥佩娅吗？"尤利扬问，"由于你这么晚回家，现在他们大概担心得要命吧，我们的出现会使他们高兴的！"

"采费伊早就离开了卡西奥佩娅、不跟我们住在一起，据说去国外了。而卡西奥佩娅是分行行长，非常严厉，不喜欢这种事。"

"可是，当我去请求她支付几个卢布时，她是那样亲切地朝我微笑！"

"天哪，你怎么不明白这完全是两码事！"莉莉的声音听起来是温柔、吃惊和早期女性成熟的某种东西的奇怪的混合物，连最聪明的青年对此也难以明白和理解。"不要把我置于为难的境地！"她求他，同时胆怯地、没有把握地把他的手按在自己的胸脯上。

作者想：在这个美好的时刻，大概旁边有一个恶魔，它听了莉莉讲的话后，说："等一下，小姑娘，你想从我手里逃走，可是我要把你溶化，

让你一生为我付出血的代价！”

尤利扬心胸坦荡，想在行长面前使他与莉莉的友谊“合法化”，他以同样坦诚的方式对自己说：“我为什么要坚持呢？也可以跟她就这样继续下去嘛！”这番没有说出来的话停在了世界上一个最诚实的男人的嘴上。

“嗯，随你的便吧！”尤利扬说。

写到这里，作者放下了笔，以便思考几分钟。假如尤利扬坚持一下，他俩去见了严厉的行长的话，那么命运之神就不会把他引上另一条路，他决不会去有色金属加工厂，也不会去什特雷夫副厂长家。

可是尤利扬没有坚持，他对莉莉说：“嗯，随你的便吧！”接着问心无愧地回去了。

这样一来，在书籍、表扬、计算和公式中，长出了一朵花，它既不象多愁善感的石竹，也不象浪漫风流的玫瑰，而是它们独特的杂种。尤利扬没有因为恋爱而激动得夜不能眠，也没有觉得世界象装饰着五彩缤纷的银铃和充满夜莺的歌声的仙境。他内心里产生的感情更使他愉快，超过了至今一切使他高兴的东西．使他处于最佳的精神状态，他不时吹口哨哼着小调，尽管他没有这种习惯。这不仅没有使他变得懒洋洋的，恰恰相反，大大提高了他的工作热情。

而莉莉的心里长出了什么花呢？

在重要的问题上，作者不爱草率地发表意见，但有理由认为这朵花既象多愁善感的石竹，也象浪漫风流的玫瑰。她由于恋爱而激动得夜不能眠，使她觉得世界象装饰着五彩缤纷的银铃、充满夜莺的歌声的仙境。失去了温柔的父爱的姑娘们更急不可耐地向往男人，更喜欢为忘我的爱情而付出代价，在她们内心的真空里，男人会更快、更容易地受到接待。而在我们上述的情况下，由于尤利扬崇高的感情，由于他在群众中的突出地位和他所取得的成绩及令人倾倒的名誉，这件事更加快了速度。感情和名誉象穿甲弹一样能在女人的心中发生效力；它能战胜她，并开辟出通往她心灵的道路。

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进一步发展，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前进着。

一个五月的深夜，他悄悄地将她带到自己的住所，后半夜又送她回家。一个少女来玩的爱情痕迹是不可能抹掉的，女房东知道了这件事。因为她希望有朝一日他成为卡琳卡的丈夫，所以便不可想象地大发雷霆，要求马上知道那个“坏蛋”的名字，以便在整个H城狠狠地把她搞臭。对她的狂怒，尤利扬报之一笑，塞住自己的耳朵，飞快地从院子里跑出去了。午后，他被房东特里方大叔叫了去，他还是市委宣传部部长。

“请坐！”他严肃地对他说，皱着眉头看了他一眼，威胁地开始捻着自己花白的胡子。然后，他坐到沙发上，使劲在膝盖上拍了一下，突然间哈哈大笑起来，尤利扬觉得连东西都震动了，不由得背上起了鸡皮疙瘩。

“就是说，”特里方大叔说，他停止了笑声，重又拾起手捻胡子，“我的克拉查问过你那个姑娘的名字？”

尤利扬点点头。

“听我说！”特里方大叔捻着自己的胡子，然后捏紧了拳头，“假如你说出来了的话，那我就要罚你站一星期！你做那种下流事还不够，还要去损害那个姑娘的名誉！那我就要开除你的团籍！”

“我没有提起那姑娘的名字，无论到那里，也不打算说出去！”尤利扬坚决地说。

“你去找那姑娘的父母，请求饶恕，当着他们的面秘密地订婚。而等你们两人能自立了，到时候就举行婚礼！而现在你去要一辆车，装上行李，去这个地方——一切我都安排好了。因为我的克拉查不想再见你了，而且对卡琳卡来说也不方便！”他将一张写了地址的纸条递给他，掏出香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就抽起烟来。

当尤利扬已经将手放在门把手上的时候，他从后面喊道：

“有车钱吗？”

"会有的！"尤利扬回答说。

尤利扬还要在H城呆三四个月，然后去索非亚报考机械工程学院，所以他的新住所是临时的——一所旧木板棚，被隔成两半，那一半上了一把生了锈的旧吊锁，大概作仓库用。这个木板棚位于荒芜了的苹果园的深处，在H城的南郊，离通往H站的路很近。

莉莉和自己的两个同学一起来帮他收拾新住所。当见到那番可怜的景象——土地板、木板之间的缝隙和吊在天花板下的灯泡时，姑娘们都愣住了，而莉莉痛苦地将眼泪往肚子里咽，她深深感到自己有罪，使心上人遭到了不幸。

两个姑娘走后，尤利扬跟莉莉谈了特里方大叔的建议。

"不知道！"莉莉犹豫不定地说。

"你瞧着办吧！"尤利扬耸耸肩。然后他低下头，吻吻她那泪水汪汪的眼睛，把她紧紧地搂在胸前。"假如你问我的话，"他说，"我不喜欢秘密订婚。"

"那我们就什么也不要做！"莉莉弯下腰去，折断了一根草，开始在手里揉搓起来。

"好吧！"尤利扬说，"一切我都同意，只是不要带来不愉快！"

他们走进木板棚。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荒芜了的苹果园沉入某

种凄凉的紫蓝色的黄昏之中。

一切都“顺利”地过去了，至少尤利扬觉得是这样。他既不知道，也没有兴趣去打听“卡西奥佩娅”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女儿常常很晚回家这件事的，他也没有想到重新谈谈，或者至少考虑一下跟莉莉未来的关系。在这对他来说最幸福和无忧无虑的时候，如果莉莉向他提出结婚的话，那么他无论如何是不会反对的。可是莉莉与大多数结义姐妹所不同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大概是出于客气吧，等待他提出来。可是，他给她讲天体星座的传说，讲述数学深入到未知世界、准确地揭示关于世界的真实情况的可能性，只是没有觉察到她的心事，但不是故意让她生气。

有一次他翻东西时，偶然发现了烧炭女工的那件大金首饰，这是不久前他毕业时，父亲送给他的。他把这件金首饰拿到金银匠那里，用这定做了订婚戒指，在反面刻上了他的名字。

六月里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俩去郊外散步，走到了葡萄园那里，登上葡萄园旁边一个山包上。尤利扬拉着莉莉的左手，吻了一下，将自己的金戒指戴在了她的中指上，莉莉惊讶得差点儿倒下去，接着便扑在他的脖子上，吻着他，同时流下了幸福的热泪，一直重复着同一句话：“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最后，她平静下来，把戒指藏在

怀里，幸福地叹了口气，盼望尤利扬最后说说那个“问题”。

可是，尤利扬没有对她说那个“问题”，他告诉莉莉，说想把黄道带星座指给她看——在这座小山的圆峰上最好观察它。

“看见南方地平线上那个有点歪的四角形没有？”尤利扬指给她看，“这是室女星座。司丰收的女神得墨忒耳①的女儿佩尔塞福涅②被冥王哈得斯③强行霸占为妻，被激怒的得墨忒耳用没完没了的干旱来惩罚大地，果园干裂了，草枯焦了，庄稼地发黑了，于是闹起了饥荒。为了使人类免遭损失，宙斯④命令哈得斯在春、夏、秋季将佩尔塞福涅送回她母亲那里，而冬季将她带在自己身边。所以，春季得墨忒耳给大地送鲜花，夏季送粮食，秋季送葡萄和水果。到了冬季，当佩尔塞福涅跟哈得斯睡在一起时，得墨忒耳只给地上送来寒冷的暴风雪……你喜欢这个传说吗？”他问她。

“好极啦！”莉莉回答说，但没有象以前一样微笑。

下山时，她滑了一下，摔倒了，扭伤了腰。

---

① 得墨忒耳，古希腊神话中的谷物女神，耕作业的保护神。

② 佩尔塞福涅，古希腊神话中的谷物女神和冥后。

③ 哈得斯，古希腊神话中冥土的王，死者王国之神。

④ 宙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主神。

尤利扬几乎是用手抱着她进城的。

莉莉在市立医院躺了两个星期。出院时，走路有点弯腰，柱着拐杖。尤利扬没等到她康复，就拿到了毕业证书，急急忙忙去了戈尔诺里亚霍沃，因为他母亲病了，要求尽快见他。

一个月后，他回H城收拾行李。莉莉脸色很好，但走起路来继续弯着腰，柱着拐杖，甚至右腿有点伸不开。她这副样子使尤利扬产生了矛盾的感觉，他心慌意乱地站了好长一段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他为见到她而高兴，怜悯她，他吃惊地发现：自己从前的那种爱以闪电般的速度在他心里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另一种缺乏激情和充满病态的同情的爱。他觉得喉咙里有一团滚烫的东西，眼睛里刺痒地痛。虽然他在某些方面超出了自己的年龄，但他毕竟还不满二十岁。

而她虽然小，但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所以一下子就觉察出了他的感情波涛中的变化。她脸色惨白，脸上仿佛覆盖了一层浓密的阴影，眼睛里失去了天蓝色的光泽，而额头上直冒冷汗。

“不要为我浪费时间了！”莉莉说。“去收拾行李吧！我很乐意帮助你，可是你不是看见了吗，”她那圆润的小嘴唇撇歪了，“我帮不了你什么大忙，只会妨碍你！”

尤利扬告诉她，要去就得跟他一起去，否则哪里也不要去。而她仿佛害怕中暑似的，接受了

他的劝告。一路上，他见她十分艰难地行走时，至少一百次诅咒自己不该要她来玩。他们走到宿舍后，一种失望的情绪包围着他，因为他已无力掩饰自己了。他给她搬来一把椅子，在她背后垫了一个枕头，使她舒服些，象个犯人似的坐在她身旁，把自己的手放在她的手上，温柔地抚摩着。

他的床就在他们眼前，他们常常在上面胡闹。现在他俩都竭力不去看它。

"一结束升学考试，我马上就来看你。"他对她说。

她沉默地摇摇头。

"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我就来你这里。"他继续说。

她微笑着，但什么也没有说。然后，她突然一下抓住他的手，把它紧紧地按在自己胸脯上，闭上眼睛。

"莉莉！"尤利扬颤抖了一下。

"别吱声，别吱声！"她低声说，一直把他的手按在自己的胸脯上，"让我们沉默一会儿吧！"

他们沉默了好一会儿。

然后莉莉站起身来，拿起了拐杖。

"我要去医院挂号。"她说，以鼓励的表情朝他笑笑："弯弯身子，让我亲亲你的额头！"

尤利扬弯下腰，她在额头上亲了亲他。

他试图拥抱她，但她将他推开了。

“为什么？”尤利扬问。

“记住我的好的方面吧！”莉莉为难地回答说，装出一副撒娇的样子，但这已经与她一点也不相称了。

尤利扬等到她的拐杖声消失后，就跪在床前，把胳膊肘靠在床边上，突然间他的心灵感到极其空虚，仿佛刮起了一阵狂风，就象他们在山包上观察室女星座时刮的风一样，把他生活中的一切欢乐吹走了。他问自己对莉莉的不幸有什么错，他一步步地思索他们一起走过的道路，他并没有做过违背她的意愿的任何事情，恰恰相反——听从她的一切要求，他们象在父亲的屋檐下筑巢的燕子一样，安然地生活……事实上，他只有一种错误——当她在他前面跑，一直喊着要他追赶她时，他没有用手拽住她。

然后，他站起身来，开始整理书籍。他很快就要走了。

作者提醒读者：直至十七年后，人们才在H城重见到他。

作 者 的 话

在小客栈前店老板桑多大叔交给普罗丹·普罗托波波夫(《算法》杂志的编辑)一堆书，这是尤利扬在新年除夕突然离开他的别墅时没有随身带走的。在交给普罗托波波夫的这堆书中，作者发现了两个写满了札记的笔记本，一部分是按日期记下的，而另一部则是乱记的。

两个笔记本中包括了与事件有关的札记，读者从第三者的讲述和作者的描写中，已经了解到其中的一些事情。一本笔记本题为《索非亚札记》，而另一本为《十七年后在H城》。从这两本笔记本中，作者公布了那些跟尤利扬的命运有直接关系或者能揭示他性格中这种或那种特征的材料。

笔记本中还包括许多不同类型的材料，如技术、天文学、写文章和讲演计划、对熟人的评语等等。作者认为没有必要让这些材料问世，尽管作者承认从这些材料中也能或多或少地看出尤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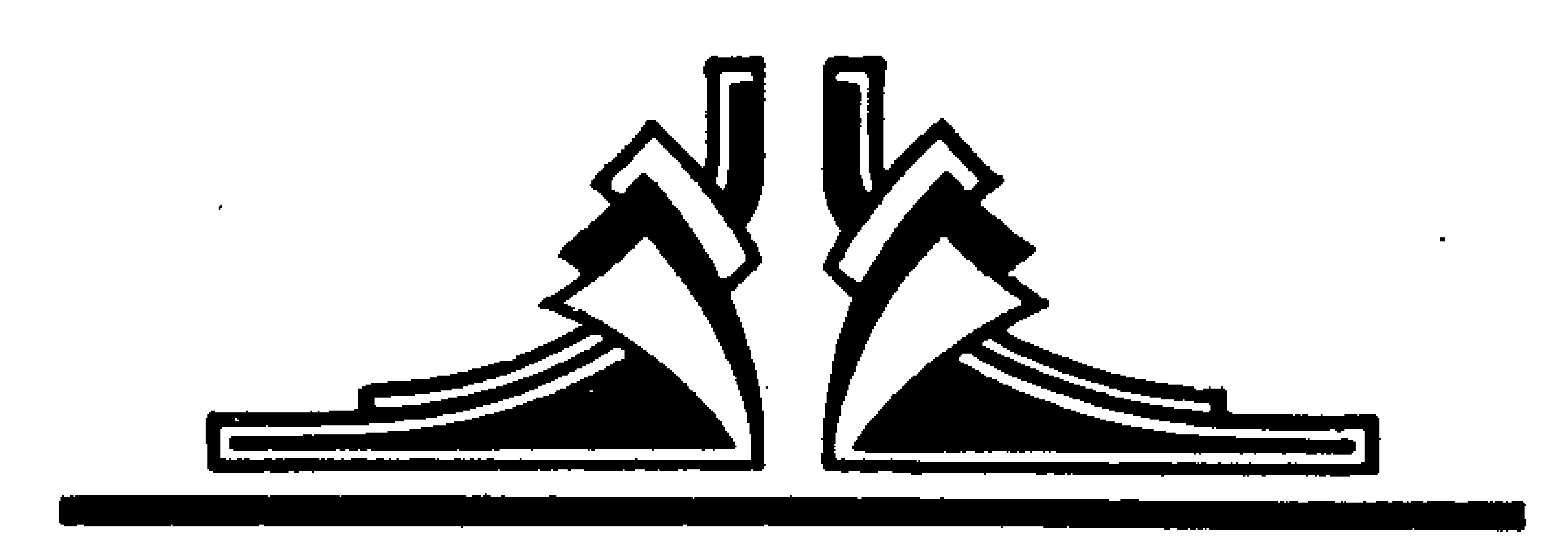
扬的为人。

为了保密——保密是尤利扬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读者一定会发现他用希腊字母来表示一些读者已经熟悉的女人的名字。作者恢复了这些被虚化了的女人的名字。这样，希腊文字母“M”和“Л”就相应地变成了Мая①和лили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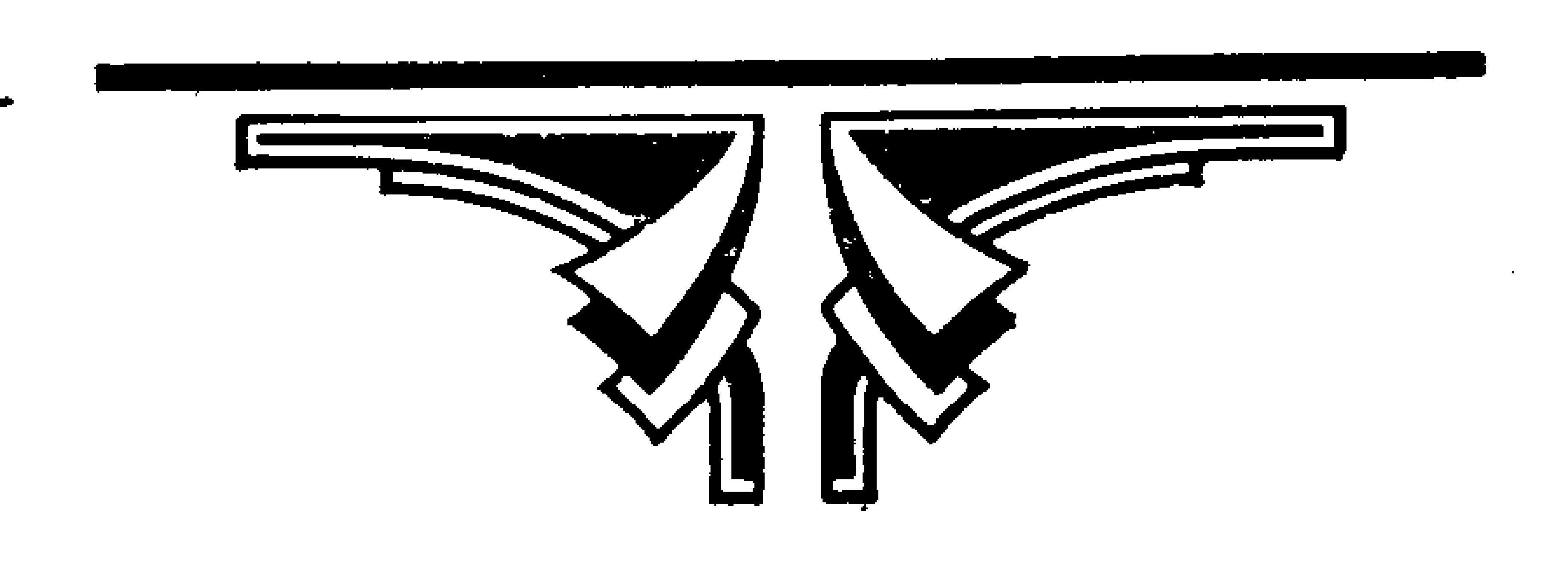
尤利扬写日记时，有什么笔就用什么笔写——圆珠笔、铅笔和钢笔。不仅如此，他在所有的札记中都是乱涂乱画，画了许多鸟、鱼和几何图案装饰。第二本《十七年后在H城》最后写得更加潦草，一些抽象的、极其复杂的几何构图，占了重要位子。

作者客观地公布尤利扬札记中那些适合公布的部分，不作任何评论。

① Мая即玛娅。
② лили即莉莉。



尤利扬札记摘抄



一　索非亚札记

启程前两小时：
特里方·瓦西尔乔夫

去H站前两小时（我已经定好了车），市委来人通知我，说瓦西尔乔夫同志吩咐他马上把我带到他那里去。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我最不愿见瓦西尔乔夫，本想把他派来的那个人赶走，可是他身强力壮，看得出他不是那种好对付的人，而是百分之百地执行上级命令的人。我心里咒骂他，但没有说什么就上了他那辆摇摇晃晃的吉普车。

特里方大叔用平常那句"小伙子，怎么样"来迎接我，但从他脸上看不出特别兴奋的表情。他点头示意让我坐下，点燃一支烟，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

“要不是你在学习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望着燃烧的烟头，开始说，“我未必会让你坐在这张贵宾坐的沙发上。”他又沉默起来，好象故意将几个有毒的烟团喷到我的脸上，然后递给我一个封上了的信封。

“这里有一封给我儿子鲁西的信，”他说，“他的固定地址是索非亚饭店，他在那里任经理，信封上写明了。你把这封信交给他，而且一到索非亚就交给他。”

我把信夹在日记本里，点了点头。特里方大叔大概发现我听他说话时心不在焉，所以拉大嗓门说：

“马上就交给他，明白了吗？从车站直接去那里，去饭店找他！不要磨磨蹭蹭，听见了吗……”他大概想说“坏蛋”或者类似的话，但只用头威胁了我一下，没有再说什么。

抑制住对我这副样子的忿怒后，特里方大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重又皱起眉头看着我。

“特里方大叔，请放心吧！”我使劲朝他笑了笑，“既然信很急，我立即就给他送去！”

“这与我不相干，可跟你倒有关系！”特里方大叔说，不过他的气已经消了一半，“因为这封信里有如何安置你的建议。不久以前，你父亲来时，我与他考虑过你的安置问题，可是哪里会想到……你不用担心，关于你那件下流事，我对他

一字未提！”

“谢谢您，特里方大叔！”我说。

他不言不语地看了我几分钟，脸上严肃地绷得紧紧的线条慢慢松弛了。

“我问过医院的大夫。”他低声说，又掏出了香烟，接着沉默了一下，耸耸肩，点燃了香烟。

“那么，医生是怎么说的？”我问。

“到目前为止，没有多大希望！”特里方大叔说，“将来会怎么样，他们也说不准，伤了指挥肌肉的神经，总之病情很复杂。这孩子的命真苦！”

“是的，非常可怜！”我叹了一口气。

特里方大叔从位子上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然后站在我身边，把一只沉重的手放在我的肩上。

“我给你说说我的想法。要做个正正当当的男子汉！处事要谨慎，待人态度要和蔼，但不要重犯错误，假如你让她在心里还存在一线希望的话，那就更可怕了。你决不会再回到她的身旁，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所以不要要滑头骗她！与其说你每时给她送一勺苦药，不如她自己一口喝下去！”

我站起来，象个“男子汉”似的朝他微笑着，给他伸出了告别的手。

鲁西·特里方诺夫

·瓦西尔乔夫

他大约比我大八岁。我上中学一年级时，他在高等经济学院二年级学习。我觉得跟他那看上去总是沉思和有点愁眉不展的父亲相比，他性格活泼。假期里，他回来住几天，见我伏案沉思——事实上我是在考虑各种目录和参考指南——时，他开玩笑扭扭我的耳朵，乐呵呵地微笑着，象个大哥哥一样真诚地开导我："朋友，不要老是啃这些干面包！男人天生就有的睾丸会枯竭的，自然界借助于它，使男人成为自己的佼佼者和希望。此外，对男人来说，天生的最伟大的欢乐就在其中！譬如大卫国王①在老年还跟两个十六岁的姑娘睡觉，一个睡在他左边，另一个在右边。晚上一翻身，尽管他年纪已大，但重又成了青年。嗯，当然是大概情况，但毕竟有这么回事。你可能会问：怎么这样？是呀，朋友，因为他青年时代不象你死啃书本到半夜，而是过着正常的青年人的生活。到了老年，也坚持合乎卫生的制度：喜欢喝麝香葡萄酒，爱吃羊肉，爱好用骰子赌博玩。

① 大卫，公元前11世纪末～前约950年以色列犹太国国王。

小兄弟，那是什么骰子呀？当时不是用骨头做的骰子玩，而是用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把她们前后推来推去，每个人根据灵活和熟练程度取决胜负。所以有英雄气概，象你这样的小伙子，用一个投石器就可以给巨人一点厉害瞧瞧！……可是你呢？我敢打赌，假如你一直这样下去，那么有朝一日你就会象预言家达纳伊拉一样——瘦得那样厉害，连狮子都不愿意吃他……”。

后来我才得知，这些圣经故事是一个中年女人教他的，她是个寡妇，他上大学时，是她家的房客。

现在，我见鲁西庄重地坐在一把扶手结实、靠背雕花的精制椅子上，他穿着时髦的瓦灰色制服，咳呀，对他这个年龄来说太胖了，头上秃得厉害，头顶透亮，额头上方稀稀拉拉的头发梳着分头。他朝我伸出手来，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所以我觉得必须以同种程度的客气回敬他。

“鲁西兄，你怎么秃顶得这么厉害！”我说，“而且你也太胖了！”

但他没有因我的话而生气，而是温和地笑了起来。

“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小伙子！”他说，“这是职业病！我的职业跟菜肴和女人连在一起。因为你年轻，我要告诉你，好让你知道：上等的菜肴会使人迅速发胖，而象我一样长着淡褐色头发的

男人同样会由于过多接触女人而很快秃顶。”

他把信放在桌上，但开信之前，取出一包精制香烟让我抽，是美国烟。

“谢谢！”我热情地点点头，“我不吸这种大麻叶”。

“大麻叶！”鲁西怜悯地看看我。“你哪里见过大麻叶！”他好象有点生气.“有一回，我给一个人双倍过滤嘴的‘万宝路’，而他却递给我保加利亚香烟，这个人连抽的是烟叶还是三叶草都分不清！”不过他的怒气很快就过去了，接着温和地笑了起来：“真是土包子，戈尔诺里亚霍沃人仿佛没有见过世面，而是一副鞑靼人和塔斯马尼亚人的心理状态！前天，我给一位颇有名气的老乡——一个老单身汉，送去一个芭蕾舞女演员，漂亮极了，象一朵散发着巴黎香水味儿的鲜花，在‘吉卜赛杂技团’表演节目。简单地说，真是个第一流的女人。第二天我的同乡对我说：‘谢谢，老兄，我更喜欢女门房，她更好一些！’哈哈！哈！”鲁西打心眼里笑了起来，“后来我见过这个女门房，她大约四十多岁，个子很矮，屁股翘起，散发出小葱炒肉的气味！”他的脸上掠过失望的阴影，但几秒钟以后，阴影消散了，他友好地朝我笑了笑：“朋友，你是另一种面团揉成的。你们埃夫蒂莫夫家祖祖辈辈都是好人。你祖父埃夫蒂姆原来是个牧师，后来屠宰牲口，到了老年爱上一个戈尔

诺里亚霍沃的女骑士。那个非常勇敢的女人去世后，他陷入了沉思和回忆之中，把财产献给了学校，自己去养蜂度日。他把蜂箱安置在女骑手常鸣枪、以表示她快到村里的那个地方。……你大概就是成了大工程师后，还会抽这种破烟的；不过，到时候你一定要让女秘书穿超短裙，而节假日跟演《天鹅湖》的芭蕾舞演员睡觉。你会成为这种人的，朋友，因为自家人总是自家人，所以你现在对我的'万宝路'的烟味皱眉头时，我根本不在乎。各种事物到时候自然会出现的，我的小伙子……"

他读完父亲的信后，皱着眉头，若有所思地坐了一会儿，然后问我行李放在哪里。我告诉他行李放在门房那里，难受得直冒汗，我的箱子和提包很破旧，跟饭店服务台周围的豪华陈设很不相称。

"我该走了！"我说，"要迟到了！"我从椅子上拿起鸭舌帽。

"你不会迟到的，因为没有任何人等你。"鲁西说。

没有任何人等我，这倒是真的，但我毕竟还是可以找到个把熟人的，那就是重工业部副部长迪尼奥·迪诺夫斯基的司机。迪尼奥·迪诺夫斯基是戈尔诺里亚霍沃下村人，同我父亲一起打过游击，而他的司机拉什科是戈尔诺里亚霍沃上村

人，他上小学时，我父亲教过他。

我向鲁西解释了一下，而他怜悯地和遗憾地望着我。我不喜欢别人这样看我，所以便朝门口走去。

“给我站住！”鲁西在我后面喊，“真无聊，亏你想得出来！我了解这个戈尔诺里亚霍沃司机，他的家乱七八糟，两间房挤着七口人，祖母睡在厨房里，祖父睡会客室，他们让你睡哪里？而且还不仅仅是安一张床的问题。”

“我去找个便宜的旅馆，”我说，“我还有点钱。考完后，就住进大学生宿舍，事情还不至于这样惨吧！”我勉强笑笑。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鲁西说，“我了解你们埃夫蒂莫夫一家人，你们都很固执，高傲自负，你父亲因合作化而受处分时，就是不肯作自我批评。”

“他做得对！”我说。

“我不是说他对不对，而是说他的性格。你们一家人都有点驴脾气，而有时候纯粹做傻事。你瞧，迪尼奥·迪诺夫斯基去莫斯科学理工，而你父亲却放弃了，他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好象没有别人来干似的。”

“对不起，鲁西兄，”我说，“要是你继续谈论这个话题，那我们准会吵架的。”

我见他的眉头皱了一下，并瞥了我一眼，但

他克制住了，没有回答我的挑战。

“你尽瞎说，算了吧！”他摆了摆手，“你真是土里土气的，好象那些便宜旅馆就专等你去似的！”他把胳膊肘靠在写字台上，朝前伸了伸腰，又问：“你把行李放在哪里？”

“在门房那里！”我说。我又难受得心里发热。

鲁西按了一下送话器的开关，以领导的口吻命令说：

“把那个小伙子放在你们那里的行李送来！”这个人是怎么想的呢？就是住中等旅馆，我的钱也不够呀，还谈得上住高级饭店吗？

“我不同意你以我的名义下命令！”我说，“我不喜欢这样做。”

“瞧你！”鲁西说，“又是‘不喜欢’！”

我坚决地朝门口走去，但就在这时门开了，身着制服的门房问上司：

“请吩咐把行李放哪里？”

“放在走廊里吧！”鲁西用头指了一下。

门房恭恭敬敬地说了一声“是”，就出去了。

“你搞什么名堂？”这一次我没有说“鲁西兄”，而把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挑衅地望着他。假如他不是我父亲最好的朋友的儿子的话，我不知道会对他说些什么。

是他的举止使我感到委屈，还是只使我生气——这我不知道，大概这两种情感都在我的脑海

里发作了吧，所以我觉得自己象个遇上红灯站在十字路口的人。

“饭店里，”鲁西又开口了，他伸开两条腿，胳膊肘靠在椅子结实的扶手上，“饭店里有十二间阁楼，是供日常用的。我们在那里存放床单、桌布、地毯、长条台布等东西，有一间，而且是最大的一间空着。实际上布置好了家具，因为有床、桌子，甚至还有长沙发，它是阁楼式的小房间，对你挺合适。既然你鲁西兄说合适，那就这样定了！”

“不能‘定’！”我说，“我付不起房钱，尽管是‘阁楼’。”

“冬天还有暖气，随时都有凉水和热水，总之什么都有，饭店嘛就是这样，你就放心地住下，研究你的积分吧。你也可以带女友来，至于服务台的‘阿姨们’，你从她们中物色一个，随时都可以叫来。我说是‘阿姨们’，但她们中间也有很年轻的，二十多岁。上午，她们来阁楼收拾东西，有时会走错房间，有人会错进你的房间的！那就有好戏了，是不是？而你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决不会把她们赶出去，很好嘛！哈——哈——哈——！是的，不要斜着眼睛看我，我的小伙子，放心吧，我不会揭你的短处的！我了解埃夫蒂莫夫家里人的脾气，我记住了我父亲的话：不要对他们耍滑头，不要损害他们的自尊心。”他

看了看自己的手表，“简单地说，房费相当于数学教授上辅导课所得的钱。事情再简单不过了——经理的小女儿今年毕业，你得帮她补习数学，多好啊！”

他信口乱说，而我一面听，一面在心里掂量着一切，一两个法码不够我使了。

“从各方面来看，这个主意不错，鲁西兄，我谢谢你。开始时，我以为你开玩笑，所以我生气了，当然罗，关于阿姨大姐之类的话，我就当作男人爱说的笑话吧。谢谢你出的主意，不过，我不能接受。”

“那是为什么？”这一次鲁西开始用真正燃烧着火焰似的眼睛看着我，“你还想要什么？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还不是教授！”我说，“我上一堂辅导课比教授低两块钱……我无法抵销这间房子的租金，很遗憾。”

“你看，真没有想到，真没有想到！”鲁西两手一拍。

我很快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多么好的机会，所以我也感到很难受。

“没有办法！”我摊开两手，“给中学毕业生和考大学的学生补习功课的收费标准有明文规定，我不能不顾一切地违反规定。”

而鲁西继续表示惊讶：

“你瞧，真没有想到，真没有想到！啧——啧——啧！”

这种啧啧声使我烦了，我便伸出手去，准备告别。

“那你就给那姑娘多讲半个小时呗！”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这么简单的事情你怎么就想不到！亏你还是个数学爱好者！咳呀！这还不明白吗？哈——哈——哈！”

“可是，假如姑娘的父亲，不同意增加半小时呢？”

他以那种蔑视的眼光看着我，我差一点儿拿着行李，气呼呼地闯进开来的电梯！

机器与星星

从我开始记忆的时候起，我父亲就认为我将会当“工程师”。我把这个词打上了引号，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赋予这个词愈来愈广泛的含义，仿佛这位“未来的工程师”除造机器外，还会为社会制造许许多多更重要的东西似的。我父亲是用他那个时代的精神范畴来进行思考的，而这些范畴提高了某些词和概念的身价，从转义上使用譬如“教师”、“锻工”及其他类似的词，听起来它们仿佛象征着伟大事物。而现在则把同样的象征当作停止流通的货币看待。

对于这些引起象征性的和浪漫的想象的词（工程师、教师、锻工等等），我是站在教师伊万一边的。他被那些自称遵守教规的人撤掉了当地第一个合作社的主席职务；我也站在自己的爷爷埃夫蒂姆牧师一边，他敢于焚烧十字架，以示不同意神意裁判。我还想，假如真有上帝的话，那么我一定每逢星期日给它点一支大蜡烛，求它别让我忘记我是在戈尔诺里亚霍沃的旧学校受的启蒙教育。

关于工程学，毫无争议，工程学使数学产生效力，而产生效力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其次，我爱沉思默想，乍看起来，它跟效力相对立，但这是误解。我们时代充满了误解，这是由两类有罪的人引起的——语法专家和民俗专家。每一个会自己提上短裤的人都想为“什么是保加利亚语”和“什么是保加利亚人的心态”出主意。对于这些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尽管我不是文学家。我所说的“沉思默想”，不是那种引起“哎呀”的感叹和使眼睛里流出动人的泪水——某些抒情诗人还在描写它——的情感。当然罗，我不反对多愁善感的沉思默想，没有它还不行，它象热恋中的姑娘的小桌子上芳香扑鼻的石竹花一样，譬如说莉莉桌上的吧。但我想说的不是石竹花，我想说的是小伙子象女人一样留长发，穿着长裤子的姑娘们象男人一样坐着，这样一些不一般的事情。我

想说的是这样一些事情，譬如宇宙中最后一条银河的发现，这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或者类星体这种神秘的闷葫芦，抑或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方程式；它能揭开被诗人称之为“爱情”的人们之间奇怪的引力的秘密。我指的是无愧于人类的那种沉思默想；表面上是消极观察，而实际上是对相对天体力学进行复杂探索的开始，是为认识真理而进行的严肃的战斗。

所以我认为在学习工程学的同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学习物理。当我想到观察天体时，会象一个面对一本用他不懂的文字写的名著的人，那样感到可耻时，我就浑身直冒冷汗。办法只有一个——同时学习工程学和物理学，即使以函授方式学习物理数学也罢。这个决定好极了，只要规章制度允许就行，可规章制度一般来说，对好的事情不予理睬。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一切带有美的印记的东西，都不是规章制度和决议的对象，决议把日程规定得死死的，将其中的节日都用红墨水仔细划出来了。

迪尼奥·迪诺夫斯基副部长

他脸色温和，身体肥胖，大腹便便。从穿着上看象位首长，黑西服，深色领带。我开始注意到，大首长都不喜欢(象是故意的)浅颜色料子和

鲜艳的领带。

他对我除了机械工程学，还想学物理数学的愿望，惊讶得张大了嘴，仿佛我是直接从火星上掉下来的一样。

"迪诺夫斯基同志，什么事给您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我问他，同时为他那副表情而吃惊。

"当年你父亲放弃了学习工程学的机会，本来要派他去莫斯科，而你却想同时学习两门科学。"

我了解父亲为什么没有去莫斯科学习和迪尼奥·迪诺夫斯基如何给他带来了不幸，热血一下子冲到了我的脸上，但我克制住了。"我会回敬你的，"我心里想，"只是现在你得安排我进函授班学习物理！"

迪尼奥看出了我的激动，所以他微笑着，满意地捻着自己花白的胡子。

"好极啦！好极啦！我们的青年人精神上的成长一年赛过十年！资本主义社会哪里会有这种情况？"

关于进函授班学习，他满口答应替我在教育部长面前说情。

我报考机械工程学的升学考试取得了优秀成绩，这一突出的成绩进一步动摇了部长已被迪尼奥·迪诺夫斯基的顽强规劝而有所松动的固执劲，最后，终于允许我同时报考物理。

后来，我得知考试成绩并未起任何作用，倒

是他特别需要的物质解决了问题。他要盖一座两层楼的别墅，花园里要砌华丽的游泳池。那时很难买到水泥(水泥都被修水库用了)，所以迪尼奥大叔——工业方面的大头头，帮他解决了一部分。

联系到这件事，我想起了下面的事情：

当有人为了听贝多芬的音乐，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得门票时，众神灵（上帝、耶和华、佛和其他神灵）肯定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会记他的过的。

神灵都爱记仇，这众所周知，但我从它们身上也发现了一个讨人喜欢的特征，为此应当赞扬它们——对于被自己保护的人，它们有一种绝妙的幽默感。迪尼奥大叔对我说，他头一眼就喜欢我，自家人总是自家人嘛，他跟我父亲一起上过学，打过游击，如此等等。他心肠软了下来，邀请我星期日去他家吃午饭。

“来我们家玩的都是最好的人！”他说。

我谢谢他的邀请，但当我转过身去要走时，他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事。

“等一下！”他在我后面喊道，“你是不是团员？”

“当然是！”我说。

“没有受过什么处分吧？”

“我象天使一样纯洁！”我打心里笑了起来。

“好，你将是我亲爱的客人！”他说。

女　学　生

我以前常常来索非亚买书和各种指南，但一般只呆一天，最多两天。坦率地说，我喜欢首都的生活，当然不会象小羊遇上火车那样惊讶，我也不会昧着良心不承认索非亚大部分东西令我喜欢。现在，当我在这里呆了较长时间而没有急着去赶火车后，我渐渐发现情况比我以前想象的要复杂多了。对不少我已经有固定看法的事情，我重新进行了评价和考虑，而且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它们，而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因为生活使我跟它们发生了冲突。这样，我便一天天地写下了自己对世界的宝贵看法。

我的女学生以目空一切和高傲自负的小主人神态出现了。她那时髦的用蓝料子——大概是进口货——做的西服裙，刚刚够着膝盖。她的短衫雪白，领子卷起，动人地敞开着，以显示她那已经鼓起的胸部的弧形线条。总的来说，她有一张惹人喜欢的脸，朝气勃勃，嘴唇红得象樱桃，下巴圆圆的。她高个子，腰很细，臀部象运动员。当然可以说她是个美人，还可以说她脸上流露出有文化修养的样子。但她的眼睛很放肆，我要直截了当地说——简直横蛮无理，它简直象在说："我什么也不怕！"我为这双栗色大眼睛而发愁。

"你叫什么名字?"我想都没有想，就对她使用"你"的称呼。

"达琳卡。"她回答说。

"名字不错！是由'达尔'①而来的。"

"嗯，是呀!"她说，"那你呢?"

"尤利扬。"

"有点俗，不过没有关系，我喜欢。"

"谢谢!"我说。

她双手拉着裙子，行了个请安礼。

"要让数学来浪费你的一生吗？达琳切?"

我应当对她说"达琳诺"，而不是"达琳切"②，那样事情就可能按另一种方式发展了。我错了。

"数学真可恶!"她大声说，"你是数学教员吗?"

"懂一点!"

"你也可能是个大数学家吧，但不象别人那样冷漠无情。我甚至觉得你可爱!"

"我很高兴。"我耸了耸肩。

"爸爸说，你会教我一些最重要的方法，让我通过中学毕业考试。"

"我会给你讲的!"我说。

"你保证教我学会这些方法吗?"

---

① 保加利亚语中"达琳卡"和"达尔"属于同一词根，含有"礼物、天才"之意。

② "达琳诺"是呼格，"达琳切"是爱称。

“主要取决于你。”我说。

“啊！”她那美丽的樱桃小嘴乐开了花，“你真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人！这种事你就相信我吧！”

“好极啦！”我说，并颤抖了一下，与其说是由于她那语意双关的话，不如说是由她的笑引起的。所以我补充了一句：“希望你成为一个好学生。”

“放心吧！”她以温和但却是赤裸裸的庸俗的目光望着我，“我会使你满意的！”接着大笑起来。

她的笑声象热浪一样冲击着我。我点燃了一支烟，以打发时间，并拿起了铅笔。就身材而论，她象莉莉，但莉莉的眼睛里有月亮、星星和天空，而这位的眼睛空荡荡的，有时还露出调皮和好惹事的神情。我有一种感觉，假如我搂住她的腰的话，她决不会反对我的。我还觉得这一切都极其容易办到，只要我伸伸手就行了，如此而已。世界仿佛变粘了，变香了，铅笔刀从我手里滑了下去。我弯下腰去拾刀片，她的大腿正好映入我的眼帘。

我直起腰来，觉得失去了控制力。但恰好在这时，我遇上了她的眼睛——那样不知羞耻的顺从的目光，我仿佛不是被浇了一盆，而是被浇了一大桶凉水似的。我一下子感到非常不好意思。

“让我们开始吧！”我说，并首先在桌旁的椅子上坐下来，“写吧！”

她没有掌握最基本的东西：错误地解开括弧，

开方时出现最简单的错误，总之……算出这道最简单的方程式，差不多用了一小时。在这段时间里，她把自己的大腿紧紧地靠在我的腿上，故意耸着肩，领口开得更大了，好让我能看见她的胸脯，什么都瞧得见；她的头发拂扫着我的耳朵，她呼出的气息拂到我的脸上。老实地说，我的血液里发疯的马群开始奔跑起来。这时，她怎么也解不开那道二次方程式，最后把铅笔一扔，苦恼地叹了一口气，把头耷拉在我的肩上。

“让我们休息一会儿吧？”她请求说，“行吗？”

“休息吧！”我表示同意。

我象从井里打水上来似的，费了好大的劲，才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子跟前，象是摆脱了枷锁一样，伸了一下肩膀。血液直冲太阳穴，耳边巨浪在轰鸣，此时此刻，即使马拉松赛的世界冠军，也不见得比我更愉快。

她望着我，慢慢地等待着，仿佛不想站起来。这时，我粗暴地对她说：

“今天到此为止，你可以溜走了！”

“就学这么多吗？”

“就这么多！”

“嗯……”她站起来，慢慢地朝门口走去。因为我没有喊她回来，她从背后用和解的语气对我说：“老师，明天见！”

“再见！”

我这位学生一带上门，我便跑到池子旁边，打开凉水龙头，使劲地冲头。然后，我去找迪尼奥·迪诺夫斯基的司机。

“要去上司那里吗？”

“不，我是来找你的！”我说。

“找我？”这个善良的人，惊讶得瞪起了眼睛。我好几次跟上司一起坐过他的车，所以他特别尊敬我。“要送你去什么地方吗？”他以甘愿效劳的态度问。

“猜对了！”我说，“你带我去找住所，阁楼也好，地下室也好，都没有关系，我不是挑挑拣拣的人，主要是让我带着行李借住几天，这就是我要你帮的忙。”因为他怀疑地望着我，于是，我又给他鼓气：“迪尼奥大叔以后听说这件事后，我会给他说的，到时候迪尼奥大叔一定会很满意，肯定会因你有功而奖励你的。”

这位同乡沉默着，点了一支烟，若有所思地在走廊里来回踱着步，甚至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

“在奥夫恰古佩尔有一个木板棚。”他带着参加危险的地下工作者的那种表情，附在我耳旁低声说，“它是我们车队作仓库用的，不过，这一二年谁也没有去过那里了。下个五年计划将在这个地方盖集体宿舍。”

这个木板棚的一部分被隔成一间房，当时打

算让看仓库的人住，里面有炉子、木炕、桌子和两把椅子。

“要是你愿意的话……”这个好心人犹豫不定地说，“可以临时使用这间房子，不过你要知道……它不适合你这样的人住……跟你的身份不相称！”

“莫斯科饭店跟我身份相称，可是那里眼下没有空房间，所以你说的奥夫恰古佩尔那间木板房，真象从天而降的礼物！”

木 板 房

假如有完善的电子计算机，它能以公平的仪器坦率地评价谁怎样工作的话；假如有臆想出来的勤务部门（象童话世界里那样），它能根据计算机的评语给人安排住所的话，那么，我大概会住进肯定有木板地面的临时宿舍。可是在没有能进行这种选择的电子计算机时，我只好住土地板的木板房。而在冬季住土地板木板房，甚至连浪漫气氛也谈不上。

从昨天起，一直下着大雪。在我的中学时代老是这样下雪，从那时起严冬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雪静悄悄地下着，愈积愈厚，我住的地方离大路很远，周围的世界呈现一片白茫茫的景象。

木板房周围是一片广阔的草地。房子右边放了一堆木箱。这些木箱是装过平路机和其他重型机器的，假如不是木板太破的话，它们还会很有用处。我挥动斧子劈木板，雪花飘落在我的身上，我象置身于梳棉车间、全身缠满了棉花一样。

我望着那堆木箱，心里盘算着，大概够我烧十天的。当我上完课后或从图书馆回来时，已是晚上了，只有这时才烧。我点燃炉子，顶多驱散一下寒气，使屋子里有点生气罢了。

我想在天文台呆到晚一点，但我发现会妨碍专业工作者，他们会不高兴的。那天晚上，我观察红色巨物猎户星座，但看不见造父变星，有人温和地微笑着对我说："你拿着目镜在这里呆上六个月，哪儿也不要去，那一定会看到造父变星的。""谢谢！"我朝他点点头，"我一定利用您的经验！"

就在那天晚上，我回来晚了，步行回家，雨夹雪下个不停，凉飕飕的。当我到达"避难所"时，全身已经湿透了。我一面点炉子，一面觉得血液都凉透了，牙齿上下直打颤，我脑海里掠过一丝念头：我离开高级饭店里舒适而暖和的房间，是不是犯傻劲了？

我把炉子烧得很旺，膝盖以上都烤红了，全身象温泉一样散发着热气。我换下衣服，将湿衣

放在两把椅子上晾着，对那个为离开了高级饭店里舒适而暖和的房间而惋惜的人说："你是个混蛋！要知道与其靠娇生惯养的娼妇生活，不如在这间鬼木板房里冻死！"因为那人没有因我的话而发抖，于是我朝他大声喊了起来："你这蠢货！我爷爷是牧师，他为了真理而违背自己的信仰，焚烧了十字架；我也要经受住考验，维护自己的信仰！"我举起拳头，继续说："因为如果一个人丧失了人格，那他为了什么而活着？"这一回那人发抖了，不知是由于我这番话，还是我的拳头的关系，他溜走了。

当我钻进事先烤热了的被子里时，想起了我这是第二次说这种话或者类似的话。头一次是对特里方的儿子——高级饭店的商务经理说的。我离开他的饭店的阁楼，不是该给他打个招呼吗？

"那个小娼妇，"我对鲁西兄说："只要我做两件事：第一，要我教她通过中学毕业考试的方法；第二，要我跟她搞恋爱。"

"第二个要求很好嘛！"他咯咯笑了起来，抚摩着自己的圆下巴。"这样难得的机会，你就是找还找不到呢！跟一个十七岁的家伙搞恋爱，而且还是她主动送上门来的！"他想入非非地挥挥手，"真难相信！"

"鲁西兄，"我说，"你的条件是让我用补习数学课的钱来缴房租费，而不是用搞恋爱的办法！"

“就是说，条件已经好转了，傻瓜蛋，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鲁西兄，听我说，”我提高了嗓门，“第一，我不想当有报酬的情人；第二，我对娼妇不感兴趣，即使她只有十七岁也罢！”

他沉默了一会儿，同时凝视着我，仿佛是头一次见我似的。

“你是不想再被纠缠呢，还是故意装傻？”

我差点儿挥手打他一个耳光。不是我害怕，而是因为我突然感到，我心里产生了某种巨大的恻隐之心，仿佛此时此刻，有人告诉了我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似的。

“我来自外地。”我说，“是你父亲推荐我来的，可是，我大概找错了对象，请谅解！”

但这是已经过去了的事，甚至不值得去提它！炉子里欢快的火苗噼啪作响。这才是最重要的，等下一批废木箱运来时，也还会这样。

红色的火苗减弱了，黑暗吞噬了它们。莉莉的形象也这样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消失了。我意识到时间的急流，已冲掉了最宝贵的回忆，我竭力想在记忆中，保留所爱的人的特征；同时我知道，不管我如何讲良心，忘却是不可逆转的过程。

拉什科大叔

新年前三天的一天清晨，拉什科大叔来敲我的门。

“拉什科大叔，请进！”我请他进屋。

“我不会逼迫你，可是你收拾行李走吧！”

我沉默了一下，然后说：

“就是说……”我笑了一下，或者说至少是勉强笑了笑。可是，一种绝望的情绪象电流一样，穿透了我的全身：“现在去哪里？”

冬季住木板房，本来就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可是当你面临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的前景时，这就算是最大的幸福了。当然罗，所谓幸福就是当外面雪在纷飞、风在怒号时，你有东西遮住头顶罢了。

“我在两位老人家里，为你找到了象样的房子！”拉什科大叔说。他大概看出了我的不安，所以急忙给我解释，说事情并不象我想象的那么可怕。

“啊！谢谢！”我说，“尽管这里对我来说也并不怎么坏！此外，”我继续说，“我盼望在大学生宿舍里找到空位子！”

“等到有这种空位子时，任何东西也不会妨碍你去住的！”他笑了笑，并摇摇头说：“你们埃夫

蒂莫夫一家人都是怪人！哪怕落水，你们还会喊一切都好！”

也许他说得对，可是我没有时间考虑这个家族的特征，拉什科大叔想在接他的上司之前，把我的行李带走。

房间在顶楼上，但光线充足，朝鹰桥方向。它的主人，老头和老太太有一个儿子在利比亚当起重机司机，四年后才会回来。他们住隔壁房间，而白天几乎都在厨房里度过。他们不要求高租金，但坚持要房客为他们从市场买东西，——这是一座老式六层楼房，楼梯高而陡，要是他们每天爬上爬下的话，那很难说能否等到儿子回来。

“我会为你们效劳的！”我说，“你们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此外，”我补充说，“我喜欢去市场排队。”

这是真的，我乐意做一些与机器和量子力学，还有象猎户星座一样变化无常的造父变星无直接关系的事，不是因为机器、量子计算和造父变星使我讨厌，恰恰相反，恰恰相反！但当我听人说起葱、土豆和排队买肉时，我感觉到进入了生活，更接近现实——我一面排队，一面想：对人民来说，猎户星座问题不比肉和土豆更重要。我对自己说，对人民来说，需要更多的经济方面的优秀专家，而不是天文学方面的。我还暗自想到，

"假如我是国王"的话，在这方面，我将制定铁的制度。可是，如果你不去逛市场，就决不可能作出类似的决议。

我们从顶楼上下来后，拉什科大叔对我说：

"好啦，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你不会挨冻，我也不再担惊受怕了！"

"你担惊受怕？为什么？"我奇怪地问。

"这还不明白吗？"拉什科大叔摇摇头，"你想一想，要是迪诺夫斯基同志知道了你住木板房怎么办？他首先准会狠狠地扭我的耳朵，因为是我安排你住在这个不是人住的地方；其次，他会开除我，因为未经他允许，我就动用了部里的东西。"

"你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说，"完全是多余的！一旦泄露出去，我就发表声明，就说这个木板房是我自己发现的，是我撬门进来的！"

"嗯！"拉什科大叔耸了耸肩。

"我用自己家庭的名誉担保，我会发表这种声明的。"我对他说。

新 年 贺 词

去年新年除夕，我送莉莉一部《被诅咒的诗人》，其中有爱伦·坡① 的"致天堂中一女"那首

① 爱伦·坡(1809—1848)，美国作家、诗人。

诗。该诗是这样开头的：

你曾是我朝思暮想的欢乐，
你曾是我痛苦中的一切，
如同大洋中绿茵茵的小岛，
如同孤独中淙淙流过的小溪！
你曾是早春花丛中的殿堂，
这朵朵鲜花也曾为我开放！

我在书中写道："这朵朵鲜花将会为我开放！"——祝贺新年！

今天，我给莉莉寄去了一张贺年片：冬景。我在贺年片的反面写道："祝贺新年！祝你健康、顺利！"

这种贺词太平凡、太愚蠢了，可是我想不出别的来。

多么可耻！

记　　事

团委没有让我参加突击队，而派我去贝洛格拉德奇克，帮助清扫天文台。团委有两位女同志，我高兴得热烈地吻了她们一阵，她们知道我高兴的原因，所以没有生我的气。

二年级一开学，我遇上了一件痛苦的事——

我母亲去世了。我途经州城去戈尔诺里亚霍沃安葬母亲，无心拐到H城。

这年初，我在另一个地方报名学习音乐，我非常喜欢钢琴，所以决定在M教授那里补课。教授收费很高，为此我不得不去教数学。但钢琴补偿了一切！钢琴中仿佛集中了整个宇宙——从毕达哥拉斯①到爱因斯坦②！用诗歌的语言来说，就是钢琴是世界的缩影，宇宙的积分方程在这里展开了翅膀。

我的日子很艰苦，但熬过来了。我仍然去市场为老人买东西，有时甚至还同我的房东玩骨牌。当我发现这种简单的游戏使他多么开心时，我就咬着牙坐到桌旁。我原则上光输牌，而他在我每次“输”了之后，就象拿破仑③在莱比锡取得了伟大胜利后一样高兴……

结识维娜

机械学，天文学，钢琴，为准备报考大学的学生补习功课，去市场，参加青年团组织的反对

①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约前500年），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

② 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1880—1952），德国音乐学家。

③ 拿破仑（1769—1821），即拿破仑·波拿巴，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1804—1814）。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暴行的集会——这一切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可以说，忙得连领带上的别针也没有时间别，哪里还能写札记。但主要的负担不在于忙，而在于这些活动每天都必须准时到。生活中的意外事，象一种麻痹人的神经的瓦斯，作用于人的意识。

但是第四学年初，春天也来到了我的身边，尽管这时恰恰是阴沉沉的秋天，下起了晚秋大雨。发生了两件"非常"事件，我先讲第一件事。数学杂志上发表了我一篇论文，文中论述二阶线性微分方程式，在查明机械振动和电振动过程中的应用。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我被物理数学系系主任叫了去。著名的数学家德切夫教授，把我带到已经空了的教室里，给我指指黑板，要我给他讲讲利亚普诺夫①和拉普拉斯②定理和相关论元素方面我所知道的东西。

"从你的论文中可以看出，你了解今后即将要被人们掌握的材料。"他说，"甚至可以感觉出你想运用自己的研究方法的意图。现在我想看看你如何阐述自己的思想。"他薄薄的嘴唇上露出一丝狡猾得几乎看不出来，但同时又极其善良的微笑。"因为，"他继续说，"从一个人如何和用怎样的

① 利亚普诺夫(1857—1918)，俄国数学家、力学家。

② 拉普拉斯(1749—1827)，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

方法阐述自己的思想，就可以看得出，他是不是天生的数学家。开始吧！”

我便开始了，用公式讲述了我所知道的东西。当我解开相关系数时，他抬起手，低声说：“行啦，无需多讲了！”然后，他让我在椅子上坐下，而他自己却在黑板前来回踱着步。大约过了十分钟，他在讲台前停住脚步，他那薄薄的嘴唇上重又出现了与其说是真正的，不如说是带有某种暗示的笑，只是这一次的微笑只有温厚，而狡猾的意味消失了。

“你会有出息的！”他摇了摇花白的头，“罗马人说：‘从爪子可以看出一只鹰的好坏！’这话说得很对。真正的数学家更多的是思考，很少写在纸上，而业余爱好者正好相反………毕业后，你想干什么？听说你还念完了工程学？”

“是的。”我说，“念完了工程学。”

“要是你把物理和工程学结合起来的话，那你在实验物理学领域里，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工作者。这样，”他沉默了一下，“这样，过一些时候，你就可以当我的助教。我从自己方面可以作些努力，使你在十年之内获得学术职称和博士学位，也就是说可以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不付出代价，要通过正当的手续。”

“请您别这么说！”我说，“我与其通过‘第二种’方式获得博士学位，不如去当中学教员。”

"我完全相信!"他说,"真正的学者一般都是诚实人。我已经超过了退休年龄,如果有一个称职的人来接替我的话,那我非常高兴。"

"我朝他点点头说:

"谢谢!"

"嗯,没有什么!"他伸出手来,在我肩上拍了几下,"你在我手下干吧,我敢打保票,十年之内使你成为数学博士!你赞成吗?"

"赞成!"我笑了笑。

他朝我弯弯腰说:

"我已经听说了你的简历中的一些情况,我知道你是教师的儿子,作为H城中学的学生,曾在数学杂志上发表过一些东西。"

"那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我说。

"神圣的火花首先是从微不足道的东西中闪现出来的!"他说。沉思了一会儿后,他摇了摇头,指着门口说:"让我们走吧!你知道'维丁碰头会'在什么地方吗?不知道?我带你去。那家饭店很有名,我们数学家都去那里聚会,我想把你介绍给他们。我们去尝尝油炸鲑鱼,喝杯新葡萄酒。"他咳了起来,带点严厉的语调命令说:"走吧!"

"维丁碰头会"饭店里,数学家们有自己的专门桌子。我们在那里遇见了两位教授:伊万诺夫和赫里斯塔基耶夫。赫里斯塔基耶夫是"巨擘",是好几个科学院的名誉院士,已经七十多岁了。

这一伙人的水平很高，不过，我不觉得特别难堪。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尽管有德切夫的夸奖和赫里斯塔基耶夫的温和微笑，我的心上却笼罩了一层阴影。新葡萄酒没有给我带来快乐，赫里斯塔基耶夫的好感，也不使我觉得温暖。只有一种感觉安慰着我，那就是今天晚上我越出了常轨。

第二天，仿佛有某种奇怪的巧合，昨天晚上的情况又重演了，只不过是在工学院一位系主任那里。系主任基尔切夫教授(我跟他早就用“你”称呼)首先就数学杂志上的文章夸奖了我一番，然后挽着我的手，把我带到教室里，让我给他解答下面一道题：

> 在规定的操作制度下，一个工厂平均生产70%的优质产品。1000件产品中，优质产品的数量在652至760之间。请问概率是多少？

基尔切夫给我留下两张函数表，便到窗子旁边吸烟去了。

我大约用十二分钟解答了这道题，包括查函数表的时间。1000件产品中，优质产品的数量在652至760之间时，其概率为0.99945。这种类型的题都是用拉普拉斯的积分定理来解答的。

“在你这个年纪时，我解答类似的题也大约用十二三分钟。”基尔切夫微笑着，“现在解答起

来，至少也得用十五分钟罗！"他叹了一口气，"而爱因斯坦①和普朗克②大概二三分钟，就能把它吃掉！"

"这决不意味着我们的才能只比他们小三四倍！"我笑了起来。

"因为我们属于不同的智力世界！"他说，"对他们的世界来说，我们的度量衡不管用，更不能相提并论。"

然后，他问我毕业后想去哪里。

我耸了耸肩。

基尔切夫个子不高，头有点大得不成比例，额头上大得更不成比例。他秃顶很厉害，而一对栗色圆眼睛，由于某种调皮的本性，看上去总是一幅惊讶的样子。

"既然你不特别偏重某一方面，"他说，"我们愿意聘请你当高等代数教员，同时帮助你在短时期内，获得头三项学术职称。我们将通过谈判签订十年合同。"

我大笑起来，同一瞬间我又为自己的笑而深感遗憾。教授的圆眼睛鼓起来了，我仿佛觉得他的眼睛惊讶得要掉出来了。

"基尔切夫教授，请原谅！"我说，"请多原谅！

①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物理学家，生于德国，1933年因受纳粹政权迫害，迁居美国。

② 普朗克(1858—1947)，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学创始人。

你的规劝与索非亚大学德切夫教授的规劝之间，相似之处如此之多，乃至某些词都是一样的，仿佛你们背熟了同一堂课！”

“这说明我们都很关心你，你这忘恩负义的人！”基尔切夫教授说。听起来，他的声音里夹杂着遗憾和痛苦。

“请别用你们的关心来打扰我了！”我说，“假如一个受过双重教育的人，今天自己不能找到生活道路的话，那么国家为什么要为教育他而浪费钱呢？为什么他要在教室里的长椅子上白白地磨破自己的裤子呢？”

“因为我们想把你引上正道！”他气忿地说，“因为我们想让你少走点弯路，少犯点错误。丰富的知识决不等于处世秘诀。今后你会掌握处世秘诀的。”

“正路！”我说，“等一等，教授！根据你的说法，正路就是通往高等代数的讲台之路，这好是好，可是，你为什么忘了我学的是机械学，而选修的是微电子学呢？德切夫教授要我搞实验物理，而忘记了我专门学过天文学？你们说的正道是什么呢？”

“因为你在行政事务方面一窍不通，我告诉你，没有能把选修课和基础课都能结合起来的好事，正道就是搞一门学科！”

“基尔切夫教授！”我说，“如果这种结合不能

从定员表中去寻找的话，那我就努力从我自己身上去寻找！”

“嗯！”基尔切夫耸耸肩，“你应该为自己的话而感到可耻。你说起话来象个心不在焉的诗人，而不象个严肃的数学家！”

“教授，你知道吗，”我说，“近来我发现在数学、音乐和诗歌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重要的内在联系。难道你能否定，譬如：齐奥尔科夫斯基① 是一个具有诗人心的数学家吗？”

“谁要是脚踏两只船，那他会掉下去的；而要是脚踏三只船，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完蛋！”

“同时有三种力作用于同一个物体时，谁也不知道它会倒向哪个方向——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起作用的会是合力！”我笑了起来。

这样，跟两位教授发生的事，不是照耀在我头顶上的阳光。

有一次，一个五月的上午，课间休息时，我在走廊里散步，一个黑头发的漂亮姑娘来找我，她身材特别匀称，穿着黄绒线衫和货真价实的意大利天鹅绒牛仔裤。

“我叫维娜。”她对我说，“是您父亲的老朋友迪尼奥·迪诺夫斯基的女儿！”

---

① 齐奥尔科夫斯基(1857—1935)，苏联航空和火箭动力学及飞机和飞船理论方面的学者和发明家，现代宇航学的奠基者。

“哦!”我高声叹道，感到非常惊讶。

“您好象不相信，是不是?”她问。

“是呀!”我说，“简直难以相信，象您父亲那样极其平凡的人，能创造出象您这样完美无缺的产品!”

“请不要为偏见而付出代价!”她说，“这跟您不相称。此外，”她说，“我不是来听您如何议论我父亲的。”

“请原谅!”我说，“那么，您来有什么事吗?”

“请您参加学术报告会!”

“是吗?”我真诚地感到惊讶。

“《功能与技巧》——这就是题目。”

因为我没有吱声，正在考虑这个题目与这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她看出来了，给我解释说:“我是学建筑的，最后一学年。”

“啊!”我说，“我们有亲戚关系，太好了!”

“您去吗?”她问我。

“啊，是的!”我出自内心地说，“我很乐意去。不过有一个小小的条件——请您穿裙子，而不要穿长裤子。”

她也感到惊讶，她的脸甚至惊讶得绯红了。

“您不认为您这种微妙的要求超过了礼貌的限度吗?”

“是的，当然罗!”我说，“您说得很对，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当女人的屁股绷得紧紧时，裤子是

我的技巧感所绝对禁忌的！”

“真坦率！您这样说不感到害羞吗？”

“维娜！您知道吗？”我没有直接回答她，“女人的裤子对我来说象一杯酸得几乎变成了醋、无法下肚的葡萄酒！老实说，这种葡萄酒会把我变成小羊羔的！”

“真怪！”她耸耸肩，“如果您以为女人会被您的观点和情趣所感动，那您就大错特错了。现在和将来，女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爱好打扮，怎么舒服就怎么穿！”

你瞧，迪尼奥·迪诺夫斯基的女儿生气了，转入了进攻！太妙啦！

“唉，唉！”我说，“那你们除了相互亲吻和相互结婚外，不会有别的选择了！”

“假如您敢公开这样胡说，那么所有的女人都会恨您！”她说，脸上流露出遗憾的表情。

“维娜，别激动！”我说，“您把我的话当成真的了，我只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

“咳！”维娜不相信地说：“您开始假惺惺地鸣金收兵了，不过随便怎么着吧。无论如何，请您从脑子里去掉想教育女人如何穿着的想法！”

“零比一！”我说，“难道我指的不是女模型工人或《时装》杂志的艺术家吗？”

“假如不注意您那番关于女人的裤子的议论的话，您倒象个有文化修养的人。我要告诉您，

我们姑娘们对您的评价很高。”

“毛重每公斤给多少钱?”

“她们把您看成是数学系出色的学生,盼望听听你们数学系学生在建筑学的技巧方面有何高见,至于……您说的‘毛重’……话说回来,您不是对姑娘们不感兴趣吗?”

“穿裙子的除外!”我说。

下午,我去听了学术报告。我发言强调功能的重要性,但一定要与简单的精巧结合起来。

维娜·迪诺夫斯基是穿一件带细褶的裙子去的。

我邀她去公园散步,她高兴地表示同意。我们在小亭子里喝了杯白兰地,那天晚上天空晴朗,繁星密布,但这一次我不想仰望天空,仿佛没有星星似的。

维娜的故事①

我,迪尼奥·迪诺夫斯基,是重工业部副部长,职业是工程师。

我生于戈尔诺里亚霍沃下村,它与上村相

① 这个标题是作者虚构的,而内容是普罗托波波夫采访的真实记录,由作者记入尤利扬的两个练习本中。——编辑注。——原书注。

邻。我跟尤利扬的父亲一起念完了H城中学，同他是一个班，同坐一排凳上。正因为我们早就相识，所以当他的儿子尤利扬在机械工程学院和索非亚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我做事象个人样，帮他找房子。俗话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也搬起石头砸过自己的脚，因为当时我表现得很人道，然而正如老百姓所说的"活该倒霉。"

我本应当想到"什么藤结什么瓜"这条谚语。他父亲有极左倾向，达到狂热程度，所以曾受到撤职处分。农业合作化时，他违反了民主方法，不认真执行自愿的原则。不过，早在中学时期，他就好走极端。记得有一回，他把一个法西斯分子狠狠打了一顿，事先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团领导，好在法西斯分子没有马上跳出来报复我们，否则我们就要遭受损失，因为我们毫无防备。极左倾向从来就不会带来好的结果。搞集体化时，他痛斥合作化的敌人，在他们的大门上用红漆写上标语："这里住着富农——人民的敌人！"剥夺他们的国家供应，不卖给他们煤油和焦油。这种类型的斗争不是我们的道德本质上所具有的。有损于我们关于民主和人道主义的观点的名誉。我们应当坚持说服的方法，说服是我们的基本武器。其他则是红色恐怖，只有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所以，后来县委批判了他的错误，撤掉了他的主席职务。

尤利扬的父亲多么易受狂热病的影响，下面一件事也很有说服力。一九四六年，党决定派一批中学毕业的青年同志去苏联进修。H城市委看中了我和尤利扬的父亲。我原则上表示同意，因为我意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多么重要。我们应当培养自己的工程师、化学家、建筑学家及其他专家，不能指望资产阶级专家。可是尤利扬的父亲对这条简单的道理，却一窍不通。他找借口拒绝前往：你们发现了没有，当前合作化非常需要我。仿佛他是唯一能当主席的人，好象没有他地球就不转了似的……瞧，最后落了个什么结果：我回国当了工程师，而他却回到原来的位子，在戈尔诺里亚霍沃七年制学校当算术教员。是的，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个人来说，狂热病决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但我不是个爱记仇的人，何况历史对这些事已经作了结论。所以当尤利扬来找我，要我帮他进两个系学习时，我不惜劳力，做了当时最需要做的事，于是教育部长签了字。而且我还应当坦率地说，当时我很喜欢这小伙子——那样漂亮，有鼓舞力，渴望科学知识，而且很守纪律，不爱管闲事。只是他的眼睛稍微有些特别——一会儿象他父亲的眼睛一样凶，一会儿象天鹅绒一样柔和，一会儿又有点神秘莫测，天知道后面隐藏着一些什么想法。但总的来说，他看上去是个好青

年，我乐意帮助他。这也是为了他父亲，因为我们毕竟都是人，应当相互留下好的回忆。

有一句俗语，是阿拉伯的还是土耳其的，我记不得了，反正这不重要，它说：为了了解一个人，得跟他吃一麻袋盐。这太多了，现在我们有人事部门，但为了了解一个人，至少也得一起吃一大钵盐吧。跟尤利扬的父亲还不错，我们多年一起吃过一大钵盐，但跟他的孩子连一小把盐也没有分享过。我相信自己头一次的印象，不过这也可能是靠不住的，男人对某个女人一见钟情，而然后一辈子倒霉，这种例子还少吗？当然罗，女人也会犯同样的错误！我发现过尤利扬的某些苗头，可我仿佛注定要吃亏似的，我对它进行了错误的解释。早在那时，他就显得很怪。

那是他上大学的头一年，学年初。我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这位英雄没有地方住，于是，我的司机拉什科偷偷地将他安排在汽车队的一间木板房里。这件事两个好汉对我保密，直至十一月底，我才从我的同事——第二副部长那里听说了。而他是听自己的司机说的，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听说了。当我得知这孩子生活得多么困难时，我心里想："哎呀，真傲慢！不来求我给他在什么地方找房子，而一头钻进存放旧东西的木板房里，而且是冬天！真是小孩脾气！"我很生气，正要打电话时，我心里想：急什么！让这个孩子也看看

生活的另一面吧，这样，他就会知道珍惜好的东西。于是我在本子上记下：年底一定要让他回来。可是在这之前，此人已经搬进正式的住所了。

我不是对您说了吗，起初我以为他住进木板房是傲慢的表现，因为顺便说一句，埃夫蒂莫夫一家人，就其性格来说都高傲自负，不轻易磕头求人；我也考虑到，鉴于他眼睛里温和的表情，我还以为这孩子是害羞，不便于为私事来打扰我呢。但现在我觉察出了真正的原因。我告诉您，父母的遗传特征不是空谈，而象定时炸弹一样，会在下一代人的行为中突然爆炸，造成你无法预见的恶果。现在我明白了，他的行为既不是傲慢，也不是害羞，而纯粹是利己主义，不愿意依赖任何人，您明白了吗？他没有求我帮忙，因为他不想背上感谢我的包袱，明白了吧？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造成我轻信并以好心肠待他的原因很多，我想谈谈最主要的一点——尤利扬这个人有一种魅力，我们大家包括我、我妻子和我女儿维娜在内，都为此付出了代价。为了使您想象他这种魅力的迷人力量，我只简略地告诉您：我女儿维娜是个新女性，具有独立的性格，要求彻头彻尾获得解放，而且受过高等教育，是建筑系毕业生。可是您想也想不到，连她也上了当。对不起，不是他强迫她做什么事，而是她主动为他搭桥。她这个

性格独立、主张解放的人！

尤利扬就是这样的人——你不明白他的吸引力究竟来自哪里？论外表没有任何特别的东西，而就内心而言……怎么对您说呢——我根本猜不透这种人，我想只有上帝才能看出来。

不管怎么说吧，问题出在我女儿身上，这会使我内心一辈子都感到痛苦。

我妻子和我女儿过于轻信尤利扬，她们被这个年轻人弄得神魂颠倒。在她们眼里，他仿佛象童话中那种天生具有人类一切最崇高的美德的小王子。自从我女儿开始请他来玩，跟他出去散步、看电影和参加各种音乐会以后，他成了我们午餐和晚餐时，经常谈论和议论的话题。这大概是从最后一学年中期开始的。后来两人都毕业了，他毕业于工程系和物理数学系，她毕业于建筑系。

于是，我扮演胡涂人的角色，也许是受了笼罩着我们家的气氛的感染吧，谁知道呢！我本人最喜欢他那谦虚的举止、勤劳的习惯，尤其是他的远大前程。他以勤劳和数学天才会成为一个大人物的，我认为他将来能当机械工业部自动化技术司司长或某外贸公司的总经理。

当他两个专业都毕业后，我提议委任他当我们部的处长助理。从这里可以顺利地爬向自动化技术局或外贸公司。

学术活动，天知道会有什么前途，顶多当个

教授罢了，而我们这里的教授要多少有多少！一个教授拿多少钱？假如想买一辆拉达牌小汽车的话，那他就得积攒一年半的钱，而且这期间一分钱也不能花。

外贸企业的总经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出差，去国外，有充分的代表性，作成几百万元的交易——自己说了算……

不过，自动化技术也不是可有可无的。有朝一日，尤利扬一定会象我一样当上副部长，因为工业的未来，在于由最高级机器人构成的自动化系统。自动化技术是主流，最受重视，无疑有朝一日会授予该局以自主权，将局升级为部的！……

我脑子里闪现出一些这样的想法，因为我女儿已经上钩了，我不管愿意与否，必须为自己的女婿的前途着想，何况这也关系到女儿的前途。她也长得很漂亮，外貌不比他逊色。至于教育，我早就对她关心了——有风度，会弹钢琴，俄语也讲得比较流利。不过，建筑学对女人来说是有时间性的，有了孩子后，孩子拽住她的裙子时，要么跟职业分手，要么职业开始变成负担，在它的重压下，家庭勉强地维持着，最后完全破裂。

但是，当我跟尤利扬谈这些问题时，尽管才刚刚提一下，我简直头就晕了。我真的感到非常惊讶，他这个人很轻浮，脑子里有许多不切实际

的想法。关于我们部，他连提也不让提。

“当官吗？绝对不干！”他笑了起来，用奇怪的眼睛望着我，仿佛我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似的，“请别谈这种事，因为我十有八九不会干。”

“那你想干什么？”

“去生产部门或科研单位！”他回答说。

“你究竟有什么打算？”

“等拿到毕业证后再考虑。从事工程师职业或任天文学代课教师，最坏的情况下可以教高等代数！以后再看吧，电子学吸引着我，尤其是微电子学。前天晚上，我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

“什么梦？”我妻子竖起了耳朵。

“是不是有关微电子学方面的？”我勉强地笑着。

“是微电子学方面的！”尤利扬朝我妻子笑着说，“我醒了，你们知道我在床前看见了什么？”

什么呀？”我女儿问，她眼睛里同时出现了好几种表情，一切都有利于微电子学。

“我床前站着一个形状象伞一样的活东西，但有四把柄，每把柄都象穿上旱冰鞋的人腿。它背上盖着镀锌铁片，为了不使其闪光，它背着各种小盒子、保温瓶和其他餐具，就象固定在行进中的交通工具里的桌子上一样。”

“真有意思！”我妻子说。

“太有意思了！”尤利扬朝她点点头，“不过，

为了使你们理解这个梦，我必须给你们讲一个以前的小故事。正如维娜所知道的，那时我还住在两位孤独的老人——老头和老太太那里，可以说代替了他们的儿子，他还呆在利比亚。我去市场为他们购买牛奶、面包和奶酪，有时还买一二根小灌肠，或者买一小包越南咖啡。而晚上我跟他们玩骨牌，这使他们忘记了自己是被儿子遗忘的人，也仿佛忘记了自己是被全世界忘记的人似的。现在我愈来愈少去老人那里了，而也许上帝要让我在别的地方住得久一点，那样一来，他们就会极其孤独地呆在自己的顶楼上。”

说这番话时，尤利扬意味深长地看了我女儿一眼，而她勇敢地承受住了他的目光，但脸稍微有点红了。

“这样，”尤利扬继续说，“我醒过来时，看见了床前那个活东西，但仿佛我不是我自己，而是一个老人，就是我给你们说的那个不幸的孤独的人。梦里会发生这种事，你醒来时觉得自己象另一个人，是不是？”

“啊，是呀！我妻子说，“我也做过这种梦！”

“你们发现了吗？就是说那个活东西 完 全象人一样，跟我说话，可是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声音那样响亮。”

“朋友，不要忧伤！”他说，“应当愉

快地看待生活，直至生命最后一息。我将代替您的尤利扬”。

“你吗？”我说。“别来逗笑了！你能干什么呀？”

“有些事情我会比尤利扬做得更好。”

“瞧你自吹自擂！”我用声音威胁他。“你不能跟尤利扬相提并论，世界上没有象尤利扬的第二个人。”

“嗯，是呀！”那个人说。“不过，首先请听听我能做什么，然后你再给我提意见。譬如我能走到电话机旁边拨号码，在我背上的键盘上您指出号码就行了。”

“啊！”我说。“我们跟老太太早就不记得任何电话号码了，况且别人也早就不再找我们，我们的电话变成了哑巴。这样，我们不需要电话服务。你能做其他的什么事吗？”

“我可以下楼，可以爬到牛奶店，用保温瓶为您送奶。我可以去食品店，用我背上的小盒子，为您送您喜欢的各种食品。您只要把钱放进我的钱柜里，把它挂在我鼻子上的小钩上，定货单就出来了。”

“嗯，是呀！”我深深叹了一口气。“可是，尤利扬会给我们解闷，他同我们

一起玩骨牌！"

"不用说了！"那人说。"这种事我会比您的尤利扬做得更好。譬如说，我会玩象棋、骨牌、骰子。我能为您吹奏你们时代的华尔兹舞曲，譬如说：'我的莎什科，老老实实站着，不要乱动。'假如您愿意的话，我能为您收听索非亚电台的'地平线'节目。您躺下时，我会给您唱'晚安，好孩子！'总之……"

尤利扬摆了摆手。

"我估计你们明白了我的意思，是不是？"尤利扬转向我妻子。

"是的，我明白了！"我妻子说。

"你想为孤独的人造机器人？维娜笑着问。

"你听出来啦！"尤利扬温柔地看看她，"所以，这几天我就决定请求去微电机厂实习。"

"那么工程学、天文学和高等代数呢？"我问。

"以后再说吧！"尤利扬将头往右肩稍微一歪，头一次以沉重和公开不友好的眼神望着我。"我不会占别人的位子！"他说，接着沉默了一会儿，"至于你们部，我决不会去，你根本用不着考虑了。"

您瞧他这只狼，他话里有话，跟我说话竟使用"你"了。于是，我头一次为维娜而发愁。我一贯认为埃夫蒂莫夫一家人，有一些源于山野的特

征。他祖母是林妖，他爷爷被革出教门，成了屠夫，更不要说他父亲了——众所周知，他的档案里不是一切都很好。我女儿真可怜！

我想他俩之间的关系，是从尤利扬开始对建筑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时开始的。在短短的时间内，这个聪明而性格又很不稳定的人，在建筑学方面有长足的进步，以至在计算机制图方面，能够令人满意地帮助维娜。在钢琴方面也是这样。事实突然表明尤利扬很会玩这种乐器。真见鬼，他有时间时，还弹钢琴！是的，他们一起弹钢琴。不过，除了他们对建筑学和音乐的共同兴趣外，我妻子的厚爱对他们的接近也起了重要作用，她不仅不阻止我女儿去他房间，甚至还鼓励她呆在那里。所以发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事。

我觉得有责任跟他谈谈。于是一天晚上，我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

"尤利扬，"我对他说，"据我所知，这一段时期以来，你和我女儿已经象夫妻一样生活了，你考虑过没有，"我对他说，"从道德的角度来说，你们必须尽快把关系确定下来，因为在一个受人尊敬的家庭里，这种事是不能胡来的！"

他——您想想看——他毫不在乎地笑笑，接着稍微考虑了一下，最后说：

"如果维娜愿意结婚的话，我决不反对，我们

就结婚。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根本没有谈过结婚之事，我得问问她！”

我听他这么一说，几乎两眼都发黑了。我们那个时候，姑娘得首先问自己的男友有什么打算，是不是严肃认真，是不是坚决保证跟她结婚，这时……嗯，他们才同居。而现在，唉！——干那种事象动物一样。这也在我自己的女儿身上发生了，在我自己家里发生了！他们同居，而事先没有谈过结婚问题！真见鬼，世界往何处去？

十五分钟以后，尤利扬很有礼貌地告诉我，维娜不反对去区政府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等哪一天有空时就去办理。

不管怎么说，这次谈话后，过了三个星期，他们的关系合法化了，成了正常家庭。

可是，自从他们组成了正常家庭后，两人的关系好象开始发生变化，但不是往好的方面，而是向坏的方面变。我头一次听见尤利扬跟维娜争论建筑学问题。他们争论倒没有什么坏处，让他们争论吧！可是我不喜欢他们争论的方式和语调。她为高层建筑辩解，而他主张搞低层建筑。他说：高层建筑是反人道的，精神上使人失去个性；而她反驳他说：他的审美观是原始的，不符合当代生活的实际情况。他说：当代生活是由人创造的，未来是美是丑，也取决于人；而她讥笑他，说他天真得象个诗人，当他的面指出了许多客观

发展规律，并肯定说，人们除了去适应这些规律外，没有别的办法。他论证说，类似的结论只会导致失败，只有知识浅薄、按条条框框思维的人，才会坚持这种看法。“是吗？”她说，“那么好吧，我们不是你这种有特殊天赋的人，我们是普通人！”她脸一沉，走进了自己的房间，但在关门之前，她又补充了一句：“我们脚踏实地，不象外地那种好幻想的人在云层里飞！”“你们不飞，因为上帝没有给你们翅膀！”尤利扬在她后面喊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进行干预。

“你太粗暴了！”我责备尤利扬，“你象你的父亲，举止粗暴，爱欺负人。”

“我父亲只对人民的敌人粗暴，只欺负他们！”尤利扬很不客气地说。接着他转入进攻，因为只要一提起他父亲，他就感到很受刺激，“尊敬的丈人，你是不是怜悯人民的敌人？假如不是他和那些象他一样的人，这样对付敌人的话，合作化就不知道要推迟多久，就象其他兄弟国家那样。这种种情况你难道不清楚吗？”

“他是你妻子的父亲，是副部长！”我妻子生气了，“你无权对他这样说话！”

自从我们开始谈论这件隐讳的事，尤其是从他跟维娜吵得很凶的时候起，我妻子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他的态度。

“你瞧！”他奸笑地说，“从什么时候起，我尊

敬的丈母娘开始对政治话题感兴趣了?不久以前，她感兴趣的只是，譬如在昨天某饭店招待会上，商务代表‘X’的妻子跟谁跳舞了这一类隐私话题；或者经理夫人‘Y’的客厅里的波斯地毯是不是真的，这一类私下议论的话题。现在却一下子对政治感兴趣了。如何解释这种突然的变化呢?”

不一会儿，维娜来了，她明显冷淡地看了自己的丈夫一眼，仿佛他根本不存在似的。她坐到钢琴旁，开始弹起来。每一次，在这种情况下，尤利扬总是这样对她说：“维娜，停一下，亲爱的，这儿有升半音符号，你为什么漏掉了?”或者“维娜，停一停，亲爱的，那儿已经指出了：最后一节应当弹得清晰有力，你没有注意吗?”这次，他同样说了这一类话。

“我爱怎么弹，就怎么弹!”维娜回答说。

……

我们家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维娜在建筑公司工作，而尤利扬则在自动小货车厂和索非亚大学之间跑来跑去。他没有时间搞微电子学，但有时大家都在厅里吃饭时，他又会慢慢说起自己的“活东西”来。

“昨天我想起来了，我的‘朋友’必须安装上用于急救的设备。试想想看，要是老头一下子病了怎么办?外面刮风下雪，老太太无力去医院请医生。这时我的‘朋友’就会给老头温度计，把听诊

器按在他的胸部。如果发烧，专门的医疗器械就会从安在我‘朋友’身体中的小药箱里选择阿斯匹林，机械手把它放在小盘子里。如果听诊器发现了老人肺部有严重的杂音，机械手就会在小盘子里放上抗生素。从药箱取抗生素会引起记忆机件的警觉，他会指使我‘朋友’去打电话、拨动医院的电话号码，并说出住所的地址。”

“要是住所没有电话，怎么办？”我妻子想将他一军。

“在这种情况下，”尤利扬傲慢地笑了笑，“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自动发出无线电信号‘SOS’，急诊室值班人员一秒钟就能收到。”

“我不知道你用这个‘活东西’对什么综合体作出反应？”维娜若有所思地说。

尤利扬立即回答说：

“那么，你近来愈来愈经常地用裤子代替裙子，你这是对什么综合体作出反应呢？”

“哦，难道你注意到了？”维娜说，她脸上流露出忧郁和挑衅性的表情。

尤利扬激起了我奇怪而矛盾的情感。我认识他父亲，照理说我应当对他采取保留、怀疑甚至一定程度的敌视态度。应当是应当，可是我不能！您瞧，发生了多么不平常的事——我不仅不恨这孩子，甚至对他父亲这样的人，我心里也开始让步，变得仁慈起来。

两位青年人在区政府登记后，我和尤利扬分别给他父亲发了电报，请他来参加“婚礼”——事实上他是该来的。老头没有给尤利扬回电报，却非常认真地给我发了电报：“谢谢邀请，我很忙！”那个故意捣乱的家伙没有来，但我并没有因为他这样做而更加恨他，恰恰相反！大概是因为我已经上了年纪吧，我感到难受，象有什么东西扎我的心一样。我瞒着妻子，从食堂买了烧酒，每次喝一百克。

我是想说，真见鬼，我对尤利扬的感情甚至不是矛盾的，而简直是很好，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可爱，尽管我意识到他不是香花。所以，在他获得物理数学博士称号后，我对他说：

“女婿，别再去设计自动化小货车了，也别再去教什么高等代数！是该做比较正经的有前途的事的时候了！部里有个自动化技术局局长空缺，这个职务不小，对你很合适，到一定时候，它可以一直把你引上部长的交椅。”

“谢谢你的关心和信任！”他说，“但没有必要，因为假如你还记得的话，我早就提醒过你，我不会去擦部里的椅子。而部长的交椅既不吸引我，也不会使我激动！”

“那么什么吸引着你，使你激动呢？小家伙！”我怒不可遏，“世界上有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你动心呢？根据我的感觉，我女儿已经不能感动你了。

你是个什么人罗？你想往何处去，有什么目标，究竟想寻找什么呢？”

他这样回答我：

“我跟着自己的心和大脑走，亲爱的爸爸！而它们将把我带往哪里，这是它们的事，我不干涉！”

我沉默了一会儿，怎么能斗得过这种人呢？

“好吧！”我说，“近期内，最近几个月，你有没有打算？”

“我有近几个月的打算！”尤利扬笑了笑，“我将去斯莫良天文台，写一部小小的著作，用数学手段阐明新星的构成，并顺便用这部著作申请研究员职称。”

“你要去斯莫良吗？”我从椅子上站起来，“那你问过自己的妻子没有，她同意离开公司，跟你去深山老林乱跑吗？”

“我这就去问她！”尤利扬说，“请忍耐十分钟，我会回答你的！”于是，他跑去问她了。

“等一等！”我叫住了他，“要是她拒绝跟你一起去斯莫良的话，你打算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也会仔细考虑的。”

“十分钟吗？”

“十分钟。”

“你们两个统统给我滚蛋！”我真的怒发冲冠了，“过去你们十分钟就决定结婚，现在十分钟又

将决定离婚！我什么也不想知道！”

我拿起帽子和大衣，走出了办公室。

这次谈话是中午进行的。晚上我回家时，见妻子眼圈都红了，她显然哭过。维娜在弹钢琴，就象母猫把无耻的公猫赶跑了一样，她脸上露出满意的表情。

“你们怎么决定的？”我问。

“决定离婚！”维娜说。

“尤利扬走了！”我妻子叹了一口气。

“怎么这样？”

“是这样！”维娜说，“我们相互说好后，他就把行李收拾在出租货车上，然后走了。明天他会用电话，将住址告诉我……我跟他仍然是好朋友……”

您瞧，尤利扬就是这么一个人！你给他好房子，漂亮的妻子，给他安排好的工作，保证他有光辉的前程——可他却用背向着你！

他，叫你无法理解地走了！

二 十七年后在H城

迎　　接

火车停在H站后，我走到站台上，使我愉快而又感到惊讶的是，没有手捧鲜花的女秘书，没有面带微笑的副厂长，没有焦急地盼望致简短的欢迎词的工会主席。“唉，谢天谢地！”我满意地对自己说。“大概欢迎的人来晚了吧，要不就是有某种误会。”我又对自己说：“命运之神今天投我所好，但愿这是好兆头！”

接着，我扮演了尤利师傅的角色，耐心地等待厂里的吉普车，以便送我去H城。

我在站区走了一圈。敞棚里堆满了陶瓷厂尚未运走的货物。我数了一下，轨道上有七节车厢，里面装的是有色金属加工厂的机器。站区里到处可以看出懒惰和马虎的痕迹。尽管快到中午了，敞棚和车厢周围不见一个人影，笼罩着一片

静寂，散发着石油和晒热的钢铁的气味。太阳把热量倾泻在大地上。

我坐在站台前一条长凳上，点燃了一支烟。十七年前，我从这里去索非亚，参加大学升学考试。你瞧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又踏在H城的土地上了。我到戈尔诺里亚霍沃去过好几次——安葬我母亲，后来安葬我父亲，还有一次已经记不得是干什么了，也许与办理将房子卖给邻居的手续有关吧。但每一次都只从H站路过，至州城下车，然后从那里去戈尔诺里亚霍沃——乘红色汽车沿着一条象铺开的带子似的黑色公路前往，不经过H站……那时就是这样。

在这十七年间，一种内心的不满足感不断催促我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可能性去干点事，学点东西，改变或者创造出点什么来。我不是一个善于猜透别人心理的人，所以我无法准确地确定这种不满足感究竟是什么，但我非常尖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就象饥饿感一样，尤其是当我置身于几乎什么也不发生变化、不曾发生变化，地面上泰然地笼罩着安静、懒惰和寂静的气氛的时候更是如此。我这种不满足感是好还是坏——我不敢给自己提这个问题，因为我一问自己，就总觉得它象个无底的器皿，无论我往里面倒多少水，它是不会满的。我有一种感觉，被称之为“满足”的那种幸福的情景决不会降临我的身旁，我将永远是

一个生活中饥饿的游客。

有时我问自己是不是那种永远贪得无厌、从来没有够的时候，总是不断伸手要的人。在已经过去的十七年里，我得到的东西少吗？为什么我还有强烈的如饥似渴的感觉呢？当年我从这里走时，还只是大学预备生，而现在已是物理数学博士，写了两本关于星的起源和新星的书，还就这一问题写了一大堆论文；在自动小货车厂当过工程师，而四年后成了车间主任；曾去苏联进修，作为技术进口的代表和保加利亚小货车展览负责人，曾在西方住了三年；在两个冶金厂领导过安装工作，现在是H城有色金属加工厂厂长……假如这不是工作，假如这不是成绩的话，那么什么是工作，什么是成绩呢？

不过，我这种不满足感也许是因为在所谓"私"生活方面不走运吧？谁知道呢，我没有体验过维特① 的烦恼，心里还保持着对一次浪漫的、已经自行消失的恋爱的回忆，保持着对一次轻率的结婚的回忆。其他的都是些偶然的联系，它们没有在我心里留下任何痕迹。一个刚刚跨过三十六岁界限的人，还能更多地要求什么呢？

那么是怎么回事？这种精神上的不满足感来

① 维特系德国诗人、小说家歌德(1749—1832)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主人公。

自哪里呢？

两周前，有色金属联合体总经理邀请我参观H城有色金属加工厂那个巨物，让我首先了解完成安装工作所面临的困难。我的印象是这些工作确实相当困难。然后，我们在高级饭店的餐厅吃了午饭。有色金属加工厂副厂长什特雷夫工程师陪同我们，他的肩膀部位有点驼，长着一张最早的基督教徒的脸。

午饭后，我们从H城的中心大街驶过。尽管新的建筑物和商店大大改变了城市的旧貌，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充满了我的心间，仿佛经过多年的流离之后，我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似的。要是我身边没有坐着这位重要的同路人的话，我肯定会对司机喊起来："停住！"我会下车，溜达一阵子，用手摸摸某所旧房子已经发黑的墙。我深受感动，开始回忆往事和初恋时的心情，可是总经理低着头打盹，饱餐一顿后他发睏了，于是我开始分析安装工作落后的原因，我重新回到现实之中来了，挥手告别了往事。我预感到不久的将来我会重新遇见他们的。

站前花园

一些往事开始出现在我的眼前。站前花园第一个迎接我，是我的老熟人。我记得去索非亚参

加升学考试时，我在这儿等车，一直围着它来回走动，叹着气。它带着五颜十色的微笑的花朵愉快地朝我笑着，而我感到非常忧愁。一个名叫莉莉的姑娘来送我，她念十年级，从当时来说，就是倒数第二学年。不久以前，我曾深深地爱过她。由于偶然跌跤致使腰部挫伤，莉莉的右腿完全瘸了，我对她的爱便变成了纯粹的怜悯，正如诗人们所说——在栽玫瑰花的地方，盛开着令人伤心的菊花，尽管我有良好的意愿并意识到这样做是不诚实的。莉莉是来送我的。发生了不幸之后，这个可怜的姑娘也许更加热烈地爱我了。当然罗，她内心对我们的关系的未来不会抱有幻想，但她假装什么也没有看出来，就象我假装对她的感情依然如故一样。我们沿花园慢慢地散步，呆呆地看那些牵牛花、玫瑰花、蜀葵花，仿佛被它们的美丽感动了似的。我们相互哄骗对方。我向她保证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来H城看她；而她求我别做傻事，要多关心自己的学习，而且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浪费在路上呢。她让我利用假期来，年底她也会去索非亚学文学，到时候我们可以天天见面。“啊，是呀！”我说：“可是一年——这太久了！”“会过去的！”她安慰我，“爱情会战胜一切！”她说这话时那样动情，使我对她倾注其中的感情不可能有任何怀疑；她在痛苦地讥笑我可怜的谎言。

我们是在做好心欺骗的伟大游戏，开满了愉快的鲜花的花园就是我们这场悲喜剧的见证人。后来，每当我回忆起我们这次最后的会面时，我眼前总是浮现出那些鲜花。在我的记忆里，莉莉的形象渐渐淡漠了，时间开始抹去她的特征。从那最后一次见面中作为回忆而留下来的只有牵牛花、蜀葵等多姿多彩的温柔的花朵。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总觉得它们象莉莉的眼睛

现在小花园奄奄一息了。离它十五步远的地方有水龙头，可是花却早死了。我望着这块荒芜之地，感到在我自己身上，我的心间一个美好的地方，也许是最美好的地方，同样受到旱死的威胁，杂草会把它淹没，干旱会使它枯焦，牵牛花和蜀葵会只剩下枯焦的光杆。

当我围着小花园边走边想时，一辆卡车开到了敞棚旁，从车里下来了三个人。调车机从沉睡中醒来，懒洋洋地发出呼哧呼哧的声响。

我又去调度室。站长在继续打盹，他的助手正用剪子修着指甲，报务员翻着站里的杂志。"我要对你们采取措施！"我在心里狠狠地威胁他们。"你们把七节装着机器的车厢停在轨道上不卸，一群懒鬼！"然而，我却很有礼貌地朝他们点点头——我有这么个习惯，当我非常生气时，仍然坚持礼貌待人。我温和地说：

"我有一个请求！"

“您大概是闲着没事儿干吧？”报务员粗暴地对我说。我仍然被看成尤利师傅了。谁也没有估计到他们未来职务上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我。

“我正是为工作而来的！”我对报务员温和地笑着。

站长动了动，瞪起眼睛望着我。

“一头无用的老驴，再过一周，他也不会把我那七车厢机器卸下来的！”我内心里咬牙切齿，但我没有吱声。

我不是尤利师傅吗，所以我温和地说：“你们这里能不能找到种花的工具？譬如说铁锹、耙子？”

“您要这些种花的工具干什么？”站长问。

他那样看着我，简直把我当成了疯子。

“我想在花园里干点活！”我说。

“它是国家财产，不是供人开心的！”站长提醒我。

我保证不会损坏国家的财产，将把花园完好无损地交给他们。

他们给了我工具，我便开始干起活来。

这样，在我心里早就隐藏着五颜十色的牵牛花和天蓝色蜀葵花的那块地方，重又生机勃勃了。

而站里的那些好汉们，他们要么把我看成是一个热中于园艺的狂人，要么认为我是个十足的

傻子。

吉普车司机

去H城途中，吉普车司机对我态度粗暴，我也公平合理地处罚了他——让他在雨中步行。

他到达小客栈时已经怒发冲冠了，想抓住“尤利师傅”的脖子，把他打翻在地，因为他抢走了他的吉普车，害得他走路。但当他发现“尤利师傅”以一副厂长的姿态坐在桌旁，穿着厂长的服装时，他感到惊讶，象每个卑鄙家伙一样退却了，把怒气往肚里咽。怎么能这样报复一位厂长呢，莫不是疯了吧？那些卑鄙家伙会设法报复其他的人，但不会报复大头头，在大头头面前，他们只会点头哈腰。

他感到痛苦，并不是因为我强迫他步行，而是因为无法回敬我，无力报复我。除了粗暴和卑鄙外，他是个心地狠毒的人，所以不接受我的邀请，不愿赏光跟我同桌进餐。

这个或那个人的粗暴，并不曾伤害也不会伤害我的自尊心，但使我这个天生为美好的事物而快乐的人感到愤怒。又因为我不是仁慈的基督教徒，而是举手反对上帝、被革出教门的牧师的孙子，是曾在恶棍们的门上写了“这里住着富农——人民的敌人”的父亲的儿子；所以我对那种想损害

他人、妨碍别人为美好的事物而欢笑的人，不能袖手旁观。

我决定给这位司机一点厉害瞧瞧，当面讥笑他，然后给他最后警告处分，然而我改变了主意。工厂里由于落后了，情况跟战场差不多，我们人手不够，没有时间进行教育方面的试验，我决定派他去火车站当运输监督人，在那里他不会给谁捣乱的。要是他想骂自己的同事或在别人鼻子底下晃动拳头的话，那么，站里那些没有出息的家伙，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

小客栈老板

我要感谢和把荣誉给予那些为别人的快乐而快乐的人！

假如有人问我谁是坏人，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不能为别人的快乐而快乐的人，就是坏人；而假如有人问我谁是好人，我会说：好人就是那种把别人的快乐看成是自己的快乐的人，还有为了让地球上有更多的人获得快乐而工作和付出代价的人。

这就是我的简单的哲学。

在长期的经营旅店的生活中，桑多大叔不仅尽力用食物满足客人的需要，而且尽自己的所能做出一切，用自己高超的手艺使他们心里高兴。

他访遍民间烹饪高手，跑遍深山密林，不断寻找佐料，以满足人数众多、常来常往的顾客的嗜好、口味和情绪。

当一位师傅只满足自己的顾客的口味时，他是个好店主；但当他尽量使他们心里高兴，使他们心情愉快时——他已经成了创造者。

桑多大叔在长期的经营旅店的生涯中就是这样一个人：欢乐的保护者。

但他首先是个好人。跟坏人不同的是，好人能够体验人的最高尚的感情——从别人的快乐中产生的快乐。还要什么？为什么必须连篇累牍地空谈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快乐的石蕊试剂！你帮助别人获得快乐，为别人的快乐而快乐——你就是好人；你冷漠地对待别人的快乐，你对这种快乐感到不顺眼——你就是坏人。

我听说市政府已决定在小客栈那个地方盖高层建筑，或者某座机关大楼。让市政府盖这种建筑吧，想盖多少就盖多少，这没有什么坏处，恰恰相反！可是，为什么要推到旧客栈呢？要是把这个客栈修复一下，加固一下，使它成为民间餐厅，只制作和提供民间风味食品，乐队只演奏民间的节目，岂不是更好吗？

我要找市长谈谈这件事，假如话语打动不了他的心的话，我就去敲州里大人物的门。

第一天，结识玛娅

头一次参观有色金属加工厂回来时，总经理不断在我耳边嘀咕安装工作进展如何缓慢和造成这一极不顺利的状况的原因。在他看来，造成这种不幸的罪魁祸首是前任厂长，他是个易受诱惑和放荡的人，在采取强硬手段方面表现得很软弱。我心不在焉地听他嘀咕，不时点点头，毫无保留地同意他的结论。我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但无心跟他争论。

他讲述着，汽车往前行驶，一望无际的夏季绿油油的景色，一片片地从窗前闪过，马上又消失了，而我在想自己的心事。我问自己什么时候才不被利用去堵冶金战线的漏洞，而让我根据自己的选择去一个研究所，让我从事我所喜欢的研究工作；或者让我安静地研究银河系，因为我说出了我所知道的和我能够说的旧星和新星的一切。我了解星星的情况，但用计算机语言谈论银河系和黑洞的时刻到来了吗？

不久以前，有人建议我去索非亚大学任教，核能研究所邀请我去当编内研究员，科学院通知我，说斯莫良天文台副台长的位子空出来了。我坐下来，仔细思考哪种工作我更喜欢，能在知识领域引导我走到更前面。正好这时部里把我叫

去，问我愿不愿意去H城有色金属加工厂……谁知道为什么，H城一词象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但是，我鼓足勇气拒绝了。

这时，最重要的机关找我去谈话，那里顺便告诉我，说许多重工业部门最需要铜制品、铝制品和青铜。我们谈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又顺便问我这些重工业部门，在明年春初能不能指望用上铜制品和铝制品。

机器安装工作，正如我亲眼所见的，才刚刚过半，要求我在六个月内完成我的前任一年完成的工作。没有办法，铜制品和铝制品是重要的东西，他们用不着说服我。我说，这些重工业部门最终可以寄希望于我，我坚定地下了保证，因为我明白这项工作非常重要。而我父亲早就教育过我，他说有些事情一个人值得勇敢地去干，尽管不怎么符合他的兴趣。

不仅如此，跟时间和困难作斗争，有许多美妙之处。假如有人提议一个有经验的登山运动员去参加考察珠穆朗玛峰时，难道他会拒绝吗？假如有这种经验丰富而又拒绝参加考察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运动员的话，那么，他就得马上交出登山运动员证，退出登山协会，去居民区钓鱼或玩乒乓球。

我一到达，就决心给狡猾之徒和悲观分子以决定性打击，这样，我就会感受到第一次打击所

带来的、任何事情无法比拟的快感，而有色金属加工厂的全体人员，对他们将要做的事情也会有明确的认识。

我在开工前一小时到达工厂。正好这时旁边小树林和灌木丛中的鸟儿尖声唱了起来，天空中，被晨风吹散的贝母云还微微泛着玫瑰色的光芒。我吩咐值班电话员，赶紧把什特雷夫副厂长、总工程师和工会主席叫来。他们三人来到我的办公室时——一个个露出惊讶、窘迫和酸溜溜的表情（什特雷夫除外）。我给他们讲了第一条措施，以恢复全体人员已经松懈了的劳动纪律。总工程师表现得很冷淡，什特雷夫真诚地感到忧虑，而工会主席不满意地摇摇头，表示希望类似的严厉措施，最好先在党委和厂务委员会上讨论一下。我告诉他，将来还会采取类似的措施，当必须结束一种可耻的落后局面时，没有必要协商一致。他马上表示可以理解，咳了一阵子，使劲拨动电话号码，召集工会的其他领导成员。

我进行第一次冲击的收获是可怜的，几乎所有的工程师都迟到了，而有一百来名工人来得更晚。我马上发布处罚命令，吩咐张贴布告：当安装工作继续落后时，迟到将受到严厉制裁。连什特雷夫的女秘书也受到最后警告——她由于举行婚礼，未经允许，擅自离开了工作岗位。

由于急需铜和铝制品，我不得不挥动鞭子，

而且对我本人来说——我坦率地承认，这一行动使我得到快乐。当年我父亲面对一片片精心播种的小麦时，他能不高兴，他的心里能不唱起赞歌吗？

那种不为达到某个重要目标而在路上迅跑的人，是什么也不会懂的！一个人如果朝着一个重要目标迅跑，那么连鞭子的响声，在他听来，也会象一首优美而雄壮的进行曲！

跟党委书记说好之后，晚上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我不善于讲话，所以我简短和直接了当地对大家说：

"国家急需铜、铝轧材，所以我宣布本厂处于紧急状态，全厂职工将以最大的紧张度进行工作。工作中的严重失误和违反纪律等现象将受到严厉处分。我要求我们大家要诚实地和象男子汉一样相互理解。谁有勇气——就留下来；谁没有勇气——就祝他一路平安！那些诚实而勇敢地工作的人，是我的朋友；而旷工的人，我现在就警告他们——他们不会有什么光彩的！……我给你们半小时考虑时间。留下来的人去食堂，要走的人意见一致后，就收拾行李走！"

为了工人阶级的荣誉，只有七个人表示离开，我们高高兴兴分手了。

对于去食堂的人，我吩咐用我的钱给每人提供一百克烧酒和一份佳肴。

打仗就得象打仗的样，就要勇敢，不能哭哭啼啼！

就在这“勇敢的”一天的中午，我心间迸发出爱的火花，我爱上了什特雷夫的妻子玛娅。

人们以两种方式恋爱：要么突然相爱，就是平常所说的“一见钟情”；要么慢慢地相互接近。

我对玛娅是一见钟情。当爱情象扑不灭的火焰一样，在我心间爆发的那一瞬间，我明白了一见钟情的说法是一种庸俗的、天真的误解。一见玛娅，我就感到——正是这样——我就感到我终于站在一个我一生不自觉地寻找的女人面前。我一生都在向往她，你瞧最后终于发现了！我心里开始唱起赞歌，世界仿佛充满了贝多芬欢乐的颂歌的美妙音响。

玛　　娅

我对莉莉的爱无论具有怎样的浪漫色彩——晚上散步也好，观察星星也好，愉快和富有诗意的无忧无虑也好——实际上是一种年轻人的冲动，莉莉全心全意地爱我，对此我确信无疑，而我只不过是喜欢她而已。

把我和维娜联在一起的是一种性欲，如此而已。我们曾住在一起，然后结了婚，尽管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精神联系，因为我们的兴趣和观点

相差很远！她喜欢高层建筑，把赌注压在这上面，而我讨厌高楼！她对格尔舒尼① 着了迷，而我崇拜莫扎特。我们离婚后，我感到象在烟雾腾腾、令人窒息的房子里呆了很长时间后，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一样。

但是，我哪里知道玛娅会不会象她呢？一见钟情引起的感情，会不会欺骗我？在这八月的早晨，初露的阳光迅速把露水蒸发掉了，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会不会也把我最初的诱惑蒸发掉呢？

但不管我心中怎样出现了象乌云一样的疑团，世界在我眼里却仿佛变得美丽了。我置夜晚的失眠而不顾，现在夜色正浓，我不想返回桑多大叔的阁楼上去。他的葡萄园里有一块高地，那里栽了许多蔷薇。我把衣服扔在草地上，躺在上面。黑暗的天空布满了金色的、银灰色的和深红色的星星，吸引着我的眼睛。此情此景，就象童年时代在佩尔万姨夫家一样，山坡草地上，我躺在羊旁边；就象从前在静悄悄的夜晚跟莉莉在郊外散步一样。没有其他感情比爱情更接近自然了，它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当一个人的心中蕴藏着爱情时，他就会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只有这时他才开始理解大自然的语言，体会它的美景的吸引

① 格尔舒尼(1905——)，苏联生物学家，主要有生物声学、听觉和生理学等方面的著作。

力。

我躺在草地上，注视着夜空。仙后坐在五条腿的银凳上，听着丈夫仙王 那烦人 的 唠叨。大角①白白地朝维罗尼卡② 的头发伸出手去，闷闷不乐的比克③ 用毕宿五④ 的红眼睛不满意地望着世界，而猎户星座这个大美人正沿着崎岖不平的道路骄傲地朝南方地平线走去。

在大角和维罗尼卡的头发之间，我仿佛发现透过虚幻的银色帷幔，可以看得见玛娅那若有所思的脸庞。她是不是在思考作为忠实妻子的维罗尼卡的命运？对她那夫妇间的忠诚，她有什么想法？这使我很感兴趣，因为地球上存在着她的丈夫什特雷夫，他作为良心的化身站在玛娅和我之间。

秋　　曲

1

我好几次带着酒和菜肴去车站，同他们一起打牌，跟站长、郁郁寡欢的话务员和集票员成了好朋友。运来的机器不再被长期搁在敞棚里，安装工作进展迅速，八九月份几乎 超 额 完 成计划的50%。

---

①②③④ 均为星名。

但十月初，没完没了地下起了可怕的大雨。经过无雨的春季和干旱的夏季后，天空象开了闸似的，地上积满了水。哪怕是小孩子陷进泥里，也不会有人去救他，因为汽车在原地空转不前。

食品——蔬菜、肉类、奶酪——的供应一天比一天少，厂部工人食堂的东西渐渐少了起来。该死的白菜和大米粥，大家都吃腻了。本厂的工人们经受住了这次灾害的考验，但那些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人，那些盖集体宿舍的人——建筑工人——他们开始准备口袋，匠人、模槽工、泥瓦匠，每天都往火车站跑，他们知道他们这种人很少，是稀缺人材，所以，他们往油水多的地方跑。

施工计划受阻这个幽灵愈来愈多地、经常地来拜访我，我常常在睡梦中惊醒，瞪起眼睛挨到天亮。所以我决定去拜访一位重要人物——商业局局长。

"老兄，"我说，"明年我的人能否象人一样住进楼房，还是在木板棚里安营扎寨，就看你的了。可是你要知道，木板棚不是吸引住了人，而是把我们的弟兄都挡回去了，有色金属加工厂这个庞然大物有人员跑空的危险，那就会发生最坏的情况：国家仍然没有铜和青铜。"

此人很瘦，面孔黝黑，一双黑眼睛炯炯有神，大概他的老祖宗跟诺盖①的鞑靼人有亲缘关系

① 诺盖(？——1300)，顿河和多瑙河之间的鞑靼统治者。

吧。我一到，他就用白兰地和名副其实的巴西咖啡招待我，他象过去的伊斯兰教徒一样，双手合掌，朝宽敞的办公室的天花板一举，说：

"阿门！"他大声说，"请不要在我心里点火！不要把我的手脚钉在十字架上！我不是圣经里所说能用五条鱼和五个面包养活两万人的耶稣！全H城这副重担都压在我头上，包括工厂、饭店，首先是高级饭店。我有责任将得到的东西一点一点地分给每一个人！我恳求您不要把我的手脚钉在十字架上！"

"可是，根据我们双方签订的合同，"我说，"无论是蔬菜、肉类、白糖，还是油脂，你们都欠我们的帐！我坚决要求你们用下一批供应品还我们！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有色金属加工厂属于共和国规模的厂！"

"咳呀！我知道！我还知道其他的许多东西！我告诉您，有些事情，H城数我最了解，我甚至要冒昧地说，有些事情我比阁下还清楚。譬如说一周后要在州城召开学术讨论会，有外国人参加，州委书记亲自给我打了招呼，说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脸，因为我们的人随便怎么样也没有关系，可外国人……不能给他们留下坏印象。这也是对的，是不是？国家政策嘛！而人们是根据餐桌上的东西来评价国家政策的，……对不对？又如您不知道下周H城市委第一书记的女儿要结婚，为此，

将在高级饭店举办隆重的宴会。您是个大人物，我要告诉您，这些细小的，然而又经常遇到的事情，甚至中止了我与你们这种共和国规模的企业的合同！请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下一批供应品到后，我一定尽我的力量照顾你们！……”

我衷心感谢他对有色金属加工厂所怀的友好感情，紧握了一下他的手，就回去了。这个人毕竟用名副其实的巴西咖啡和五星级普雷斯拉夫牌白兰地……

然后，我跟火车站我那些朋友联系，我从他们那里得知，下一批供应的货物哪一天将到达H站。就在那天，我们沿着秘密的路线到达火车站，在站台上放了一台磅秤，装着供应品的车厢到达后，我们称了我们应当得到的商品。那位诺盖的远房亲戚闯到报务员那里，想跟州里或H城第一书记联系，但那个郁郁寡欢的人，给他指了指门。

“这里只允许本站工作人员打电话！”他对他说，“这不是公共电话！请离开这里！”

还该给我们一百公斤冻牛肉，但我们在冷冻车厢里发现了六头稍微冷冻了的小猪。

“你们敢动小猪！”商业局长站在车厢前，双手叉在腰间，打算不顾死活保卫这些贵重商品。“两头供应高级饭店的餐厅和第一书记的女儿的婚宴，而其他的是给州城学术讨论会的！你们敢碰

碰它！”

我转向小伙子们。

“把为婚礼用的拿走！”我对他们说，“而其他的就为科学而做点牺牲吧！让我们向负责的人表明：工人阶级尊重技术进步！”

接着，我去找第一书记。他已经得知火车站发生的事情。从他的脸色来看，既看不出同意，也看不出责备的意思。

“你做得好，很关心自己的人，但这不是完成这种工作所应采取的方法。你想一下，那里，要是从其他的企业也来了许多小伙子和厂长……你想过没有，会发生怎样的混乱？”

“一切我们都将兄弟般地平分。”我说，“至于小猪嘛，我们想抓阄决定。”

他摆了摆手。

“关于这些小猪，我要扭经理的耳朵！”他说，“我本人并未订购什么小猪。但不管怎样，他指望手里有了这些小猪，就能……”

“请不要着急！”我对他说，“我向你保证，我会尽量想办法使婚宴更丰盛！”

喜庆前夕，我吩咐总厨师煮十五公斤豆子和同样数量的土豆，然后将这些东西捣成泥状。第二天早晨，我到厨房要来烤制真猪的烤盘。我在这些盘子里用豆子和土豆泥塑造了猪，在上面撒了不少辣椒，浇了动物胶汁，还撒了相当多的香

菜……头一眼看去，很象真猪。

关于效果，不是我吹牛，大部分客人直至把刀叉伸进盘里，打算切一块美味可口的肉时，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于是，哄堂大笑。尽管是假的，但假猪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调动了客人们的胃口，被一扫而光。

然后我们唱歌跳舞。什特雷夫夫妇也来了。我请求乐队演奏施特劳斯①的《蓝色的多瑙河》。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客人中谁也没有站起来跳舞，这些人不会跳华尔兹……这时，我遇上了玛娅的眼睛，她有点苍白，但在朝我微笑。她的眼睛里充满热情地求我和召唤我。

我俩单独来到舞池，音乐一起，我们就沉醉于另一个世界之中了。那儿只有我俩，是一个充满光辉和幸福的世界，因为我的嘴唇感觉到了她的气息，她的嘴唇也感觉到了我的气息，那简直象童话中的世界，因为我们相互紧紧地靠在一起，富有魔力的浪潮带着我们飘流。

华尔兹舞曲结束时，大家暴风雨般地出自内心为我们鼓掌。我带玛娅回原地，即她丈夫那里。他闷闷不乐地坐着，脸色象个摆脱了这个虚伪的世界，只把心献给上帝的古代基督教徒。

---

① 施特劳斯(1825——1899)，奥地利作曲家。

2

我很少使用什特雷夫家的房子，我害怕，我觉察到玛娅也害怕。

但没有哪一天，她不带着索妮娅来我这儿玩的。我们去葡萄园，带着索妮娅在葡萄地里跑，玩捉迷藏；或者沿着环绕果园的路散步，索妮娅跑在我们前头。

有时让她俩坐上我的车，我带她俩进城。我们去甜食店，去公园坐摇椅，去露天电影院看儿童影片。

我偷偷地寻找玛娅的手，当我们的手偶尔碰到一起时，上帝啊，多么幸福！

有的晚上，我控制不住自己，渴望见到她和听到她的声音，这种想法压倒了理智，于是我就去他们那里。她专门为我弹舒曼①和柴可夫斯基的乐曲②。鲍扬·斯皮罗夫那个坏蛋意味深长地用眼睛注视着我们，而什特雷夫闷声不响地吸着烟，或者象基督教徒受难者在被扔给野兽之前那样奇怪地微笑着。

有时，我们去熟人家做客。他们了解我的兴趣，为了讨好我，就用立体声收录机放华尔兹舞

---

① 舒曼(1810——1856)，德国作曲家，音乐评论家。

② 柴可夫斯基(1840—1893)，俄国作曲家。

曲、狐步舞曲，放得最多的是阿根廷探戈舞曲。我与玛娅跳舞，觉得我们象在维罗尼卡的头发、金色的大角和毕宿五血红的报复性的眼睛之间，那辽阔的星空里飞翔。鲍扬·斯皮罗夫带着恩人的表情，给什特雷夫讲各种故事，而什特雷夫以非常温和的微笑望着我们，默默地吸着烟。

十月末的一天下午，我鬼使神差地坐上车，到了什特雷夫家。一个女人带索妮娅出去了。玛娅坐在钢琴旁，弹奏柴可夫斯基《四季歌》中的“秋曲”。当她弹完后，我跪在她跟前，失去了理智，抱住她的大腿。她喊叫了一声，然后弯下腰来，不顾一切，狂热地吻着我的嘴唇。最后，她跳起来，仿佛要把自己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似的。

“不应该！”她脸色苍白地低声说，她的眼睛非常害怕地望着什特雷夫平常坐的地方。“不应该！”她仿佛在呻吟。

她跑到院子里，穿着裙子，没有戴纱巾。

我拿着她的上衣，走到院子里，给她披在身上。

大雪纷飞，下起了第一场雪。

冬　曲

1

十二月二十五日，我们完成了机器安装工作。

同一天，为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举办的有色金属加工培训班也结业了。过了三天，我为全厂职工举行了宴会。大家分别坐在三个食堂里，我们脚下的土都冻硬了，刺骨的寒风透过缝隙往里钻，人们冻得打颤，但情绪高昂，张口鼓腮地喝着我用自己的钱为他们买来的烧酒，他们久久地望着我，频频举杯，我也举起了杯。

“同志们，感谢你们！”我说，“我向你们鞠躬，因为你们战胜了钢铁和雨雪。朋友般地紧握你们每个人的手，干杯！”

当时冷得要命，不便长篇大论。

然后，我们颁发了奖品：工会主席发给工人们，我发给工程师们。每个工人得到一枚铜制纪念章和一瓶葡萄酒，而工程师们拿到的是荣誉证书和镀金纪念章。证书中两份是金色的，其他均为红色。我把金色证书发给了什特雷夫和吊车司机西莫师傅。得到荣誉证书后，西莫师傅发誓：为了工人阶级的荣誉，保证今后在上班时间里决不再从吊车上下来；而什特雷夫——他几乎大哭起来，真的动了感情——想吻我的手，嘿，这样的男子汉！

后来，我们放声唱起了游击队之歌和爱情歌曲，而当酒兴上来后，我们在草地上拉成一个大圈，跳起了霍罗舞。

2

我和玛娅非常注意，小心谨慎，可城里开始纷纷议论我们。什特雷夫瘦了，双眼深陷，脸上流露出圣徒一样的表情。

十二月三十日，厂里七十米高的主要烟囱开始冒出团团黑烟，直朝冬季灰色的天空滚滚冲去。我们比政府规定的期限提前了一周。为此，第二天即新年那一天，我在高级饭店豪华的宴会厅里，举办了一次大宴会。中央书记处领导、州委第一书记、市委领导、陶瓷厂和玻璃厂厂长、本厂的工程师和突击队员们都参加了。

应邀的客人中，有一位名叫萨莎的姑娘，她是H城市长的女儿。她浑身珠光宝气，圆圆的红脸上长着一双毫无礼貌的眼睛，一帮献殷勤的人，跟在她身后，我无不惊讶地发现我的"朋友"鲍扬·斯皮罗夫也在其中。

自然，什特雷夫夫妇也来了，不过，那天晚上我一点也没有注意玛娅。我也加入了向萨莎献殷勤的行列，我赶快从献媚者那里把她抢了过来，因为我给乐队说好了，让他们主要伴奏阿根廷舞曲，而所有的阿根廷舞只有我跟她跳。有一会儿，我发现——我有老练的眼睛——我发现斯皮罗夫也对这块好吃的肥肉垂涎三尺。顺便说一句——这是公开的秘密——市长的千金小姐作为独生

女，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和葡萄园中修有游泳池和地下汽车库的别墅的继承人。那个对玛娅失去了希望的坏蛋，现在又狡猾地对市长那两颊绯红的千金小姐依依不舍了。

当乐队第七次奏起阿根廷舞曲时，斯皮罗夫急忙将手放在萨莎那软绵绵的圆腰上，但就在这时，我一把抓住他的硬衣领，猛地一下将他朝自己这边拽了过来。他瞪起眼睛，仿佛他面前站着一个鬼怪似的。

“你怎么敢染指一个姑娘?”我冲着他的脸喊了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就这样乱摸一个清白的少女吗?”

“那——那么您呢?……”他惊得目瞪口呆，说起话来，有点结结巴巴。

“这是你杂耍的地方吗?”我瞪起眼睛望着他，使他受到很大的震动，他的头象木偶一样哆嗦起来。“你怎么不在厂里值班，而跑到这里来耍流氓?”

“值什么班?”他的脸红得象虾，但很快又开始变白了。

“你忘了！斯皮罗夫，你忘了！”我用手指威胁他说，“后天，在第一次厂务会议上，我会告诉你是值什么班的。我要叫你永远得不到提升！丢下工作不管，去调戏别的女人！”

因为他象挨了闷雷似的站着，我朝他喊道：

“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

他摇摇晃晃地朝门口走去，而我笑了起来，对萨莎说：

“别害怕，我的姑娘，只要我在H城，谁也不敢用指头碰你一下！”

周围站满了人，他们对这个斯皮罗夫感到惊讶，并以畏惧和尊敬的神情望着我。

“乐师们！”我喊道，“来华尔兹！”

接着，我朝玛娅鞠了一躬。

直至十二点，乐队只奏华尔兹和探戈舞曲，我只跟玛娅跳舞。

正式的祝词结束后，大家开始相互祝贺，要好的朋友相互亲吻。我亲玛娅时，她哆嗦了一下，闭上了眼睛。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当时大家都被香槟酒灌得迷迷糊糊的了。

午夜过后三点左右，我们离开了饭店。什特雷夫喝得酩酊大醉，我请厂里的两位突击队员将他扶上车。我将他安排在后座上，而让玛娅挨着我。外面下着大雪，在车灯照耀下，雪团看上去呈金黄色。我往前开着车，但不是往什特雷夫家的方向，而是往火车站去。

“为什么？”玛娅吃惊地悄悄问我。

“你着急吗？”我同样悄悄地问她。

她没有回答我，但我觉察出她往我身边稍微靠了一下。

而什特雷夫早就睡得象死猪。

我遇见了站长和报务员，他俩喝得醉醺醺的。站长助理清醒地守在那里，正好轮到他值班。我给朋友们留下了一箱陈葡萄酒，向他们祝贺新年，我们相互热烈地亲了一阵。不知道为什么，玛娅也来到了我车站的朋友们中间，我也亲了她一下，不过这一次，我也闭上了眼睛。

什特雷夫在车里睡觉。

3

为了使车间的工序步调一致，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必须改进各个关键部位的工作，所以元月十日之前，我一次也未去什特雷夫家。

十一日傍晚，我为索妮娅买了一盒巧克力糖，还有一只玩具熊，它可以挥动掌子，并能往前走动。我抬手按了一下他们家的门铃，已经想象到了玛娅迎接我时，那种温柔的责备。

“我忙得要命！”我打算这样对她说，并在心里吻她那忧愁的眼睛，“你丈夫没有告诉你，我这几天在干什么吗？”

什特雷夫给我开了门。我感觉到他陪我去客厅时，象有罪似的微笑着，而当他请我在钢琴右边坐下来时，他脸上浮现出闷闷不乐和痛苦的表情，其中夹杂着某种命定的不幸。

他呆呆地望着我手里拿着的那盒巧克力和玩

具熊，但没有接过去的意思。

“索妮娅和玛娅在哪里？”当我突然感到厅里令人失望地空了，而且象没有任何人呆过的房间一样寒冷时，我问。

“你们家的人都到哪里去了？”我大为惊讶，不由自主地朝四周瞧瞧，“是不是进城还没回来？”

什特雷夫好象更加驼背了。

“我家的人不在城里。”他用低而平静的声音说，“这几天我没有机会单独跟你在一起，无法给你解释，请多多谅解。这是我的过错。玛娅带着索妮娅到桑丹斯基去了，是的，是的，去桑丹斯基了。医师早就发现索妮娅有早期气喘症状……我不知道玛娅怎么至今没有对你说过这件事！”

我把那盒巧克力扔在钢琴盖上，不自觉地紧紧捏住玩具熊的脖子。

“胡闹！”我说，“什么气喘？我没有在孩子身上发现过任何类似的症状。是哪个医师给她诊断的？”

什特雷夫沉默不语。

“又为什么这样突然走了呢？”

现在什特雷夫坐在沙发上，开始吸烟。

“因为，”他仍然用低而平静的声音说，“因为桑丹斯基有一个文学教员的空缺，期限为一年。我们利用了这个机会！”他摊开两手，“明年十二月之前，玛娅和索妮娅不会在这里。”

我牙齿咬得咯咯响，举起玩具熊想揍他，但最后一秒钟我克制住了。

“咳，你是个多么卑鄙的家伙！多么卑鄙的家伙！”我哼了一声。

什特雷夫最后露出了基督教徒殉难者的微笑，说：

“你可以任意责备我，也可以打我，我不会对任何人抱怨的。”

“这一年以后我会做的，你这个坏蛋！”我说，“一年以后，我要那样责备你，要叫你这颗卑鄙的心象被踩着的虫子一样抽搐，我要‘揍’得你再也不敢抬起头来！我不想干下流勾当，但这是你惹起来的，所以我要对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年时间并不长，我会等待的。”

我把弄得皱巴巴的玩具熊放在那盒巧克力旁边，就出来了。

当我回到桑多大叔的别墅时，我发现门底下塞了一封信，是玛娅从桑丹斯基给我寄来的：

所发生的一切，是我自己要这样做的，请不要责备我丈夫！他那样软弱无力，以至使我感到无力再伤害他的自尊心。请不要生我的气，从你的星星中寻找安慰吧，但愿它们能劝导你——我们不要再作这种游戏了！

玛娅

第二天，我在中心书店俄文部发现了一本苏联著名数学家写的新书，他用数学研究方法论述各种星星、银河系乃至宇宙起源的假说。我回到家后，手里拿着铅笔，开始读了起来，直至天亮时，我才发现炉子早已熄灭，房间里冷得象冰箱，我的床还是昨天那样，原封未动，但我的心中燃起了火焰。我从这本书中发现了一条通往真理的直径，但在中间却有点往旁边偏了，至少我有这种感觉。"你瞧，机会来了！你试试自己的能力吧！"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你的两本书中有些方面已经接近真理，现在你有机会往上爬一步！"

我走到外面，正静静地下着大雪。我捧起一把雪，擦自己的脸。然后，我掸了掸大衣上的雪，重新又坐到桌旁。

午饭前，我拟定了一份工作日志：哪一天几点研究总任务——工厂如何超额完成任务；本周哪一天几点潜心研究至少能反映关于宇宙起源的小部分真相的方程式。

必须进行日日夜夜的战斗。

那么，其他的事情呢？让我们暂时把它搁置一旁吧！——我心里想。

莉　　莉

我偶然地，完全偶然地得知了莉莉的消息。

由于有病，她早就——很早就参加了工作，在家里装订书籍。我事先托人给她捎了信，说过几天去看她。四月的一天，我抱着一大束白石竹花，敲了敲她的门。

“请进！”一个熟悉而又遗忘了的声音回答我。

迎接我的是一个长着淡褐色头发的中年妇人，她的脸天使般的美丽，身材苗条而匀称，背稍微有点弯，但右腿自腹股沟以下不能动了。她朝我伸出了右手，而用左手靠着装订台。

“尤利扬！”她满脸露出幸福、同时又极其忧伤的微笑。

我把花放在装订台上，拥抱了她。

“我亲爱的！我可怜的！”我亲亲她的脸，抚摩着她的头发。

然后，我把她举了起来——她象以前一样轻——并小心地把她放在装订台前一把铺着坐垫的木椅上，我在她对面一把椅子上坐下了。刚刚开放的丁香花通过开着的窗子送来了芳香。

“这就是我的王国！”她指着工作间对我说。

房子里散发着纸、浆糊和丁香花的气味。到处是书、有待装订的印张、装订机、硬板纸、麻布。工作间里面有一个书柜，到处都是插着鲜花的花瓶，连工作台上装订用的钻子、针和线轴之间也是如此。看得出她作好了迎接客人的准备。她穿着节日里穿的白裙子，她的手很干净，从早

上起她就没有进行工作。

我弯下腰去，朋友般地吻她的嘴唇。

“告诉我，你生活得怎么样！”我对她说。我本来想问她有没有什么使她忧虑的事，但我及时醒悟了，没有再吱声。

她不想以自己的忧虑引起我烦恼，所以朝我笑了笑，耸耸肩。

“我生活得很好！”她说，“有经常性的工作，我不感到寂寞。”

我走后，她由于生病无法念最后的十一年级，但第二年她的身体好起来了，于是她复习功课，参加了毕业考试。不是说她多么需要毕业证，但她坚持毕业，以免使我背上造成她无法受完中等教育的罪名。其实，我有什么过错？任何过错也没有！这种事情每个人都会发生的，历来如此，是不是？她进了培训班，学会了装订这门手艺，找到了现在的工作。母亲去世后，她卖了自己家那所小房子，开了这家装订作坊。瞧，工作间旁边是她的卧室，而前面是长着丁香的院子。院子里还有一棵苹果树，但它的花已经谢了……有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呢？当然有，听广播，看电视，看书！我不是早就了解她非常喜欢看书吗！

突然间，她脸上掠过一丝阴影，她陷入沉思之中，但她很快摆脱了思想上不愉快的东西的缠绕，重又朝我微笑着。

"你读过汉姆生[1]的《牧羊神》吗？"她问我。

我说没有读过《牧羊神》。

她指了指书架上的一本书，请我把它拿过来。

我给她取来了那本书。

她翻开书，找到了她要我念的那一段，问我：

"你想不想朗读这几行？"

"为什么不？"我说。于是我开始读起来。

锁着的塔楼里住着一位姑娘，她爱一位先生，为什么？请问风和星星吧，请问上帝吧，因为任何其他人都无法回答你。那位先生曾是她的朋友和情人。但时间在前进，有一日他看见了另一个女人，他的感情就变了。

他在青年时代爱过这位姑娘，常常说她是自己最亲爱的人，是使自己获得幸福的人。她有一颗热情的、善良的、突突跳动的心。他对她说："把你的心给我吧！"她就把心给了他。他又说："我能不能求你给我最宝贵的东西？"她又非常高兴地回答说："行！"她把一切都给了他，可是他仍然不感谢她。

① 汉姆生(1859—1952)，挪威作家。

而另一个女人——他象奴隶，象疯子，象乞丐一样爱她。为什么？请问路上的尘土和掉下来的树叶吧，请问神秘的上帝吧，因为任何别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她什么也没有给他，啊！没有，什么也没有给！而他仍然感谢她。她说："你把智慧和平静给我吧。"他还感到非常遗憾，她没有要他的命。

而他的那位姑娘被关在塔楼里。

"姑娘，你坐在这里微笑，这是干什么呀？"

"我在想十年前的一件事，那时我遇见了他。"

"你还记得他吗？"

"记得。"

而时间在前进……

"姑娘，你干什么呀？为什么坐在这里微笑？"

"我把他的名字绣在手帕上。"

"谁的名字？是那个把你关在这里的人的名字吗？"

"是的，是十二年前我遇见的那个人的名字。"

"你还记得他吗？"

"象以前一样记得他。"

而时间在前进……

"女囚犯，你在干什么呀？"

"我老了，眼睛不好使了，不能再缝什么东西，我从墙上刮石灰，好用石灰给他做只杯子——我送他的礼品。"

"你说的是谁呀？"

"我说的是那个可爱的人，是那个把我关在塔楼里的人。"

"你是因为他把你关在塔楼里，而对他微笑吗？"

"我在想他现在会说什么。瞧着吧，他会说：我心爱的人给我寄来了杯子，三十年来，她还没有忘记我。"

而时间在前进……

"俘虏，你怎么什么办法也不想，还坐在这里微笑？"

"我老了，我老了，我的眼睛瞎了，只能在脑子里想。"

"想四十年前，你遇见的那个人吗？"

"想我年轻时遇见的那个人，也许是四十年前吧。"

"你难道不知道他死了吗？老太太，你脸色苍白，你不回答，你的嘴唇变白了，你没有气了……"

这就是关于那个被关在塔楼里的姑娘的奇怪的传说。

她伸出手来，抚摩着我的头发。

“你不会死的！”她说。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对她说：

“来，你教我装订技术吧，愿意吗？有时间我就来，我们一面装订，一面交谈；或者你工作时，我给你朗读小说。这样，时间就过去了。”

“啊！”她说，“我一定教你，这如此容易，又如此美好！”

后来，我常常去莉莉那里，装订书籍，但更多地是给她念小说。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不成文的规律

时间在前进，我与什特雷夫的关系几乎跟以前差不多。我说是“几乎”，因为他恢复了自己从前某些令人讨厌的习惯，我最厌恶和腻烦这些东西——痛苦地、恳求地望着我，或者象犯人绝望地微笑一样朝我笑着……哎！我内心里无法忍受软弱的男人。他们不管出现在哪里，总是打不起精神来！你甚至连绿帽子也不好给这种人戴……现在，当他瞒着我，把自己的“财产”送往桑丹斯基，而觉得风险过去后，他又开始象个人样了，但反

正一样，他一走近我——仿佛不是人，而是披着人皮的蜗牛在我周围爬，我有这种感觉。

我跟他最后一次"亲密"谈话后的两星期，我从邮局收到了一笔款，数目正好等于我缴纳给他的五个月房租费。这是公平合理的，我根本没有上过楼。当他把钱退给我时，意思是提醒我，表示他不愿意让我再当他家的房客，也就是说，他根本不愿意我出现在他家里。咳！咳！……以后再说吧，以后再说吧，让第一场雪赶快下吧……

因为我想玛娅，关于她那封信，我还想说几句。我不相信那是她的内心话，这是由于她害怕失去玩偶 家的幸福而杜撰出来的。也可能是出于仁慈，比较仁慈的女人都愿意作自我牺牲，但正因为如此，她们也容易背叛自己的丈夫——生活中有这种不成文的规律。

邂　逅

厂里的工作进展顺利，我们按时为国家提供铜制品、铝制品和青铜，我们超额完成了计划。我感到很高兴，当军队勇往直前，打胜仗时，哪一个将军不高兴呢？是的，可我的心却很空虚。高兴是从我头部通过的——假如这样表达正确的话——而不是从心里。我尽量形象地把这种状态描绘出来：我的心象窗子，而窗子上放下了护窗

板。

我愈来愈少去野外，晚上也愈来愈少躺在葡萄园中那块草地上，观察黑暗的、深不可测的天空。我根本不再观察高空。那里有银河系，最初爆炸时，它不仅没有远离爆炸中心，反而向相反的方向跑；它不是象力学原理所阐述的那样作离心运动，而作向心运动，它丝毫不顾这与扩大宇宙的理论是相矛盾的。必须发明能够解释某些银河系星球的这种“逆反”运动的理论，而这种银河系星球可能有千百万……为什么头一次超级爆炸所产生的永恒物质的形状必须是无限的呢？为什所这种爆炸不是千百万次……无数次重复，每次新的爆炸时又组成新宇宙呢？那种断定只有一个宇宙的说法，不是胡言乱语吗？宇宙无限多，它们相遇又散开，在这些相遇和散开中，某些个别的星球可能会消失。

重要的工作在等着我，可是这几个月，我不想在空白纸上写什么，愈是接近十二月，我就愈是心不在焉，莫名其妙的念头取代了原来的计划，我根本不再研究方程式。最好是发生点什么事，譬如下一场大雪，外面一片白茫茫的景象，寂静无声，最后打开放下的护窗板，让生活和光明进入我的心田……

十二月初下了一场雪。有一回，我从书店回来，从我身旁驶过一辆莫斯科牌小汽车，它在我前

面二十来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索妮娅跳下来，她长高了一些，穿着软皮鞋、戴着白皮帽。

“尤利扬叔叔！”孩子冲到我身边，我把她举了起来，紧紧地亲着她的脸蛋。

“我说是你吧，可妈妈说：‘胡说！这是你的错觉！’”

下着鹅毛大雪，天色已近黄昏了。

我们走近小汽车时，她用左手打开车门，玛娅出现了。

“索妮娅，我要打你的耳光！”玛娅说，“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就下车？”

“可是，妈妈，这是尤利扬叔叔！”孩子说，拽住我的手不放。

玛娅没有戴帽子，皮大衣解开了纽扣，穿着露出膝盖的短裙。她把左手朝我伸过来，而右手放在裙子边，动也没有动。

“真的是你呀！”她冷淡地说，“你好！”

“你好，玛娅！”我说，“你怎么样？”我觉得心里一阵冰凉，但我觉察到，非常清楚地觉察到护窗板已开始悄悄地打开了。“什么时候到的？”

“一星期前！”她点点头。然后她转向索妮娅：“你怎么还没有坐好？”她假装生气地问。

“尤利扬叔叔，你也上来吧！”索妮娅把我往车里拽。

“下一次吧，我的孩子！”我对她说，并扶她坐

好。"再见，玛娅！"我朝玛娅伸出手去。

大雪在我们之间飘落，天色已经黑下来了。但我觉得那一刹那间，她带着忧虑和某种无限痛苦的表情望着我。大概这只是我的感觉罢了，因为我们之间下着大雪，冬天的夜色愈来愈暗了。

"再见，尤利扬！"玛娅说。她关车门时，又补充了一句："我们大概还会见面的。"

小汽车缓缓地开动了。

多么大的雪

积雪封住了高地的路，我们不得不用雪橇去拉装着让我们加工的金属的集装箱。这是很危险的，但没有办法。谁知道为什么，各种危险性已经不再使我焦急不安，我只担心那些驾驶雪橇的小伙子。我决定第一个下去，以便为其他人开路。

这天下午，玛娅从工厂丈夫那里回来，将莫斯科牌小汽车，停在我的门口，鸣喇叭让我出去。

玛娅对我说：

"三十一日下午，我单独来你这儿玩。"她沉默了一会儿，使劲握着我的手，然后补充说："我们该结束这种痛苦了，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

“谢谢你，玛娅！”我说。

我解开她的大衣，将她紧紧地按在我的胸脯上。

我疯狂地吻着她的嘴唇，她那样忠实地把心给了我，也要求我把自己的心给她。

“我丈夫将带索妮娅去老人那里。”她说，“一直要呆到晚上！”

“我等着你，玛娅！”我说。

她象上坡似的喘着粗气，然后微笑着说：

“我们将一同回家去——我买了许多玩具和松树装饰品……我要你跟我一起装饰松树，同意吗？”

“啊，同意！”我说，“那你丈夫呢？”

她又把嘴唇伸向我。这是不明智的，因为可能会有人看见我们，但我们已经难以分开了。

然后玛娅对我说：

“四点左右，你站在凉台上，望着路那边。莫斯科牌小汽车一出现，你就去公路边迎接我！”

本月初，什特雷夫为她购买了盼望已久的莫斯科牌小汽车。

“我一定去迎接你，玛娅！”我说，“我一定去公路边迎接你！”

我久久地在后面望着她的汽车，久久地望着，直至它消失在拐弯处。就在这时，当汽车在拐弯处消失后，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

会面，是洁白的雪告诉我的呢，还是伸展在我眼前的白茫茫的原野，抑或是卷着雪花飞舞、象在细细的钢丝琴弦上奏出动听的乐章的风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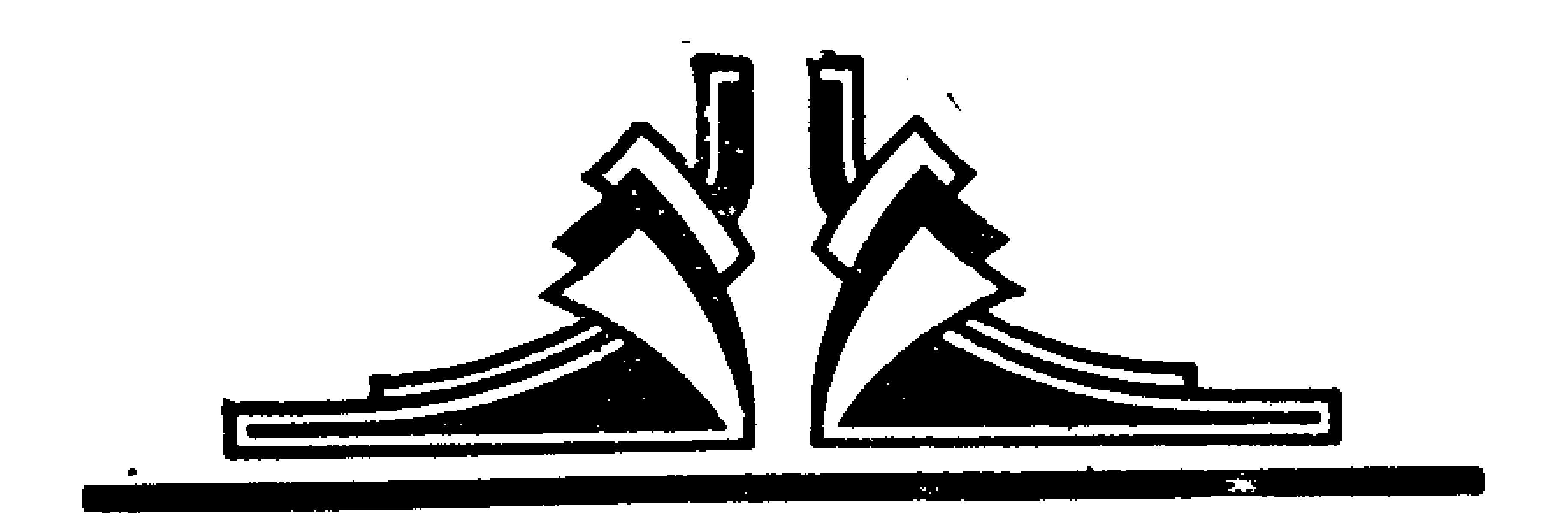
瞧，三十一日来到了。外面一片白茫茫的景象，雪继续静静地下着，多么寂静啊！而我却时不时地觉得从远方，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了拖得很长的铃铛声。这当然是一种幻觉。我不记得至少在我那个年代，H城是否有过马拉雪橇，我有这种感觉，仿佛从远方传来了铃铛声。

我给莉莉写了一封信，我把它放在皮大衣里面的口袋里，一会儿把它投进火车站邮筒里，那里每天取三次信。车站里那些朋友见到我时，会大吃一惊的！……而莉莉明天中午前后，就会收到信。一定要让她收到这封信，以免她白白地等我。明天我从索非亚给她寄贺年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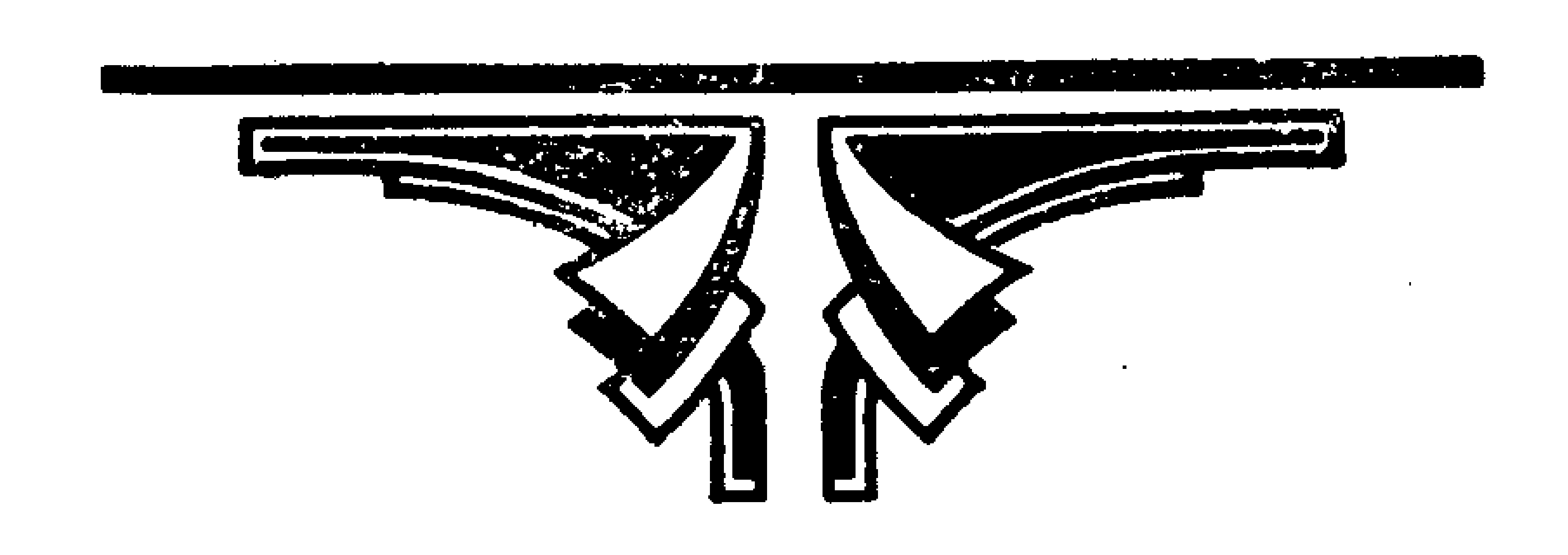
现在我去院子里，将车开上公路，但我不会开往H城，也不会开往什特雷夫家，而去工厂，那里有一条直 接 通 往 火车站的新路。

在这之后，我将回来，赶到凉台上，等待玛娅的莫斯科牌小汽车在远方出现。我的行李就在车里，给莉莉的信放在上衣口袋里……

世界上下了一场多么大的雪啊！一场多么好的雪啊！



作者超短结束语



我想用尤利扬的前丈人迪尼奥·迪诺夫斯基副部长的话，作为结束语：

你瞧，尤利扬是个什么人！心爱的人送上门来，他却背朝着她！

还扔下一棵没有装饰的新年松树！真是个怪人，是不是？

“大概是个怪人！”我也这么想。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怪人
作者=（保）安·斯·古利亚什基著　　樊石译
页数=295
SS号=10993189
出版日期=1989年03月第1版